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徐崇温 主编

(德) 卡尔·柯尔施 著

王南湜 荣新海 译

张峰 校

马克思主义和 哲学

YANJIUKONGS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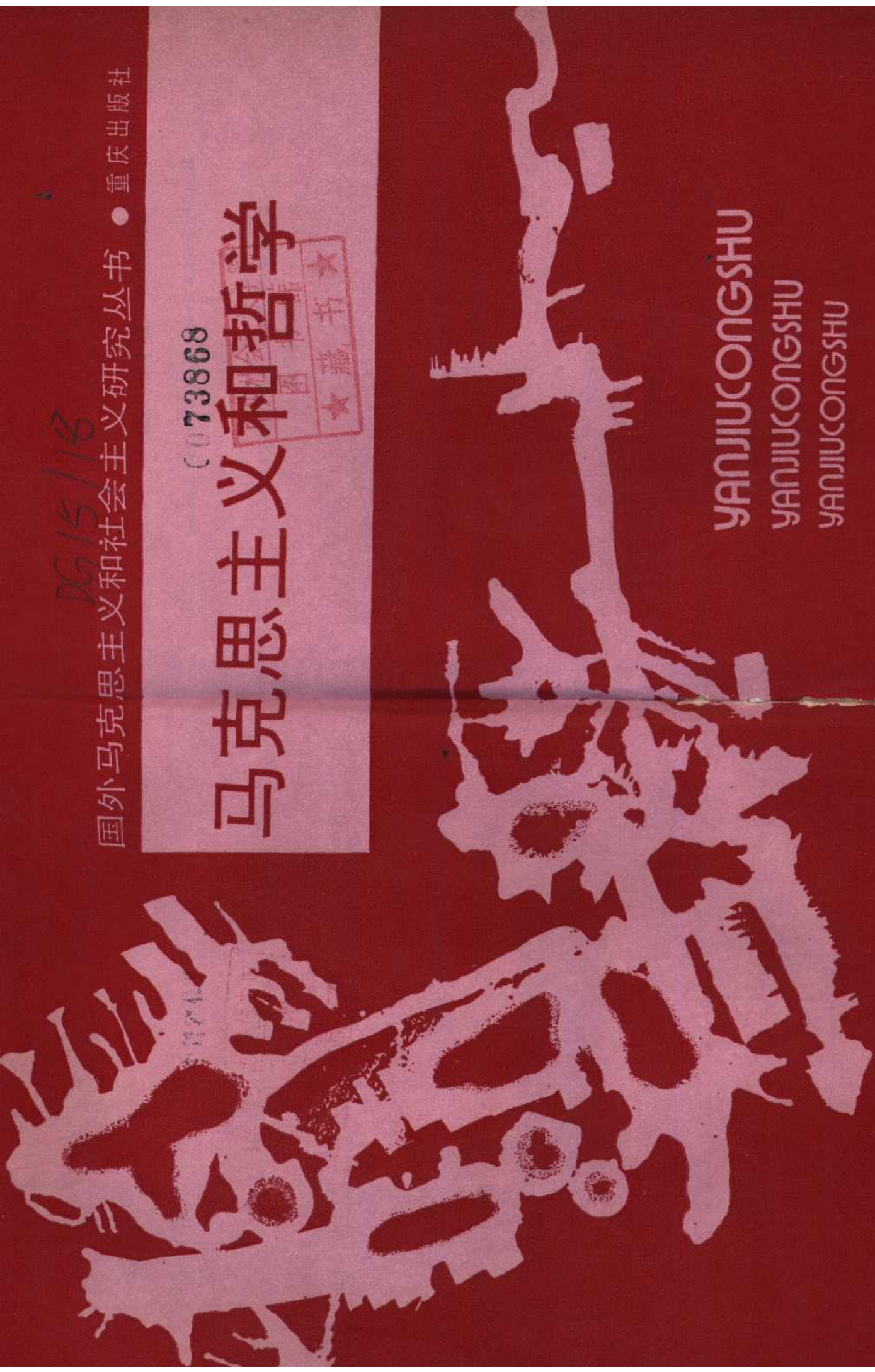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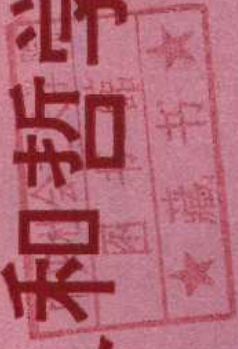
重庆出版社

2615/18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 重庆出版社

C073868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中 译 本 序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卡尔·柯尔施是与卢卡奇并驾齐驱的人物。如果说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至圣”，那么，柯尔施便算得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亚圣”。在20世纪20年代，柯尔施和卢卡奇都遭到了第三国际的批判。与卢卡奇不同的是，柯尔施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坚持毫不妥协的立场，结果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纵观柯尔施作为一个思想理论家的一生，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起先是一个列宁主义者，后来成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最终是自由的批判理论家。鉴于本书“英译本导言”已详细叙述了柯尔施的生平，故在此不再赘述。

在20世纪20年代，柯尔施是德国共产党的一位重要的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他发表了一些重要文章，例如《〈哥达纲领批判〉导言》（1922年）和《第一国际的马克思主义》（1924年）。尤其是，1923年他发表了他最重要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这本书使他在党内遭到了厄运，被视为“极左派”、修正主

义者和唯心主义。正是鉴于这本书的错误，季诺维也夫在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谴责了他和卢卡奇。斯大林在1926年7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再度提到他，称他是“极左派”理论家，指责他认为苏联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想在俄国发动一次新的革命。1926年春季，柯尔施被开除出党，从此他便作为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著书立说。1929年，他就考茨基1927年的主要著作《唯物主义历史观》写了一个长长的措词激烈的抨击文章。1930年，他再版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并附了一个广泛详尽的评论《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1931年他写了一篇论述马克思主义危机的文章，但未发表。1932年他再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附加了一个导言。在整个30年代，他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继续批判考茨基和列宁，认为他们的哲学大同小异。他还越来越强烈地主张，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充分表达现代无产阶级的意识，需要有一种新的理论，这种理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继续，也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修正。他的这些观点体现在他的《卡尔·马克思》（1938年）一书和《我为什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35年）、《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则，再论述》（1937年）等文中。我们推出的这个译本，虽题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实际上收入了柯尔施1922年至1930年的主要文章。读者从中可以窥见柯尔施的基本思想。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的核心议题是讲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围绕着这个议题，柯尔施展开了他自己的哲学和政治思想。柯尔施认为，自恩格斯开始，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把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解释为观念同客观物质需要和行动相一致，认为人类头脑消极地接受一种预先存在的、非人格的、决定性的现实。其实，科学唯物主义决不是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改进，因为二者都把认识归结为对全能的客观性的一种自动反应。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

是正统意义上的“科学”。决不存在着独立于活生生的人类之外的客观物质现实。因此，认识不是消极地反映，而是积极地塑造一个复杂的相互渗透的世界。真实的观念所表达的是真正的人类斗争，而不是客观的材料。

像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样，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也把社会当作一个总体，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认为这个整体中的每一因素都强化并反映着所有别的因素。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相互联系着的，认识不可能是一种独立的并消极地被决定的副现象。资产阶级社会是由一种神秘的异化的意识和一种剥削的压迫的经济制度构成的。“这些形式只有在迄今通过这些形式被理解的物质生产关系自身在客观—实践上被推翻的同时，才能够在思想和意识上被消灭。”（本书第51页）如果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那么，它就应该不仅提供政治和经济造反的学说，并且还应提供对异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哲学批判。这种批判旨在消除哲学，这是废除整个资产阶级现实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所谓马克思主义“超越”哲学，就是真正科学地把理论和实践当作一个完整整体的内在部分。资产阶级哲学忽视了这一点，认为自身是永恒有效的，独立于社会活动之外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在消灭资产阶级哲学时，不能完全忽视或放弃哲学。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意识不到哲学辩证地表达着历史的趋势和过程，从而使工人丧失了自己的革命性。真正的工人阶级革命要求参加革命者在认识上具有革命观念，作为现实的破坏行动的一部分。资本主义的物质成熟，并没有产生变革的冲动。正统马克思主义忽略了这一困难，没有“真实地”表明它的哲学责任。马克思主义包含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现实中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的哲学批判，这种批判同时又是整个革命过程的一部分。在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尽管强调了物质的重要性，但在哲学上继承了作

为黑格尔唯心主义之特点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

在柯尔施看来，辩证法不是任何人在任何问题上都能运用的客观方法，而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是这一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辩证法只有在革命的无产阶级实践中才能有效地用于社会探索。唯有工人阶级能认识历史的整个运动，组成一个“普遍的”阶级。当然，这种认识辩证地表现在革命行动上。

尽管柯尔施的总体主义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有一定的逻辑联系，但他并不完全赞同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他认为，哲学的真理会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乃在于它在革命工人的意识达到最高潮时充分表达了这种意识。随着历史事件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和有用性也将发生变化。现在因充分表达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而成为真实的哲学，在无产阶级意识发生变化时，它会变成虚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一定会采取不同的形式，也就是说，当它不再同工人意识相关联时，它就要消失。他指出：“必须从历史的、唯物辩证法的视角，把所有这些较早和较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看成是历史演变的产物。”（本书第60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后来的发展的确不是‘纯理论’研究的产物；它一直是对最近以各种方式复兴的阶级斗争实践经验的理论反思。”（本书第70页）决不存在纯理论的、“客观上有效的”马克思主义。

自然科学也表现了人类以生产力为中介同自然的相互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我们找到更高级的满足物质需要的方式，我们同自然的联系也就有所不同。现在的经验“规律”的“有效性”的依据，是它们充分表达了人对自然的共同认识。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些认识使人类同自然相异化，并预先假定存在着客观的、非人格的、直线发展的因果规律。经验的自然科学因为反映着资产

阶级的异化，所以是有效的。然而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随着生产设备和劳动的社会化，我们感觉到的同自然的关系也将变化。自然将被人化。社会主义的自然科学应该反映和表现这种新的认识。

柯尔施用他的“相对主义”或“历史主义”来批判抽象的唯心主义和教条的唯物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乃是因为它代表着一种经验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而不是把客观真理强加给无知的工人。历史是由构成认识的经验现象构成的，决不存在建立在客观的物质辩证法之上的有机的总过程。

柯尔施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应废除那些正在影响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资产阶级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范畴，不仅包括资产阶级的哲学和制度，而且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社会主义将反映一种非异化的人性，个人由于成为历史辩证运动的一部分而实现自己的潜能。随着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中成熟起来，它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被剥削地位和革命作用。“社会主义，无论从其目的还是从其手段上说，都是一场实现自由的斗争。”（本书第91页）柯尔施假定，这种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即将来临的，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机制蕴含着—场质的变革。但是，柯尔施在这里遇到了一个难题。因为从他的纯粹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既不能假定存在着一种客观的人类“潜能”，也不能假定存在着不可避免地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趋势。柯尔施极力申明的粉碎资产阶级总体并实现自由的必然性，依据的是先验地承认有一种表达着整个历史运动的理想的充分实现的人性。而这恰恰是同他的认识论的相对主义相反对的，因为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否认历史的客观性。由此可见，依据柯尔施的历史主义或相对主义，是不可能把握主观性和客观性、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的。

柯尔施用他所谓的辩证法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历史，把马克思

主义的演化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和工人自我意识的一个阶段相照应。在第一阶段（1843—1848年），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反映了工人初期在资本主义的非人条件下的狂怒情绪，阶级斗争表现在人民渴望自由的精神上。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是浪漫的，甚至是唯心主义的，过分强调历史的主观因素，忽略了具体的物质条件。第二阶段（1848—1900年）是资本主义扩张和巩固时期。工人的自我意识的成长受到阻碍，工人采取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并参与了资产阶级制度。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成了教条的、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纯理论。庸俗唯物主义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形式，它的根源蕴含在马克思的言论中，体现在恩格斯的著作中。马克思主义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脱离了现实，溶合进固定的客观物质规律中。第三阶段（自1900年开始）出现了改良主义、工团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标志着无产阶级意识的重新觉醒。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应该在哲学上重新把握历史总体，包括无产阶级实践，以期揭示主观上认识到的阶级动力。这就是马克思原初的意图，是作为探索方法的辩证法的本质。柯尔施指责第三国际倒退到了第二阶段，即把意识当作现实的消极反映，认为党的任务是把真理强行灌输到工人头脑中去。

不言而喻，柯尔施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三个阶段的划分，是难以成立的。因为他不加分辨地把一切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鼓吹自己的观点、实行自己的路线的政党、运动、思潮、流派的历史，统统描述成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历史了。

总之，《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早一部展示其马克思主义观的著作。该书的许多观点对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起了较大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柯尔施在这部著作里已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西方共产主义”视为一个流派，并与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由此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这

一概念由来已久,不管这一名称是否妥当精确,它毕竟标志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思潮在实际上存在着。

校 者

1988年1月

英译本导言

卡尔·柯尔施，1886年8月15日生于汉堡附近的托兹泰特^①。他的父亲出身于东普鲁士的小农场主家庭，是一个银行职员。在托兹泰特居住一段时间后，他全家迁到了图林根的迈宁根。在那里，柯尔施上了中学。后来他又去慕尼黑、柏林、日内瓦和耶拿，接受大学教育。在大学他学过法学、经济学和哲学，还参加了“自由学生运动”组织，这个组织与反动的民族主义的“学生联谊会”相对立，主张学术界要同社会主义运动建立联系。1910年，他在耶拿大学以关于认罪的举证义务问题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次年，这篇论文在柏林出版。

1912年至1914年期间，柯尔施在伦敦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在那里他参加了“费边社”，受到了工团主义运动的强烈影响。在这段时期，他认为“费边社”

① 有关柯尔施传记的最可靠的资料来源是埃里希·格拉赫为1966年版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法兰克福，欧洲出版社)所写的导言和传记注释，赫尔曼·韦伯的《德国共产主义的转变》(欧洲出版社，1969年)，以及《抉择》杂志关于柯尔施的专期(柏林，1965年4月，第41期)。

和工团主义运动强调了社会主义的建设性内容和积极的民主方面，而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只是消极地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同时，他还为德国的几家期刊撰文，评论英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英国的法律、妇女参政权、农业政策、英国文学家高尔斯华绥和英国大学的状况^②。1913年，他和赫达·加莉雅蒂结了婚，生了两个女儿。他们和睦相处，白头到老，并且经常合作从事理论工作。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柯尔施回到德国。由于他反对战争，被从预备役中尉降为下士。尽管他从未拿过武器，他还是受了伤，两次被授予铁十字勋章。战争结束后，1919年他成了耶拿大学的讲师。

战争标志着柯尔施积极的政治生涯和最紧张的理论创作时期的开始。1917年，他参加了从官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分裂出来的左派的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当独立社会民主党于1920年再度分裂时，柯尔施和大多数成员一起参加了德国共产党（KPD），但他对列宁主义的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21项条件有一些保留意见。在1918年11月推翻德国皇帝并宣告魏玛共和国成立之后这段时期里，欧洲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德国，处在革命的酝酿状态。柏林兴起的斯巴达克同盟（1919年1月）和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4月）全被血腥镇压了。但在这两年内，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和工团主义的观点仍然激发了一种积极而广泛的工人委员会运动^③。柯尔施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他认为这个运动

② 参见《费边社》，载《行动》第4卷第8页；《谈谈对英吉利法律的认识》，《国际法杂志》第14卷；《英国的自由》，《行动》第5卷第7页；《英国大学教育的问题和前景》，《行动》第6卷第4页；《高尔斯华绥》，《行动》第5卷第9页。

③ 参见P.V.奥尔岑《十一月革命中的工厂委员会》（杜塞尔多夫，德罗斯特出版社，1963年）。

正在实现他战前在伦敦提出的大部分观念。他还参加了柏林社会化委员会,并为革命刊物《工人委员会》撰稿。

在这个时期,他关于工人委员会的作品可分为两个阶段:1918年到1920年的作品反映了这场运动的刻不容缓性和乐观主义;1920年到1922年的作品表达了这场运动活力的衰落和对更为批判性的反思的需要。当运动处于高潮时,柯尔施为建立在工人委员会基础上的国民经济精心阐释了一种假设的经济体系。每一个工厂都要由工厂委员会来管理,工厂委员会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基本机构。在《什么是社会化?》(1919年3月)一书中,他设想了一种经济组织体系,叫做“工业自治”,认为国民工业的每一个部门都由一个协调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利益的委员会来管理^④。每一个工厂在其行业内应有有限的自由。决策将涉及到产量、工作条件和赢利的分配。在这个体系的第一阶段,生产资料将被社会化,而工人仍根据产量而获取报酬;在第二阶段,劳动自身也将社会化,工人那时将按其需要而取酬。在这部著作中,柯尔施所关心的不仅是要提出他感到在战前的马克思主义那里所缺乏的积极内容,而且也抨击了当时流行于德国的“国有化”和“工人参政”的改良主义的和社会民主的观念,这些观念企图使工人委员会运动偏离它的革命目标。这些改良主义的观点在1920年2月的魏玛宪法中找到了它们的表达。

当德国资本主义稳固了自身,工人委员会运动衰落的时候,柯尔施试图分析1918——1920年高潮的失败原因。尽管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地强调缺乏一个掌握政权的革命组织,柯尔施却强调,

^④ 他在这段时期写的最重要的文章,后来以《社会化文集》为题重印(欧洲出版社,1969年)。奥尔岑在《十一月革命中的工厂委员会》一书中,G.E.拉索尼在《柯尔施与议会-工会战略》一文(载《社会主义问题》,1969年第41号)中,论述了柯尔施的作用和思想。

对于这种夺取政权的理论和文化的前提也是缺乏的。“由于缺乏夺取政权的社会—心理前提，在1918年11月之后那关键的数月之中，当资产阶级有组织的政权被粉碎，而且表面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再有什么障碍时，却未能把握这一有利时机。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对于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决定性信仰，而正是这种信仰才能带领群众一道前进，并使人们明确认识到应迈出的最初几步的性质。”^⑤柯尔施把德国十一月革命失败归因于缺乏意识形态准备和政治领导，这一分析标示着他此后著作的许多主要特点。他写于1922年的著作《工厂委员会的劳动法》，是根据他给工人的一个讲课教程而写成的，它表现了一种为工人委员会提供一部无产阶级法律的尝试^⑥。柯尔施论证说，关于劳动的法律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决定性领域，它表达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结构。在这部著作中，柯尔施早年的法律修养表现得很明显。柯尔施认为，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提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法律表述，是这一革命运动的关键的意识形态任务^⑦。人们可以这样说，柯尔施在加入德国共产党之后所写的这部关于工厂委员会的论著，比他较早的著作有着更多的列宁主义的特征。与荷兰的左派潘涅库克和高尔特相比，尽管柯尔施仍然承认在无产阶级体制的三角形中工厂委员会是首要的，但他同时也强调了对党和工会的需要^⑧。这部论著始终假定俄国苏维埃政治生活的中断仅仅是一个暂时的偶然现象，是由战争和饥荒给布尔什维克党造成的。

⑤ 《社会化文集》第74页。

⑥ 除去关于1920年魏玛宪法的一些片断外，它以《工厂委员会的劳动法》为题重印（欧洲出版社，1968年）。

⑦ 同上，第26页。

⑧ 同上，第138页以下。

柯尔施关于工厂委员会的著作及其最初朝着列宁主义方向的发展，恰与同时期在都灵从事苏维埃运动的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形成对照^⑨。像柯尔施一样，葛兰西也试图把为1914年—1918年大战所引起的工人自发掌权运动理论化。两人都认为，未来的革命国家的先兆是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制度在此时此地直接建立。然而，像葛兰西的早期著作一样，柯尔施在《什么是社会化？》中所精心设想的无产阶级国家，却避开了推翻资产阶级国家的革命起义和实现起义的党组织的必要性这些核心问题。1920年的工厂委员会运动失败后，他们都分析了这一挫折的原因，但葛兰西承认列宁主义的关于党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战斗中必不可少的组织的理论，比柯尔施走得更远。葛兰西写道：“革命有如战争，工人阶级的总参谋部必须时刻准备革命。”^⑩相反，柯尔施却通过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未能提供关于革命的主观前提的理论，而发展了这种理论。然而，柯尔施在这里肯定和葛兰西有一定的类似性，尽管葛兰西比柯尔施更强调党的重要性，但他也强调在市民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斗争的必要性，因为统治阶级的权力是靠它的凌驾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之上的意识形态优势或霸权地位来维护的。柯尔施和葛兰西都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在意识形态战线展开斗争。在他们两人看来，对观念领域的积极介入，必须从批判第二国际的马克思

^⑨ 安东尼奥·葛兰西，《意大利的苏维埃》，《新左派评论》第51号，附有一个导言。关于葛兰西思想的其他有关方面，J·M·坎默特在《安东尼奥·葛兰西和意大利共产主义的起源》（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7年）一书中进行了讨论。这本书也叙述了葛兰西与柯尔施20年代中期党内斗争中的意大利盟友波尔迪加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个联盟，柯尔施集团才把葛兰西载于《新秩序》上的著作批评为“意大利共产党主义的唯心主义传染病”（格拉赫，《社会化文集》，第11页）。

^⑩ 《新左派评论》第51号，第27页。柯尔施对列宁的政党理论的正面主张以及他对卢森堡的政党理论的反对意见，参见《列宁和共产国际》，《国际》，1924年。

主义的宿命论和机械论倾向开始。

柯尔施通过在两个层次上的著述，表达了对这种理论的强调。在一个层次上，他着眼于党员，写了一系列教育性的小册子和文章，介绍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在1922年他出版了三本这样的书。《唯物史观的基础》开首篇是一篇叙述在革命运动中理论对实践的基本关系的论文，其中预示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许多命题。随后，它借助于广泛的引证，这些引证不仅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而且也来自《福音书》、莎士比亚、黑格尔、歌德和谢林，来阐明各种关键性的马克思主义概念，诸如“阶级斗争”和“辩证法”。另一本类似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以37个问答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最后，柯尔施出版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的大众版，附有他所写的政治性导言，强调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对于当时工人运动所面临的直接问题——夺取国家政权——密切相关^①。

在另一层次上，柯尔施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性衰落和马克思主义当时的状况作了分析。这一分析的结果便是发表于1923年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它直接地来自他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与德国革命运动的客观历史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一开始就指出，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家都没有看到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历史联系。他们也没有理解黑格尔哲学在19世纪40年代衰落的原因。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理解在1848年革命之前唯心主义和处于革命阶段的资产阶级之间的辩证的和实质性的关系。既然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代表着资产阶级发展的这一英雄时期，那么，当资产阶级不再是革命的时候，这种唯心主义也就衰落了。新的革命阶级

^① 本书收入了柯尔施的这篇导言。

是无产阶级，它在辩证唯物主义之中找到了自己理论上的表达。因此，资产阶级哲学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之间的历史关系，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基本世界观之内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而是哲学的继承人。

第二国际搞混了这一关系，因为它自身已不再是革命的了。它不再体现那种决定着马克思的原作的原则——批判的理论与革命实践的辩证统一。取而代之的是，理论仅仅是对于既定形势的消极而静止的分析，不再表达任何革命的直接动力。柯尔施试图把这一理论危机放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和欧洲工人运动的历史中来考察。因此，他做了一个新颖的和极易引起争论的尝试，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方法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自身。在1917年之后，一个新的革命形势已出现在欧洲，列宁首先把注意力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和国家的关系，重建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以类似的胆量，柯尔施企图重新提出马克思主义对哲学以及对一般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不同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柯尔施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意识形态层次的特殊自主性及其实际后果：即使在革命之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不会自行消失，我们必须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之斗争。庸俗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是“先验地低估”资产阶级社会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机制的复原力。柯尔施早先关于无产阶级法律的著作，可以看作他认为在反对这种机制的斗争中必需的那种理论工作的一个具体例子。反过来说，纯粹学究式的批判也是无用的。任何社会的物质基础都是在其社会经济结构之中。如果要在理论上克服社会的精神上层建筑，必须在实践中推翻这一基础。“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唯有把握资产阶级革命和它在唯心主义哲学之中的理论表现之间的历史关系，工人阶级才能够克服这种哲学，并在实践中摧毁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势力。

柯尔施强调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历史关系以及成功的革命的主

观前提，类似于在柯尔施的这部著作即将印刷之时已出版的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命题。在一篇简短的《代替前言的跋》中，柯尔施写道：“就我已经能确定的观点而论，我很高兴基本上与作者（卢卡奇）的观点相合；若置于一个更广泛的哲学基础上来看，这些观点在许多方面与本书中所提出的问题相关。在我们之间的关于实质和方法的特定问题的意见分歧上，为以后的讨论着想，我保留一个更可理解的立场。”^⑫然而，当他在1930年的《反批判》中进行解释时，他并未公开他对于卢卡奇著作的看法，尽管他逐渐看到了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比他最初意识到的更多的分歧。他们之间最明显的并在后来阻止他们进行有益合作的分歧，是官方共产主义对他们各自著作的政治性反击以及他们自己对这种反击的不同反应。虽然他们一起被谴责，却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卢卡奇作了一个一半出于策略一半出于诚实的自我批评，留在了共产主义运动之中。而柯尔施则没有这样做。

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发言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直接反应毫不含糊地是敌意的。在《社会》上，在为他自己的变节开脱的一个自我辩解性的评论中，考茨基避而不谈柯尔施关于黑格尔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论点。然而，他的确转弯抹角地承认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是革命的了：“对柯尔施来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社会革命的理论，别的什么也不是。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便是确信，社会革命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即只有在特定的国家和时期才是可能的。柯尔施所属的这个共产主义宗派已完全忘记了这一点。”^⑬

官方的共产主义运动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是同等敌视

⑫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年，第71页。

⑬ 《社会》第1期，第310页。

的。季诺维也夫在1924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柯尔施是这次会议的德共代表——的开幕词中，攻击了柯尔施、卢卡奇和格拉齐亚德：“格拉齐亚德同志在意大利出版了一本重新收入他以前所写的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的书，当时他还是一个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者。这种理论上的修正主义不能不受惩罚地畅通无阻。我们也不能容忍我们的匈牙利的卢卡奇同志在哲学和社会学领域做同样的事情……。在德国共产党内我们也有类似的倾向。格拉齐亚德同志是一个教授，柯尔施也是一个教授（插话：‘卢卡奇也是一个教授！’）。如果我们再多几个这样的教授来编织他们的理论，我们将会迷失方向。我们不能容忍在我们的共产国际内部有这种理论上的修正主义。”^⑭柯尔施也受到了由德波林和他的学生卢波尔领导的苏联党主要的哲学家们的攻击。他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在苏联两次被翻译^⑮。德波林指责柯尔施和卢卡奇两个人是唯心主义者，但他本人也在苏联哲学界进行了一场“辩证论”派反对“机械论”派的激烈斗争。在1929年明显地击败了“机械论者”之后，他自己也在1931年被斯大林斥为“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

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在共产国际中引起了比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更大的轰动。它所具有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可这样来解释：即在那一时期，在它的发表之时和之后，柯尔施是德国共产党——当时在世界上除苏联之外，它是主要的共产党——的一位最著名的成员。在1923年，他被选入图林根议会，在同年10月，他成了图林根政府中的共产党人司法部长。共产党那

^⑭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报告缩编集》（英国共产党发表），第17页。

^⑮ 关于德波林本人的著作（包括他对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批判性评论），参见《关于辩证唯物论和机械唯物论的争论》，德波林和布哈林著（苏尔坎普出版社，法兰克福，1969年）。

时正在准备发动一场武装起义。根据党的指示，柯尔施利用他的部长职权，能为革命开始时掌握武装和推翻国家机器提供便利。但计划中的起义被取消了，而且当汉堡爆发了一次地方性起义时，军队成功地镇压了它。

1923年10月的巨大失败，导致了德国共产党被取缔和它的党员损失50%。在党内，前任布兰特勒的领导权被剥夺，由A.马斯洛夫和R.费舍的“左派”领导所取代。党的新路线强调需要作更有组织的革命准备，并拒绝对社会民主党人采取任何统一阵线政策。在这一向左的运动中，柯尔施成了党的主要发言人之一和党的理论刊物《国际》的编辑。他还成了德国议会的共产党人议员，这个职位他一直保持到1928年。

魏玛共和国的德国共产党内有多种多样的政治观点，其中大多都倾向于掌握领导权处于官方地位的左派^①。在1924年到1929年出现的“布尔什维克化”过程中，它们被逐渐清除和清洗了，德国共产党被改造成一个严格地按照斯大林主义路线组织起来的党。政治上的争论集中在几个问题上：议会和工会策略、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发展、欧洲资本主义的状况。虽然柯尔施在1923年10月之后站在费舍—马斯洛夫集团一边反对布兰特勒，但他也反对费舍—马斯洛夫集团对俄国共产党人的屈从，尤其反对关于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一个暂时的稳定状态和革命不再很快成为可能的官方观点。作为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不仅由于

^① 德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的重新组织和左翼反对派的政纲，在下列著作中有详述：O.K. 弗里希瑟姆的《魏玛共和国的德国共产党》（欧洲出版社，1969年）；赫尔曼·韦伯的《德国共产主义的转变》——一个关于布尔什维克化和德共清除左派的详细分析；S. 贝尼的《卢森堡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德共党内的“极左”反对派》（《现代史季刊》1961年第9卷，第359—383页）。关于德共对柯尔施的立场，可参见《资产阶级反革命和叛徒柯尔施》，载于《国际》1926年8月号。

他的哲学观点而被季诺维也夫所指责，而且还因为在《国际》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批评布哈林和工人贵族理论的文章而受到布哈林的质问：“我们必须问：《国际》杂志的编辑怎么能不进行检查呢？柯尔施说：那只是发表出来供讨论的。同志，我们不能发表每一句蠢话来供讨论。这已经够了。”^⑭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显示出了柯尔施与费舍—马斯洛夫集团逐渐加剧着的分裂。后者与俄国领导人结盟，而柯尔施则与波尔迪加领导的意大利左派形成了一个反对派集团。在1925年2月，他被撤消了《国际》杂志的编辑职务，从那时起，便与党的领导公开对抗。

1925年7月的德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在组织上“布尔什维克化”的决议。这既意味着更严格的中央集权主义的控制，也意味着对官方苏维埃立场的更为坚决的支持。不久之后，费舍—马斯洛夫的领导权也被剥夺，而由台尔曼和他的合作者所取代。这是他们的俄国保护人季诺维也夫垮台的结果。德国共产党开始重申，世界资本主义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而主要的危险则是来自以兴登堡为代表的“君主主义者”。柯尔施集团反对这种分析，并以《共产主义政治》杂志为核心在1926年3月建立了自己的组织。这个所谓的“真正的左派”，在最初只是德共内的一个派别。他们的纲领阐明资本主义仍未稳定化，“客观上需要具体的革命策略”^⑮。德共应当抛弃它的“议会迷”而采取“明确的革命阶级政策”，以造就一个建立在工人委员会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失业工人的组织和动员，以及独立工会的建立，是德国政治的前提。要拒绝与社会

^⑭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135页。

^⑮ 在前引贝尼的著作中有一个概述，第372页以下，并在柯尔施的《共产国际的道路》（柏林，1926年）中重印。柯尔施这一时期的政治性论著包括：《围绕着共产国际的左派的斗争》，（《共产主义政治》，1926年第18期），《苏维埃俄国的十年阶级斗争》（同上，第17—18期，1927年）。

民主党建立任何联合阵线。

这些后期的极左立场,反映在柯尔施—卡茨(Katz)集团关于世界形势的观点中。他们反对新经济政策,卡茨集团还断定,苏维埃国家现在是一种“富农的专政”,并称斯大林为“农民拿破仑”。柯尔施认为,共产国际已经成了俄国对外政策的工具,“稳定化”理论反映了一个防御性国家企图与世界资本主义结成联盟的需要。柯尔施支持由施略普尼柯夫(Shlyapnikov)和萨普尤诺夫(Sapronov)领导的“工人反对派”,但反对托洛茨基领导的“左翼反对派”。对此,托洛茨基严厉地谴责了柯尔施对苏联的轻率批评,并且左翼反对派正式声明脱离1927年的著名政纲中柯尔施的立场^①。

柯尔施—卡茨宗派最初打算在德共和共产国际内进行斗争,但在1926年2月至3月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上,德国共产党接到进行更彻底的清洗的指令。布哈林抨击柯尔施关于共产国际的分析,季诺维也夫则指责柯尔施为“疯狂的小资产阶级”。柯尔施收到了最后通牒:要么放弃议员席位,要么从德共中被开除。他拒绝照办,结果在1926年4月被开除出党。他继续进行了一年政治活动,并保持着他在议会的席位(1927年,他是德国议会中投票反对苏德贸易协定的唯一议员)。但是,极左派被清除出德国共产党不久之后,又分裂成许多小集团。1926年4月,柯尔施在汉诺威与以卡茨为首的集团决裂。因为后者分裂了共青团组织的当地支部,并唆使其信徒去占领德共报纸在那里的办公室。柯尔施批评这是向党的领导权的挑衅;他还打算与被罢免的前领导人费舍和马斯洛夫一起工作,但被卡茨否决了。卡茨因此指责他企图成为“另一个列宁”。1926年9月,“坚定的左派”集团分裂

^① 托洛茨基关于柯尔施的观点,参见《保卫苏联和反对苏联》,《著作集》第1卷,1955年,巴黎。

了，柯尔施的追随者联合在靠他的议员津贴资助的《共产主义政治》杂志周围。在1927年5月的第三次代表会议上，《共产主义政治》决定，在作为德共的派别和新党之间采取一种中间态度，但坚决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处于退却状态的说法。柯尔施与挪威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意大利波尔迪加集团有着国际性联系；但是，1928年《共产主义政治》停刊了，从此柯尔施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成员的时期也就结束了。

1928年之后，柯尔施继续写作和讲演，并与早在两年前就出席柯尔施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讲座的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开始了一种密切的精神友谊。1933年2月，在国会起火的那天夜里，柯尔施发表了她的最后一次政治性谈话，并且不得不在当天夜里逃离德国。在1928至1933年间，柯尔施拿出了大量的思想成果。1929年，他写了抨击考茨基的长篇论文《唯物主义历史观》，1930年，他重新发表了以《反批判》为序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捍卫和阐述他在1923年的立场。在1931年的《关于黑格尔与革命的提纲》^②中，柯尔施继续断言黑格尔哲学是代表着资产阶级思想的成就和局限性的启蒙运动意识形态的顶峰。因此，它既是革命的哲学，又是复辟的哲学。这种模糊的辩证法由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接受，他们的唯物主义因此是过渡性的：“由此被创造的东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但这不是由于它是从自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相反，恰恰由于它是从资产阶级革命中浮现出来的；既然存在着这种关系，那么，它的形式和内容仍然像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一样，打有雅各宾主义的标记”。

在流亡中柯尔施继续进行他的理论工作，在1938年出版了《卡尔·马克思》，这部著作与其说是马克思的传记，还不如说是对

^② 重印在《抉择》第41号上。

其成熟时期的理论的分析^①。《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古典哲学的渊源关系，而《卡尔·马克思》则表明它如何同时起源于古典经济学理论。像黑格尔一样，李嘉图也把资产阶级思想发展到了它的极限，并且在这样做时，揭露了它作为一种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柯尔施追溯了马克思的思想从哲学到科学的逐渐发展，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认为经济是既定的首位的东西的最初阶段，到“1847年在布鲁塞尔对德国工人协会的讲演中它的第一次科学表述”的发展^②。《卡尔·马克思》以一种便于理解的方式展现了在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提出的中心命题。柯尔施认为，早期的马克思仍然处于哲学残余的影响之下，只是在他后期的著作中，进行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才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科学。柯尔施还认为，马克思从未完全从其早期的哲学形态中解放出来，即使在其后期的著作中也是如此^③。

柯尔施的工作经常被看作类似于卢卡奇和其他重新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强调诸如“异化”之类的概念在马克思思想中的核心地位的知识分子的工作。但是，《卡尔·马克思》明确地使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关于异化劳动的“前科学”的哲学分析与后来在《资本论》中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科学分析形成对照。尽管柯尔施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不是一个分析系统，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革命批判，但他总是强调马克思后期著作的重要地位。这个思想贯穿于他的著作，从他的1922年的《〈哥达纲领批判〉导言》到1938年关于马克思的书。柯尔施对哲学的关心不是要表明马克思是“哲学的”，或者要从“早期马克思”寻出支撑

① 《卡尔·马克思》(查普曼和霍尔,伦敦,1938年;1963年在纽约重印)。

② 第4章《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和科学批判》。这是他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注①,第30页以下)更为详细的阐述。

③ 《卡尔·马克思》第231页。

物。他的目的是要表明，马克思超越了“哲学”，但继承了作为古典唯心主义独具特征的理论 and 实践的辩证相互关系，并第一次给了它唯物主义的基础。《卡尔·马克思》重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科学，是一种对社会的特定历史形式的经验考察，无需哲学上的支持”^{②④}。

柯尔施的流亡生活意味着他与布莱希特的关系进一步加深^{②⑤}。布莱希特后来说，他之所以选择了柯尔施和社会学家弗里茨·斯顿伯格(Fritz Sternberg)作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指导者，是由于他们不是正统的党的思想家。尽管他们在政治上有分歧，但柯尔施和布莱希特一直保持着关系，直到布莱希特于1956年去世。1933年之后，柯尔施和布莱希特住在丹麦一起工作，当柯尔施1936年移居美国后，他们有通信联系。柯尔施的《卡尔·马克思》激发了布莱希特打算按卢克莱修《物性论》的风格以六步韵诗的形式重写《共产党宣言》的热情。在1945年他把他的诗稿送给柯尔施评论。他的信是这样结尾的：“我希望您不要悲叹得太多；您知道您是我生活的导师，放心好了。您的亲爱的老布莱希特。”^{②⑥}柯尔施对布莱希特的影响有多么深，这是不清楚的；要证明布莱希特在发展自己的戏剧观时为柯尔施的意识形态斗争理论所影响，也是一个思辨性问题。同样，柯尔施和卢卡奇在他们理论工作上的内在差异是否更清楚地反映在卢卡奇和布莱希特的互相抵触的美学理论上，也是无法肯定的。布莱希特和柯尔施在政治上是不一致的，但有一次布莱希特写信给柯尔施说，“我们对于苏联评价长久以来就不一致，但我几乎相信，您对于苏联的立场不是唯一从您

②④ 《卡马·马克思》第169页。

②⑤ 参见《抉择》第41号中有关柯尔施和布莱希特的论文。这包括柯尔施对布莱希特的富有诗意的《宣言》草稿的评注，柯尔施著作节选和一篇W.拉希论柯尔施的文章；《布莱希特的马克思主义教师》。

②⑥ 《抉择》第41号，第45页。

的科学发现中推导出来的。”^⑲当柯尔施出现在布莱希特的《墨翟：变易之书》中时，显而易见地被乔装为“柯”和“卡奥什”，两人之间讨论的主要话题是斯大林主义。

从1936年到1961年去世，柯尔施一直生活在美国。1943年到1945年期间，他在新奥尔良的图拉恩大学教社会学，从1945年直到1950年，他在纽约的国际社会研究所工作，同时发表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⑳。他还和柯尔特·列文(Kurt Lewin)一起进行过场论的研究，其迹象可在他的《卡尔·马克思》中对于定量化和经验调查的强调中找到^㉑。

到了50年代初期，无论如何，柯尔施明显地为他的孤独处境和日渐增长着的悲观思想所苦恼。在流亡中，中断了与政治斗争的任何直接关系，在冷战高峰时期的写作，这使他陷入了绝望，放弃了与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联系^㉒。但在1953年之后，他希望复苏了的苏联能有变化。在晚年，他对殖民地世界有了日益增长的兴趣。在中国革命胜利前，他为一本有计划地编选的毛泽东论文集写了导言，强调其理论上的独创性；他对亚洲和非洲的发展，有了一个乐观的看法^㉓。

1956年，他做了最后一次欧洲旅行，并在同年患上了慢性的致命的疾病。1961年10月21日，他死于马萨诸塞州的贝尔蒙特。他的妻子赫达·柯尔施博士在世更久。

^⑲ 《抉择》第41号，第99页。

^⑳ 《为什么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现代月刊》，第IX卷，第2页)，以及在《委员会通讯》、《现代季刊》、《活着的马克思主义》和《党人评论》上的其他文章。

^㉑ 《卡尔·马克思》第236页，参见卡尔·柯尔施和柯尔特·列文的《心理学和社会学中的数学构造》(《统一科学杂志》，1939年第9卷)。

^㉒ 见《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法文版的附录，第185—187页。

^㉓ 毛泽东强调的革命观念是具体力量，与柯尔施关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命题有某种类似之处。关于他对殖民地世界的兴趣，见《独立来到菲律宾》(《亚洲》1947年，第21期，第11页)。

柯尔施是 20 年代和 30 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最令人感兴趣、最具独创性而又反复无常的一个人^②。在他的同时代人当中,他不仅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而且对于先前的资产阶级古典思想家们的著作,都有着罕见的知识和理解力。他的不幸命运是由于他对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的不强调,他本人和他的工作都成了列宁死后欧洲工人运动斯大林化的牺牲品。拒绝接受官僚化了的德共政治领导,使他陷入了极左的观点,并离开了工人阶级;在流亡中,他最终放弃马克思主义。他个人的道路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许多不幸结果之一。但是,今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重新出现的革命阶级的政治,已经再度对他的著作发生兴趣,并为马克思主义者重新批判地评价他的著作提供了一个机会。

弗雷德·哈利迪

1970年7月

^② 最近关于柯尔施思想的最权威和最全面的讨论,见 G.E.拉索尼的《批判的理论》(波罗尼亚,伊尔·马利诺,1968年),吉塞波·瓦卡的《卢卡奇还是柯尔施?》(巴里,戴多纳多,1969年)。两本书都讨论了柯尔施对于卢卡奇的关系,讨论了《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英文版说明

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以及他的《反批判》的这个英文版，译自1966年欧洲出版社重印的1930年的德文版原文。它不包括写于1922—1924年期间的另外三篇较短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论文，柯尔施曾把它们收入1930年版，主要地是对已经包含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的命题的重述。抽去那三篇文章之后，我又加进了两篇重要的早期论文，它们举例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关于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具体历史关系的研究——所介绍的马克思著作的方法论。第一篇是论述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的，用作《哥达纲领批判》1922年版的导言；第二篇《第一国际的马克思主义》，1924年发表在《国际》杂志上。

柯尔施著作的翻译，碰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部分地是由于一般与黑格尔术语的英文翻译相关联的困难，部分地则是由于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所采用的极为难懂和错综复杂的文体，这种文体有时表现为大量的插入语、限定语、重

复和重新阐述。这次翻译的目的是要提供一个清晰的和可读性强的英文译本,文中的句子免不了被拆开和重新组合,以便使它们更容易理解。

黑格尔的术语“*Aufhebung*”有多种译法,如“*supersession*”(取代、废弃)、“*transcendence*”(超越)和“*abolition*”(废除、取消),这些词在它们出现之处,都是最恰当的〔德文“*Aufhebung*”一词,中文一般译为“扬弃”——中译者〕。“*Geist*”和“*geistig*”通常译为“*mind*”(心、精神)和“*mental*”(心的、精神的)、“*intellect*”(理智)和“*intellectual*”(理智的),因为英文中“*Spirit*”(精神、心灵)和“*Spiritual*”(精神的、心灵的)两个词比德文中的相应词有着更强烈的宗教涵义。“*Wissenschaft*”有时译作为“*science*”(科学),有时则译为“*knowledge*”(知识)。

我尽可能对柯尔施所用的引文都指出英文出处,但有时对所用的译文作了变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的英文版用如下版本: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1962年莫斯科)两卷本(第1卷包括《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国际工人协会的开幕词》,第2卷包括《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宗教》(莫斯科,无出版日期),包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劳伦斯和威沙特,伦敦,1965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芝加哥,1904年,虽然《序言》在《选集》中更易找到,但出处须查此书);《反杜林论》(莫斯科,1959年);《资本论》第1卷(莫斯科,1961年)。列宁著作请参考《列宁选集》的莫斯科英文版。

弗·哈利迪

目 录

在研究当代各种思潮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

丛书的出版而作徐崇温

中译本序 (1)

英译本导言弗雷德·哈利迪(8)

英文版说明弗·哈利迪(25)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年)(1)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

现状(1930年)(55)

《哥达纲领批判》导言(1922年)(92)

第一国际的马克思主义(1924年)(114)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1923年)

“我们应该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组织系统的研究”。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直到最近，不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这一事实，都没有较多的了解。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来说，马克思主义充其量不过是19世纪哲学史中一个相当不重要的分支，因而就把它当作“黑格尔主义的余波”而不予考虑^①。但

^① 库诺·费舍在他的九卷本《近代哲学史》论述黑格尔哲学的两卷中，只用了一页的篇幅论述黑格尔哲学同（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第1170页）。他认为，这两种主义各自的创始人是拉萨尔和马克思。关于后者，只用了两句话便很快了结了。他引证黑格尔只是为了间接地给他的同行一点侮辱。在宇伯威格的《19世纪初到现代的哲学史概论》（第11版，奥地利，1916年）一书中，只有两页（第208—209页）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著作，只

是，“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不想大力强调他们理论的“哲学方面”，尽管这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诚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自豪地指出，在历史上，德国工人运动在“科学社会主义”中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主要是哲学^③。他们毋宁说是把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看作不仅明确克服和取代全部早先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形式和内容，而且也克服和取代全部哲学的形式和内容。在后面，我将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初观点，更详细地解释这种取代的性质是什么或者打算是什么。这里我只表明，在历史上，就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而言，这个问题简直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他们对待哲学问题的方式，完全可以用恩格斯有一次在谈到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态度时使用的生动语言来描述，那就是简单地把它“随便扔在一边”^④。事实上，正是许多看上去最正统地依照导师指示行事

用了几行字提及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说它对于哲学史是重要的，并把它定义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的完全颠倒”。F·A·朗格在他的《唯物主义史》中，仅仅在一些历史的注脚中提到了马克思，他把马克思描述为“现存的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史专家”；他没有注意到作为理论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在那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写有专著的作者那里，这种态度也是典型的。参见贝诺·爱德曼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前提》，载《法律、管理和国民经济年鉴》第31卷（1916年）第919页及其后诸页，尤其是第970—972页。进一步的例证，将在本文后面提及。

- ② 这一点在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著名的结束语中得到了详细的说明。类似的论述几乎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从他们许多不同的生活时期中发现。例如，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一版序的最后一句。
- ③ 尤其参见在1847—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对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驳斥和恩格斯在《1892年工人党年鉴》上发表的关于德国社会主义的一篇文章的导论。恩格斯把1848年以前的从一开始就由马克思的名字支配的德国社会主义，描述为“一个从黑格尔哲学的废墟上产生的理论运动”，显然完全与资产阶级哲学历史相符合。他称这一趋势的追随者为“过去的哲学家”，并且直接地把他们与构成两种趋势的另一派的“工人们”相对照，这两种趋势在1848年融合成了德国共产主义。
-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219页。

的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却以同样随便的方式去对待黑格尔哲学乃至全部哲学。例如，梅林不止一次简单地描述过他自己关于哲学问题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见解，认为他接受了“大师们不朽成就的前提”：“抛弃所有的哲学幻想”^⑤。作出这一论述的这个人，可以公正地说他比任何人都更彻底地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起源。这一点对于在第二国际(1889——1914)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当中看到的在全部哲学问题上一般的占支配地位的见解来说，是极为有意义的。这个时期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关心那些在较狭窄的意义上甚至根本不是哲学问题的问题，而仅仅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有关的问题，不过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当然，不论他们是否喜欢，他们都允许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和在某些他们自己参与的情况下讨论这样的哲学问题。但是，当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要人们明白，这些问题的阐明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践是全然无用的，并且将必然总是如此^⑥。然

⑤ 《新时代》第28年卷第1分卷第686页。在梅林的《马克思传》中，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那一章里，有类似的论述(见《马克思传》中文版第142页及其后诸页)。比较一下梅林的论述与古斯塔夫·迈耶的《恩格斯传》的相应部分(《恩格斯传》1920年，第234—261页)，人们可以看到梅林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著作(遗憾的是，这些著作仍然没有完全出版)的意义理解得如此之少。(英译者注：迈耶写的传记的1956年英文版是一个德文原版的简缩和重写的译本，不包含柯尔施提到的有关章节。)

⑥ 这方面令人感兴趣的一个例子是一次小的冲突，其迹象可以在《新时代》第26年卷第1分卷第695、898页上找到。编者(卡尔·考茨基)付印了一篇关于正由他出版的波格丹诺夫的《马赫与革命》一文的一个介绍性评论。在这篇评论中，那个未具名的译者感到他有必要责备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因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极其严重的策略分歧”，“由于这种在我们看来同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上是与斯宾诺莎和霍尔巴赫一致还是与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一致的这一完全无关的问题的争论而加剧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无产者报》编辑部(即列宁)被迫答复这一问题，认为“这种哲学上的争论事实上并不是派别的争论，而且编辑部认为这也不应当成为派别的争论。”(《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声明，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24页)然而，众所周知，写这个表面

而，这种观点之所以是不证自明的，并且之所以在逻辑上有道理，其必备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实践在本质上是全然不可变化、并且不包含任何哲学问题上的特定立场的。这意味着，例如，一个第一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他的个人哲学生活中不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叔本华的追随者的。

因此，在那个时期，无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资产阶级理论在所有其它方面有着多大的矛盾，这两个极端在这一点上却有着明显的一致之处。资产阶级的哲学教授们一再互相担保，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学内容，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一再互相担保，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从其本性上来讲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但还有从同样的基本观点出发的第三种倾向，在整个这个时期内，这是唯一多少更彻底地关心社会主义的哲学方面的倾向。它由各种“研究哲学的社会主义者”所组成，他们声称他们的任务是用来自文化哲学(Kulturphilosophie)的观念或者用康德、狄慈根、马赫的哲学概念或别的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然而，正是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体系需要哲学的补充，他们也就使人们明白了，在他们的眼里，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缺乏哲学内容的^⑦

上的否认声明的那个人，那个伟大的策略家列宁，在同年稍后却发表了他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 ⑦ 他们把这一点归之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弱点，而不像“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把它归之为社会主义从哲学向科学的发展所标示的进步；但是，这意味着他们企图搭救整个或部分仍然存在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从这一点出发，在资产阶级科学和无产阶级科学的战斗中，他们站在他们的资产阶级对手一边。只要可能，他们就企图回避这个不可避免的结局。但是，1914年的以后的危机和战争使继续回避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成为不可能的了，并且，所有哲学化的社会主义的真正特征要多清楚就有多清楚了。不仅那些公开的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化的社会主义者，如伯恩斯坦和科伊根(Koigen)，

现在很容易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关系上的这种纯粹否定的观点——我们已经证明这种观点是资产阶级学者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显然一致的看法——都是起因于对历史和逻辑的发展非常肤浅和不完整的分析。但是，他们双方由以得出这个结论的那些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却是大相径庭的，因此我要分别地描述它们。那时，人们将会清楚，尽管二者的动机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的原因在一个决定性的地方却是一致的。在19世纪后半期的资产阶级学者中，存在着对黑格尔哲学的极度漠视，这与完全不理解哲学对现实、理论对实践的关系相一致，但这种关系却构成了黑格尔时代的全部哲学和科学的生存原则。另外，马克思主义者们同时也以完全同样的方式日益倾向于忘记辩证法原则的原初意义。然而，两位年轻的黑格尔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当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离开黑格尔时，他们是完全自觉地脱离德国唯心主义

而且大多数哲学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康德主义的、狄慈根主义的、马赫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那时起，在言论和行动上都已表明，他们并未真正超出资产阶级社会的观点。这一点不仅适用于他们的哲学，而且就其必然的延伸而言，也适用于他们的政治理论和实践。用不着提供证明康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特征的例子，因为几乎无人怀疑这一点，至于马赫的马克思主义必然引导他的追随者前进的路线（已经引导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列宁已在1908年与经验批判主义的论战中作了清楚的阐明。狄慈根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沿着同样的道路走过了一大段，这点已由狄慈根的儿子所写的一本小册子（1923年）所表明。这位相当天真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因为他的“保证人”考茨基已经抛弃了最“旧式的马克思主义”而祝贺他，而且表达了自己的遗憾：考茨基又学到了这么多东西，可惜没有留下一点痕迹（第2页）。但是，当戴维·科伊根面临着像这样一些哲学幻想而全然抛弃了哲学时，他却成了梅林的政治本能是多么坚定的最好例证。要明白这一点，只需要读一读梅林对科伊根的全然未成熟的早期哲学著作的极其周详的批判（《新马克思主义》，《新时代》第20年卷，第1分卷，第385页及其后诸页，马克思恩格斯的《遗稿》第2卷第348页），然后也就明白了这位哲学家科伊根在伯恩斯坦的支持下，在1903年如何迅速地发展成了最肤浅的“文化社会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最终成为一个最混乱和最反动的浪漫主义者的行迹（关于最后这一方面，例见科伊根在《政治杂志》上的文章，1922年，第304页以下）。

哲学,并转变到关于历史和社会的唯物主义观念上来的^⑧。

首先,我将概述为什么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已经日益抛弃辩证的哲学史观,为什么他们因此便不能够恰当地分析和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立本质及其在19世纪哲学的总的发展中的意义。

或许会有人争辩说,有着更多的忽视或误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由,因此,绝对不需要我们以辩证法的被抛弃来解释它的被压抑。诚然,在19世纪的哲学史著作中,自觉的阶级本能无可否认地有助于草率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也有助于同样草率地对待像大卫·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这些“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的学说。但是,如果我们简单地谴责资产阶级哲学家们有意识地使他们的哲学或哲学史从属于其阶级利益,那么,我们对于那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情况就只是有了一个很粗糙的观念。当然,有一些符合于这种粗糙命题的例子^⑨。但是,一般地说来,一个阶级的哲学代表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更复杂得多。马克思在他的《雾月十八日》中,特别地论述了这种相互

⑧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参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的末尾所作的类似论述。

⑨ 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冯·赛多在他的《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中关于理想王国的思想》中所作的下列论述:“就理想的观念被历史化而言,它失去了它的爆发力,因为在德国唯心主义中,正是理想给予历史以逻辑性,并把它从一连串的事件变成一系列的概念。如果理想是一个逻辑—历史的必然性,那么,为之努力奋斗是不成熟的和无意义的。对理想概念的这种阐明,是绝对唯心主义者的成就。如果我们今天的社会和经济秩序盛行到可预见的未来的话,那我们是应该感谢他们的。当统治阶级把自身从唯心主义的历史幻影中解放出来,并且经常地把他们的行动意志变为行动的勇气时,无产阶级却仍然信仰那来自唯心主义体系的唯物主义残骸。应该估计到,这种巧妙的情形将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像在所有别的基本问题上一样,对这一成就最有贡献的是费希特。”在注脚中,冯·赛多十分明确地说,这一事实“可以用于反对那些或多或少地公开宣称哲学在政治上不重要的人”。

联系。他说,从其“物质基础”中,整个阶级创造和形成了“各别上层建筑全体;并且特别地形成了感情、幻想、思想方式和生活的观点”。这样由“阶级决定”的而又特别远离其“物质和经济基础”的一部分上层建筑,就是我们所说的阶级的哲学。就它的内容而言,这最为明显;但在上一个例子中,这也适合于其形式方面^⑩。如果我们懂得资产阶级哲学史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的完全误解,并且在马克思的哲学这个用语的意义上、即“唯物主义地因而是科学地”真正理解它^⑪,那么,我们不应当满足于直接地用它的“世俗的核心”(即阶级意识和“隐藏于其中的”经济利益)去解释这种现象。甚至那些以最大的“客观性”试图忠实地考察“纯粹”真理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也必定要完全地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或者只能以一种不适当的和肤浅的方式来解释它。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详细地表明这种现象的原委。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最重要的原委无非是这一事实: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全部资产阶级哲学,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史著作,出于社会经济的原因,已经抛弃了黑格尔哲学和辩证的方法。它已经返回到这样一种哲学的和写哲学史的方法,这种方法使得它几乎不可能从像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这样的现象中得出任何“哲学的”东西来。

^⑩ 关于这一点,参见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尤其是第629和632页(关于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还有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250页)中关于哲学的论述。在这一方面,也可以引证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的论述,该文一般地批判了这么一种企图:它以“探究个人意识”来解释哲学家的错误,而不是客观地“重建他的意识的本质形式并把它们提升为一定的结构和意义,从而超越它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0卷第257页,此段话与中文版有较大出入,故重译——译者。)

^⑪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09—410页。在那里,马克思在讨论宗教的历史时,描述了他提出的作为“唯一的唯物主义的、因而是科学的方法”。下面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在资产阶级作者作出的关于 19 世纪哲学史的正规论述中,在一个特殊点上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只能以非常勉强的方式克服。这些历史学家们以一种完全观念形态的和无可救药的非辩证的方式,把哲学思想的发展表述为纯粹的“观念的历史”的过程。因此,不能指望他们会合理地解释这样的事实:到 19 世纪 50 年代,黑格尔的宏伟哲学在德国事实上已没有追随者,并且在不久之后被全然误解,而在 30 年代之前,甚至它的最大的敌手(叔本华或赫尔巴特)也不能避免它的强烈的思想影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不打算做出这样一种解释,而只是满足于在他们的编年史中,在“黑格尔主义的衰败”这种完全否定的标题下,记下随黑格尔死后而来的争论。然而,这些争论的内容是很有意义的,而且从今天的标准来看,它们也是有着极高的正式哲学的水平的。这些争论发生在黑格尔学派的多种不同倾向之间;这些倾向有右派、中间派和不同倾向的左派,尤其是有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左派。为了结束这一时期,这些哲学史家对于黑格尔主义的哲学运动确定了一种绝对的“终结”。然后,他们就以回到康德(赫尔姆霍茨、泽勒、李普曼、朗格)来开始论述 19 世纪 60 年代,似乎这是一个新的哲学发展时代,而与此外的任何事情没有任何直接联系。这种哲学史有三大局限性,其中两个表现在那种或多或少完全处于观念的历史的领域内的批判性修正上。的确,在近几年内,更彻底的哲学家们,尤其是狄尔泰和他的学派,已经在这两个方面大大扩展了正规哲学史的有限的眼界。因此,可以认为这两个局限已经在原则上被克服了,尽管在实际上它们已延存到了今天,并且大概还将继续很长的时间。然而,第三个局限无论如何不可能在观念历史的领域里被克服;因此,它甚至仍然没有被当代资产阶级哲学史家们在原则上克服。

19 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哲学史的三个局限性的第一个,可以

表述为一个“纯粹哲学的”局限性。当时的理论家们没有看到，哲学中包含的那些观念，不仅能存在活哲学之中，而且能同样好地生活在实证科学和社会实践之中，而且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黑格尔哲学那里开始的。第二个局限性是“地域的”，这在上个世纪后半叶的德国哲学教授中最为典型：这些可尊敬的德国人无视在德国的界限之外还有其他哲学家这一事实。因此，除了极少数例外，他们完全没有看到，尽管黑格尔体系在德国被宣布死了好几十年，但它仍然继续在其他几个国家兴盛，不仅是在它的内容上，而且也是在它的体系和方法上。经过了近几十年的哲学史的发展，限制着它的前景的这前两个局限性已在原则上被克服了，自从1850年以来，印在标准的哲学史上面的那幅图景近来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善。然而，依靠其历史观，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根本不能克服第三种局限性，因为这将使得这些“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们抛弃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而这个立场正构成了他们全部历史和哲学科学的先天本质。事实上19世纪纯粹的“观念的”哲学发展这种现象，只有同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历史发展相联系，才能从实质上被充分把握。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家们，在他们发展的现阶段，是不能够审慎而公平地研究这种关系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直到现在，对于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家们来说，19世纪哲学总的发展的某些阶段，不得不仍旧是“超验的”阶段的原因。它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当代资产阶级哲学史的地图上，仍然有一些古怪的“空白点”的原因（这一点已联系到19世纪40年代黑格尔哲学运动的“终结”和此后在60年代哲学的“复苏”之前的空白，进行了描述）。同时这也使人们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的哲学史今天甚至不能前后一致地把握它以前已经成功地理解了其具体实质的德国哲学时期。换言之，黑格尔之后哲学思想的发展，以

及以前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进化，都不能被理解为纯粹的观念的链条。任何理解这整个较后时期——在历史书中，正规地称作“德国唯心主义”时期——的完整实质和意义的企图，只要忽视了或仅仅肤浅地和陈腐地了解某些对于它的整个形式和过程是生死攸关的联系，必将可悲地归于失败。这些联系就是那个时期的“思想运动”和同时代的“革命运动”之间的联系。

在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和其他著作中，有几个描述他的直接先驱——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本质的段落，对于整个所谓的“德国唯心主义”时期，包括它的最高结果黑格尔体系自身，都是有效的。它们也适用于后来的40年代在黑格尔学派各种倾向之间的争辩。黑格尔写道：在这个根本革命时期的哲学体系中，“革命是通过思想形式概括出来了、表达出来了。”^⑫黑格尔的补充说明使人们明白了，他所谈的不是当代资产阶级哲学史家喜欢称之为思想革命的东西——一个审慎地、平静地发生在纯粹研究领域并远离粗俗的现实斗争的过程。资产阶级社会在其革命时期产生出来的这位最伟大的思想家认为，“思想形式的革命”是整个社会现实革命过程的一个客观的组成部分^⑬。“世界历史上这一个伟大的时代（其最内在的本质将在历史哲学里得到理解），只有两个民族，即日耳曼民族和法兰西民族参加了，尽管它们是互相反

^⑫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文版第4卷，第240页。

^⑬ 康德在纯粹思想领域中也喜欢使用“革命”这个表达词。但我们应当说，他在此意指着比当今资产阶级的康德主义者更具体得多的东西。这应当联系到康德在《学科间的纷争》和在其它地方关于现实革命事件的许多论述：“一个在思想上有天赋的民族——比如我们今天正在目睹着的一个民族——的革命，唤醒所有的旁观者（他们本身不是直接卷入者）以几乎近于热烈的方式去赞同革命。”“在人类历史上这种现象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这种事件太伟大、太与人类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它的影响太广泛地遍布世界，以致人民将不能不记得它，并且当环境顺利的时候，不能不觉醒起来再次企图实行它。”康德的这些论述以及类似的论述被收入《十八世纪德国政治文献》（1847年！）第1卷中（第121页及其后诸页），盖斯玛尔（Geismar）编。

对的，或正因为它们是互相反对的。别的国家并没有参加到里面来，虽说它们的政府以及它们的人民在政治上参加了，但不是在内在精神上参加了。这个原则在德国是作为思想、精神、概念，在法国是在现实界中汹涌出来。这个原则出现在德国现实生活中，显得是一种外部环境的暴力和对于这种暴力的反动。”^⑭在几页后，在论述康德哲学的时候，黑格尔又论述了同样的命题：“卢梭已经把自由提出来当作绝对的东西了。康德提出了同样的原则，不过主要是从理论方面提出来的；法国人则从意志方面来掌握这个原则。法国人常说：‘他头脑发热’（I Lafafetepres du bonnet）；意思是说，法国人具有现实感，实践的意志，把事情办成的决心，——在他们那里观念立刻就能转变成行动。因此人们都很实际地注重现实世界的事务。尽管自由本身是具体的，但自由在被他们应用到现实世界时却仍然是未经发展的、抽象的。要想把抽象的观念生硬地应用于现实，那就是破坏了现实。人民群众把自由抓到手里，所表现出来的狂热荒诞实在可怕。在德国，同一个自由的原则占据了意识的兴趣；但只是在理论方面得到了发挥。我们在头脑里和头脑外面发生了各式各样的骚动；但德国人的头脑却仍然可以很安静地戴着睡帽，坐在那里，让思维自由地在内部进行活动。——伊曼努尔·康德 1724 年生于哥尼斯堡”，等等。黑格尔的这些段落肯定了一条原则，这原则使得这一世界历史的伟大时期的最内在本质成为可理解的了；这就是哲学和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别的

^⑭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文版第 4 卷，第 240 页。众所周知，马克思充分接受和有意识地发展了黑格尔关于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日尔曼和法兰西两个民族所扮演的角色分工的观点。参见所有他的包含有这样论述的早期著作：“德国人在政治上考虑过的正是其他国家做过的事情”，“德国人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了现代各国的发展”，因此，德国人在现实世界里的命运在于他们“和现代各国一起经历了复辟，而没有和它们一起经历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8、10、3 页）。

地方,黑格尔以一种更一般的方式概括了这一原则。他写道,每一种哲学不过是“被掌握在思想之中的它自己的时代”^⑮。无论如何,这一公理对于真正理解哲学思想的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对于社会进化的革命时期来说,甚至是更为中肯的。的确,正是这一点解释了19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发展和哲学史研究不可避免地面临的命运。在19世纪中叶,这个阶级在它的社会实践中不再是革命的了,并且,由于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它也因此再不能在思想上把握观念和现实的历史发展之间尤其是哲学和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了。在社会实践中,资产阶级的革命发展在19世纪中期衰退和停止了。这一过程在其哲学发展的明显衰退和终结中得到了意识形态上的体现;对于这一点,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们至今仍在考究着。这种思想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宇伯威格和海因泽的评论,他们在他们著作的有关部分一开头说,哲学发现自己在这个时代“处在一种普遍的枯竭状态之中”,“日益失去了它对于文化活动的影响”。在宇伯威格看来,这种可悲的状况首先应归于“心理突变的倾向”,而一切“外部要素”只有次要的影响。这位著名的资产阶级哲学史家这样对他自己和他的读者“解释”这些“心理突变倾向”的特征:“人们既厌倦了自我膨胀的唯心主义,也腻烦了形而上学的臆测(1),并且需要有更丰富的精神养料。”如果19世纪的哲学发展被坚决而彻底地以辩证的方法来对待,即使是以黑格尔所使用的那种不发达和部分地有意识的形式,即以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相对立的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形式,那么,19世纪的哲学发展就会立即以全然不同的形式显现出来(甚至从观念史的观点看,也是更为合适的形式)。

从这种观点看,观念领域的革命运动与其说是在19世纪40

^⑮ 《法哲学原理》中文版序言第13页。

年代减弱和最后地停止了，勿宁说只是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和有意义的特征的变化。德国古典哲学，这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表现，并未退场，而是转变成了一种新的科学。这种科学以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般表现而出现在观念的历史上。这就是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40年代发现和系统论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家们至今或者是全然无视在德国唯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这一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或者只是不适当地和不连贯地想象和描述它。为了真正地把握它，必须抛弃现代哲学史家们的常规的抽象的和观念形态的方法，而代之以一种不必专门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一定是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意义上直接辩证的方法。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一下子不仅看到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也看到它们的内在必然性，既然马克思主义体系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那么，它们必然在精神和历史上（即在意识形态上）彼此处于联系之中，就像在社会政治实践领域里，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处于联系中一样。在历史发展中，有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在其中，“自发的”无产阶级运动是从第三等级的革命运动中发展出来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理论也“自发地”与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相对峙。所有这些过程都是交互地彼此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现，用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仅仅是现实的无产阶级运动出现的“另一个方面”；正是这两个方面一起构成了这一历史过程的具体整体。

这种辩证的方法使我们能够把上述四种不同的趋势——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四种要素来把握。这样便使我们能够理解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理论上系统阐述的新科学的真正本质^⑩，这一科学构成了无产阶级独立的革命运动的一般表现形式。这一唯物主义哲学是从最先进的革命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体系之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的哲学史或者全然漠视它，或者只能在否定的和完全颠倒的意义上理解它的实质^⑪。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实践目标不能够在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中实现，同样地，这种资产阶级社会的哲学不能够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独立的和自我意识的表达方式的那些一般命题。资产阶级的观点在理论上不得不停留在它在社会实践中不得不停止下来的地方——只要它还没有打算不再作为“资产阶级的”观点，废弃自身。只有当哲学的历史超越了这个障碍时，科学社会主义才不再是一个先验的彼岸世界，而成了一个能够把握的对象。但是，使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正确理解复杂化的特性是：好像在超越资产阶级

⑩ 参见《共产党宣言》中阐述黑格尔关于哲学和现实的相互辩证关系的观点的著名章节；它从黑格尔表述的仍然有点神秘的方式（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自己的时代”）转换成了合理的形式：“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面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64页）

⑪ “一个黑格尔哲学分解的产物”（流行的观点）。“德国唯心主义的泰坦的堕落”（普伦格）。“一个植根于价值的否定之中的世界观”（舒尔策—加文尼茨）。这种观点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个从德国唯心主义的顶点堕入唯物主义地狱的无底深渊的邪恶幽灵。这种观点的荒谬性特别清楚地表现在这一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那些被看作为它的堕落结果的方面，已经包含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之中，被马克思不加任何明显的改变而采用。例如，恶对于人类发展是必然的观念（康德，黑格尔）；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日益增长着的财富和日益增长着的贫困之间的必然联系观念（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44~245节）。这些正是资产阶级在它最发达的阶段由以获取某种对它自身的阶级矛盾的意识形式。资产阶级的意识使这些矛盾成为绝对的，并因此而把它们看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解决的。马克思抛弃了这种意识，因为他不再把矛盾看作是自然的和绝对的，而是看成历史的和相对的。因而，能够在实践和理论上用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去消灭它们。这些资产阶级哲学家们无视这一点，仍在以一种狭隘的、消极的和虚假的资产阶级形式来想象马克思主义。

立场的局限这一行动——一个对于把握本质上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必不可少的行动——中，马克思主义自身作为一个哲学的对象就立即要被废弃和消灭。

在这一考察的开始，我们表明了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远非要建造一个新的哲学。相反，与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相比较，他们两人充分地意识到了在他们的唯物主义理论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之间的密切的历史联系。在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在它的内容上是一些新观念的产物，而这些新观念必然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在作为其物质状况的产物的无产阶级中产生出来。但是，它依靠它和德国唯心主义，尤其是和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联系，创造出了自己特殊的科学形式（这一形式使它有别于空想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成科学的社会主义，从形式上看产生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之中^⑮。自然，这种（形式上的）哲学根源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因此不得不是具有独立形式并将进一步发展的哲学。至少，从1845年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再把他们的新唯物主义的和科学的见解表述为哲学的见解^⑯。在这里，我们应当记得，对他们来说，全部哲学等同于资产阶级哲学。但是，全部哲学和资产阶级哲学相等同的意义，仍然是需要特别强调的。因为它

^⑮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51、64页。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甚至在理论上也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唯一来源问题，参见恩格斯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一版序言所加的注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377页），亦见他关于《傅立叶论商业片断》的评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54页）。

^⑯ 后面要讨论的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注明日期是这一年。也正是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参看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中的说明）通过对全部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而抛弃了他们的“早期的”哲学世界观。从那时起，在哲学问题上他们进行论战的目的只是为了说服或者击败他们的对手（如蒲鲁东、拉萨尔和杜林），不再倾向于“澄清他们自己的见解”了。

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像马克思主义和国家的关系那样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反对一种特殊历史形式的国家，而且他们也历史地和唯物主义地把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等同起来，并因此宣布废除国家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目标。同样，他们恰恰不是反对特殊的哲学体系——他们要用科学社会主义最终克服和取代哲学^{②①}。在这里，我们发现，在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与拉萨尔主义和所有早期和晚期的形形色色的“粗陋的社会主义”所特有的“法学家和其他人的意识形态的谎言”之间有严重的矛盾。后者基本上从未超越“资产阶级的水平”，即“资产阶级社会”的见解^{②②}。

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关系的彻底的阐述，必须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自己的明确论述出发。他们认为：他们的

^{②①} 首先参见《共产党宣言》的有关章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71—272页）。“诚然，——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以及其他观念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是不断改变的。但是，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本身在这种变化中都始终保存着’。‘此外，还存在着永恒的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这些真理是社会发展的所有阶段所共有的。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的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相矛盾的。’这种责难有什么意思呢？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各个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不管这种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种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因此，马克思主义同哲学或宗教的关系，基本上类似于它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的经济意识形态和商品或价值的拜物教的关系。此处参见《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第87页及其后诸页，尤其是第98页和99页的注释；以及马克思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关于“价值”、“国家”和“宗教”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16—24页。）

^{②②} 参见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5页。

新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不仅要取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而且同时要取代全部哲学^②。最根本的是，不要搞混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的这种态度的基本意义，把整个争论看作是纯粹词句上的。这里的意思是指，有人会认为恩格斯只是对在黑格尔术语中作为“科学的哲学方面”的某些认识论原则给予了新的名称，这些原则实质上是被保留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变体之中的^③。当然，在马克思那里，尤其是在较后的恩格斯那里^④，有一些论述暗示这一点。但是，哲学自身没有由于只是废除它的名称而被废除，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⑤。在任何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关系的严肃考察

② 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216页）中的观点。那种观点在它的那种表达形式上，听起来有几分是意识形态的：“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它（虽然是不自觉的）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

③ 事实上有那么一些资产阶级的，甚至（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严肃地想象，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要求废除国家（不同于反对国家的特殊的历史形式）的时候，只涉及术语上的不同。

④ 特别参见《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60—65页）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253页）。这两段的论述具有同样的内容。这里的一段是从《反杜林论》中摘引来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即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⑤ 就这里引证的那段话的形式而言，恩格斯的论述所包含的显然不止是一个名称的变化。在恩格斯断言为马克思主义的或者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结果的东西与黑格尔已经表明是他的辩证的唯心主义见解的结果的东西之间，看起来没有原则上的不同，甚至黑格尔也要求每门科学都清楚它在总联系中的地位；然后他沿着下列思路继续说：由此可见，每一门真正的科学必然是哲学的。从字面上看，这里要求的东西是同恩格斯把哲学变为科学的要求对立的；但是，它们在实质上是意指同样的事情。二者都要克服个别科学和凌驾于其上的哲学之间的矛盾。黑格尔通过把各个别科学合并于哲学之中表达了这一点；而恩

中,必须不考虑这种纯粹术语学的观点。问题毋宁是,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在19世纪40年代,但也在后来的许多场合讲述的废除哲学的话。这一废除过程应当如何完成?或者它是否已经完成?通过什么行动来完成?以什么样的速度完成?是对于谁来说的?也就是说,这一废除哲学应当被看做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次思想上的行动而一劳永逸地完成的吗?它的完成应当被认为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的呢,还是对于全体无产阶级,或者对于全人类来说的呢^②?或者,我们是否应当把它理解为(像国家的废除一样)一个非常漫长和非常艰巨的,通过各个完全不同的阶段而展开的革命过程?如果是这样的,那么,只要这个艰巨的过程还没有达到它的最终目标,即废除哲学,马克思主义对于哲学的关系又是什么?

如果马克思主义对于哲学的关系问题被这样提出来,那么,很清楚,我们所涉及的不是对很久已解决了的问题的无意义的和空洞的反思。相反地,这一问题仍然有最大的理论上与实践上的重要性。的确,在无产阶级斗争的现阶段,这是特别具有决定意义

格斯则主张把哲学渗进各个别科学之中。在两种情况下,似乎有同样的结果:个别的科学不再是专门科学,同时哲学也不再是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了。然而,后面将表明,在黑格尔和恩格斯之间是纯粹字面上的不同这一现象背后,有着更多的东西。这种差别在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中,特别是他后期的论述中,不像在那些马克思单独写作的或与恩格斯合写的早期著作中表达的那样清楚。在这里重要的东西是,尽管恩格斯总是避免说“实证科学”,但他仍然要在“哲学”(思维及其规律的理论——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内保留一块有限领域的独立性。当然,这里引起的重要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他们的科学或实证科学的概念到底意指着什么。

- ② 后面将表明,甚至一些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也不幸地近于接受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的观点。而且,前面引证的恩格斯的论述(上页注^②)能够被理解成这样的意思,实质上,哲学已经在思想上被黑格尔自己所无意识地克服和废除,然后由于唯物主义原则的发现而被有意识地取代。但是,我们将看到,尽管有这些现象,恩格斯阐述这一观点的方式还是没有能表达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真正含义。

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循规蹈矩几十年，好像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或者至多只有对于阶级斗争实践来说总是不重要的问题。这一立场现在显得极为含糊——按照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和国家这两个问题之间的正相对应情况，更是如此。众所周知，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说的那样，后一个问题“是第二国际的最著名的理论家和政治家们很少注意的。”^②这就产生了一问题：如果在废除国家和废除哲学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那么，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两个问题的忽视是否也有某种联系？这个问题可以更确切地提出来。列宁对机会主义者贬低马克思主义的作法的严厉批评，在更一般的情况下，是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问题的忽视相关的。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问题上，还有这种关联吗？换言之，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哲学的忽视也与“他们一般很少注意革命问题”这一事实有关吗？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中最大的危机的原因和实质作更详尽的分析。在最近十多年里，这危机已把马克思主义者分裂成了三个敌对的阵营。

在20世纪初，资本主义长期的纯粹进化的发展时期结束了，一个新的革命斗争时代开始了。由于阶级斗争实际条件的这个变化，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了危机阶段的日益增长着的迹象。很明显，追随者们的极其平庸的和残缺不全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甚至不能适当地意识到它自己的所有问题，更不用说对他们之外的一系列问题的任何明确的见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机，在社会革命对于国家的态度问题上，最清楚地表现出来。自从1848年的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失败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被镇压以来，这个重要的问题在实际上从来没有被严肃地提出过。世

^② 《国家与革命》第六章，《列宁选集》第3卷第259页。

界大战和 1917 年的第一、二次俄国革命,还有同盟国在 1918 年的崩溃再次把它具体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在诸如“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的最后消亡”这些目标和转变的主要问题,都存在着不一致。相反地,只要所有这些问题以一种具体的、不可避免的方式被提出,至少立即会出现三种都声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的理论见解。然而,在战前,这三种倾向的最杰出的代表——分别是伦纳、考茨基和列宁——不仅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被认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②。长达几十年,在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阵营内,已经存在着明显的危机;它采取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冲突的形式^③。但是,随着在这些新问题上不同的社会主义倾向的出现,很清楚,这次明显的危机不过是贯穿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路线自身的更深刻得多的裂缝的一个暂时的和虚幻的表现而已。在这个裂缝的一边,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新改良主义,它不久便或多或少地与早先的修正主义混合了。在另一边,新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代表在恢复纯粹的或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战斗口号下,发动了一个既反对修正主义者的旧改良主义也反对“中派”的新改良主义的斗争。

这一危机在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喷发出来。但是,把它仅仅归结为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贫困和被降

② 关于这些理论家在世界大战期间彼此之间的第一次争论的资料,请参看伦纳的《马克思主义、战争和国际》;考茨基对伦纳的抨击,《马克思研究中的战时社会主义》(维也纳)(第 4 章第 1 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和《反潮流》中对伦纳、考茨基和其他人的论战。

③ 参见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三次危机》,载《新时代》第 21 卷第 1 分卷(1903 年)第 723 页及其后诸页。

低到第二国际的正统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水平负责的理论家和政治家的怯懦,或者缺乏革命坚定性,却是一个极其肤浅的和非辩证的历史过程观——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和非唯物主义的,甚至也不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然而,设想列宁、考茨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大论战仅仅是倾向于通过忠实地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来恢复马克思主义,这也将是同等肤浅和非辩证的^③。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是运用黑格尔和马克思引入历史研究中去分析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从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那种辩证方法。但是,进行这种分析的唯一真正的“唯物主义的和因而是科学的方法”(马克思),应该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直到今天的进一步发展上。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试图去理解,自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它的时代的必然产物(黑格尔)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最早产生以来,它的

^③ 那些探讨过列宁的著作但对它们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前后联系缺乏较深理解的人,可能会认为列宁在事实上已接受了这些资产阶级的道德的、心理学的和意识形态的见解。可能引导他们误解列宁著作的东西,既有列宁用以抨击“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极其严厉和涉及人身的方式(在这方面是忠实的马克思的信徒),也有列宁在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方面对原文的博学和精确。但是,仔细阅读会相当清楚地表明,列宁从未求助个人因素去解释在国际上已发展了几十年的那个变化过程(通过这一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19世纪下半叶逐渐地贫困化,并堕落成为庸俗马克思主义)。他把他对这种因素的使用只限制在解释世界大战前最后一个时期的一些特定历史现象上,那时,即将来临的政治和社会危机是清清楚楚的。宣称列宁认为偶然的和个人的特性对于世界历史或者对于解释特定的历史现象是没有意义的,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大歪曲(参见马克思1871年4月17日致库格曼的著名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393页,以及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最后格言式的部分中关于“偶然事件的正当性”的一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13—114页)。另一方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果解释涉及较长时期,个人的因素自然必须只充当一个不重要的解释性角色。人们能够容易理解,列宁在他所有的著作中,总是以这种真正的“唯物主义的”方式写作。但是,《国家与革命》的序言和第一页证明了,他也恰恰没有认为这一理论著作的主要目的是在意识形态上“重新建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每一个变化、发展和修改。更确切地说,我们应当力图理解它们一般表达的历史—社会过程的总体对它们的决定作用(马克思)。这样,我们就能够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沦落为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根源。我们也可以辨明今天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恢复“马克思的真正学说”的热情的然而明显意识形态上的努力的意义。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历史,那么,我们就能够区分出自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以来所经历过的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根据这个时代的具体的社会发展,不可避免地是要这样的。第一个阶段开始于1843年前后,与观念历史中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相对应。它结束于1848年的革命——对应于《共产党宣言》。第二阶段开始于1848年6月战斗中巴黎无产阶级被血腥镇压和由此发生的“在一个疯狂的工业活动、道德沦丧和政治反动时期中”所有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和解放的美梦破灭,就像马克思在他的《1864年的开幕词》中机智地描述的那样。在这里我们不涉及整个工人阶级的社会历史,而只关注与无产阶级的一般阶级历史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部发展。因此,如果忽略一切不太重要的分界线(第一国际的建立和失败、巴黎公社的插曲、马克思主义者和拉萨尔派之间的斗争、德国的反社会党人法、工会、第二国际的建立)的话,我们可以说第二个阶段大体上延续到上个世纪之末。第三个阶段从本世纪初开始到现在,并延续到一个还不能确定的未来。

按这种方式来安排,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就呈现出下面的图景:在整个后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头脑中,它的第一次出现自然在实质上没有变化,虽然在他们的著作中它没有全然保持不变。尽管有所有这些对哲学的否定,但是这个理论的最初形态却是完完全全为哲学思想所渗透的。它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

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在这一阶段，毫无疑问，任何把这一整体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要素划分为知识的各个分支的作法，甚至在每一个分支的具体特征被把握时，都是以历史的忠实性去分析和批判的。当然，不仅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而且历史过程和有意识的社会行动，都继续构成了“革命的实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活的统一体。这一作为社会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早期和富有青春活力的形式的最好例子，显然就是《共产党宣言》^①。

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原初形式不可能在整个 19 世纪的下半叶（这在实际上是相当不革命的）的漫长时期保持不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整个人类的论述，对于工人阶级也必然是正确的。他在那里指出，人类是那么缓慢地和彼此对抗地向着它自身的解放发展：“所以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这一名言不为这样的事实所影响，即消灭现存关系的问题，可以在先前的时代被阐述。给予理论以一种在历史的客观运动之外独立存在的权利，显然既不是唯物主义的作法，也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法的作法；它只不过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作法。辩证的概念依据这一运动毫无例外地把握每一个形式；由此必然得出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革命理论在它的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当马克思在 1864 年起草那个《开幕词》和《第一国际章程》时，他完全意识到了“重新觉醒的运动要使

^① 但是，较晚一些的著作，如《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从历史上看也属于这一阶段。

人们能像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②。这一点不仅对于讲话,而且对于这一运动的理论的所有其他组成部分来说当然也是正确的。因此,在1867年—1894年的《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晚期著作中的科学社会主义,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的表达,这一表达在许多方面比之1847—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的直接的革命共产主义,或者《哲学的贫困》、《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那些内容,是不相同的,是更为发展了的。然而,甚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后期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特征实质上仍然没有变化。因为在后期的论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社会革命理论的唯一整体。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在较后阶段,这个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它们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要素,科学理论和社会实践,进一步分离出来了。我们可以使用马克思自己的一种表达说,它的自然联系的脐带已经断了。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这决不会产生代替整体的大量的各个独立要素。这仅仅是体系的组成部分的另一种结合开始以更大的科学精确性发展起来,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在它的创立者的著作中,马克思主义体系自身从未消溶在各个知识分支的总和之中,尽管它的成果的实际的和外在的应用暗示着这样的结论。例如,许多资产阶级的马克思解释者和一些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能够在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中的历史材料和经济理论材料之间作出区分;但是,他们以此证明的全部东西是,他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7页。这段话对于具体地解释《开幕词》是极为重要的,但当考茨基在他的《通信集》(第4—5页)的1922年版序言中引证这封信的大部分时却别有用心地省略了这一段。这样降低了1864年的《开幕词》的调子之后,他就能够(见同书第11页以下)使它显示出与1847—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的激烈风格的对立,与“第三国际的非法代理人”的对立。

们根本不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正方法。因为这一区别对于它来说是不存在的，这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一个本质的标志；它的确是一个对于历史的理论把握。而且，理论和实践不可割断的相互联系，作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类型的最独特的标志，在他的体系的较后期形式中，无论如何也没有被废除。认为一个纯粹思想的理论似乎已经取代了革命意志的实践，这不过是肤浅的一瞥。这种革命意志在马克思著作的每一个句子之中都是潜在的——然而存在的，潜在于每一决定性的章节中，尤其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一再地喷发出来。人们只须想一下著名的第二十四章第七节关于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论述，就足以证明这一点^⑤。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说，马克思的支持者和追随者们，尽管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全都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事实上他们把社会革命的理论割裂成了碎片。在理论上以辩证的方式，在实践上以革命的方式理解的唯物史观，与那些孤立的、自发的各个知识分支，与作为脱离革命实践的科学上的目标的纯理论考察，都是不相容的。然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越来越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些纯粹的科学观察，与政治的或其他阶级斗争实践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这方面的充分的证据是一位作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叙述；这位作者在最适当的意义上是第二国际一位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1909年10月，鲁道

^⑤ 在《资本论》第八章“工作日”的末尾，有这一方面别的极好例子：“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36页）。另见马克思重讲这个论题的那些著名章节（《资本论》第三卷第二编）。在《资本论》中，有如此多的类似的地方谈到这个问题，以致没有必要提出像他就巴黎公社起义对第一国际总委员的讲演这些后期的直接关于革命的著作（《法兰西内战》1871年）。

夫·希法亭出版了他的《金融资本》。这部著作企图“把这些现象嵌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来“科学地理解”资本主义的最近发展的经济方面。他在导言中写道：“在这里我们只须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说来，政治研究本身的目的仅仅在于发现因果联系。对支配商品生产的社会的规律的认识，立刻显示了这个社会的各阶级意志的作用。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科学的政治学——描述因果联系的政治学——的任务，是发现这些阶级意志的决定作用。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是没有价值判断的。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一回事，是绝对错误的，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们都共同这样做。那种在逻辑上只被当作一种科学体系并因而脱离其历史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的一般概括，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把它应用于商品生产的时代的社会运动规律的理论。社会主义的来临是在商品生产社会中发展着的倾向的结果。但是，洞悉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包括洞悉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决不是价值判断的结果，并且也没有实际行动的含义。承认必然性是一回事，而为这必然性做出贡献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完全可能，一个人可以相信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然而他却决心反对它。由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对社会运动规律的洞悉，使任何掌握这一规律的人都占有优势。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对者无疑是那些从它的经验中最得益的人。”在希法亭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在逻辑上是“科学的、客观的和自由的科学，并没有价值判断”。他毫不感到困难地解释了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人们常常认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并因此而不辞“劳苦”地去研究这样一个复杂的体系与根据“统治阶级不可避免的反抗”而为社会主义斗争是一致的。“既然它在其他方面毫不畏缩地坚持每门科学提出的要求——其结论的客观的和普遍的有效性，那么，仅仅在这个意义

上，它才是无产阶级的科学，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对立面。”^{⑤④}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本质上是辩证的唯物史观，最后在他们的追随者那里变成了某种非辩证的东西。对一种倾向来说，它已经变成了一种专门化了的理论考察的启发式原则。对另一种倾向来说，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流动的方法论冻结成了一些关于不同的社会领域里的历史现象的因果联系的理论公式——换言之，它变成了某种最好称之为一般系统社会学的东西。前一流派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原则仅仅当作一个康德意义上的“反思判断的主观基础”^{⑤⑤}，而后者则教条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学说首先是

⑤④ 在1914年或1918年以前，一个无产阶级的读者或许会认为，希法亭和那些说了这些话并宣称他们的著作有着客观的和普遍的有效性（即独立于任何阶级基础）的其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出于实践上和策略上的考虑而这样做的。但是他们后来的实践已经毫无疑问地证实了这种解释是错误的。像保罗·伦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例子表明，这种“科学的知识”可以很完美地被用来反对社会主义。与此相联系，人们还可以提及这里作了批判的希法亭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所作的区别，这一区别是西姆克霍维奇——一个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批评家——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伦敦，1913年）中做出的最荒谬的结论。仅仅由于这个理由，这本书也是有独创性和令人感兴趣的；M·鲁比诺夫在《从现代统计学看马克思的预言》一文中对此作了广泛的评论（见格律恩堡《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库》第6卷，第129—156页）。

⑤⑤ 参见《判断力批判》（巴纳德1914年英译本，第75节，第309—310页），在同一段中，康德把这个准则描述为“研究自然的指导线索”。类似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把那段展开了他的唯物史观的话称作进一步研究的“指导线索”，是从他的哲学和科学的考察中派生出来的。人们可以断言，康德的批判哲学是一个指南，同样，马克思也提到他的唯物主义原则仅仅是研究社会的指南，人们也可以当作进一步的例子来引证马克思为了免受批评家们对自己的攻击而做的全部说明；这些批评家们断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包含有先验的因素或者抽象的、超历史的和受历史哲学影响的理论（参看《资本论》德文版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3—24页，以及1877年11月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著名信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26—131页）。然而，为什么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原则当作纯粹的启发性原则是不适当的，这一点在我的早先的著作《唯物史观的基础》（柏林，1922年）中已经说清楚了（特别地参见第16页及其后诸页和两个附录）。

一个经济学体系,甚至是一个地理学和生物学的体系^⑤。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中,它遭受了由它的追随者们带来的所有这些歪曲以及一系列其他不太重要的扭曲。这些歪曲或扭曲可以用一个包容一切的公式概括起来:一个统一的关于社会革命的一般理论被变成了对于资产阶级的经济秩序、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教育体系、资产阶级的宗教、艺术、科学和文化的批判。这些批判按其本性来说,不再必然发展为革命的实践^⑥;它们同样地能够发展为各种各样的改良企图,这些企图基本上仍保持在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界限之内,并且在实际的实践中,通常也确实如此。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的扭曲——歪曲成为纯粹的理论批判,不再会导致实际的革命行动,或者仅仅只是偶然地导致——如果把《共产党宣言》甚或由马克思起草的1864年的《第一国际章程》与中欧和西欧的各社会主义党,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比较一下,就非常清楚了。众所周知,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他们的《哥达纲领》(1875年)和《爱尔福特纲领》(1891年)中在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所提出的全面的改良主义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了何等严厉的指责。这些文件没有包含哪怕一点真正唯物主义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原则^⑦。的确,到上个世

⑤ 特别地参看我的《基础》一书的序言和对路德维希·沃尔特曼的批判(第18页及其后诸页)。有一些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实践上属于革命的共产主义,但他们几乎把马克思的历史观同“一般社会学”等同起来。参见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1969年平装本)第13—14页, K·威特福格尔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1922年)第50页。

⑥ 参见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1—15页),在那里,马克思说,对现代国家的批判,对与之相关联的现实的批判,以及对所有先前的德国政治和法律的充分的批判,应当进入一种“原则高度的”实践,即进入革命,但不是“部分的、纯粹政治的革命”,而是一个由无产阶级执行的不仅解放政治的人,而且也解放作为整个社会的人的革命。

⑦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哥达纲领》的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1—33页)和恩格斯的《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5—280页)。

纪末,这种情况导致了修正主义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冲击。最终,在20世纪初,将至的风暴的第一个迹象预报了一个冲突和革命斗争的新时期的来临,并由此而导致了我们在今天仍然卷入其中的决定性的马克思主义危机。

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来说,一旦理解了原初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衰变为没有任何革命结果的社会理论批判是无产阶级斗争的社会实践中的相应变化的必然表现,那么,这两个过程可以被看作是**整个意识形态和物质发展的必然阶段**。修正主义表现为企图以一贯的理论形式表达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的影响下工会的经济斗争和工人阶级政党的政治斗争获得的改良主义特征。这个时期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现在是纯粹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理论家们由于传统的重压而企图以纯粹的理论形态来保持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形态的社会革命理论。这种理论是全然抽象的和没有实际结果的——它仅仅企图拒绝新的改良主义理论,在这种新理论中,历史运动的真正特征被表述为非马克思主义的。这恰恰就是为什么在一个新的革命时期中,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不可避免地最无能力处理诸如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的缘故。修正主义者至少拥有“劳动人民”对国家的关系的理论,尽管这理论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很久以来已用资产阶级国家范围内的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改良代替了要用无产阶级专政夺取、粉碎和取代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革命。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满足于拒绝这种违犯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关于过渡时期问题的解决办法。然而,尽管他们正统地迷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抽象字句,他们也不能保持它的原初的革命性。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自身已经不可避免地不再是一个社会革命的理论。经过了一个漫长时期,当马克思主义缓慢地在整个欧洲传播开时,它在事实上已经没有实际的革命

任务要去完成。因此，革命的问题甚至在理论上对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论是正统的还是修正主义的），已经不再作为现实世界的问题而存在了。对于改良主义者来说，这些问题已完全消逝了。甚至对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些问题也全然失去了《宣言》的作者面对它们时的那种直接性，而退却到了遥远的和最终相当模糊的未来^③。在这个时期，人们变得习惯于当即追逐修正主义可以作为其理论表现的策略性的东西。在党的代表大会正式谴责以后，这种修正主义最后还是被工会同样正式地接受。在本世纪之初，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把社会革命的问题作为一个在所有它的生死攸关的方面是现实主义的和世俗的问题提到了议程上。随后，纯粹理论上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在第二国际中正式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型式——完全地分化瓦解了。这当然是其内部长期衰败的必然结果^④。正是在这个时代，我们能够许多国家看到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开始，这首先是由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代表的，并经常由其代表描述为马克思主义的“重建”。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改造和发展，已经在回到原初的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纯学说的特殊意识形态的借口下实现了。但是，

③ 参考照茨基在《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第172页）中抨击伯恩斯坦的段落，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263页）中对此作了批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

④ 参见收入考茨基的最后著作《无产阶级革命和它的纲领》（1922年，英译者注，1926年以《劳动革命》的标题出了英文版）中的关于马克思专政理论的“改变”：“马克思在他著名的批判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文章中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转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最近这几年我们有了一些经验，使我们现在能够改变这段关于我们需要的那种政府的论述，我们说：在纯粹的资产阶级国家和纯粹的无产阶级国家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过渡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通常将采取联合政府的形式。”（《劳动革命》第33—34页。）

理解这一借口和被它隐藏起来的那个过程的真正特征的原因并不困难。德国的罗莎·卢森堡和俄国的列宁这些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里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事情，是要把它从第二个时期的社会民主党的禁闭性的传统中解放出来。他们因此适应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新的革命阶段的实践需要。因为这些传统“像梦魇一样”压在那些在客观上其革命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再与这些进化学说相适应的劳动群众的头上^④。第三国际中对原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明显复兴，只不过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在新的革命时期，不仅工人运动自身，而且还有表达它的共产主义者的理论概念，都必须采取一个明确的革命形式。这就是为什么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实际上已被人忘记了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大部分又获得了新生的缘故。它也解释了，为什么列宁这个俄国革命的领袖能在十月之前几个月里写了一本书，说明他的目标“首先是恢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事变本身把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作为一个实际的问题提到了议程之上。当列宁从理论上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把这一问题提到议程上时，这便早早地预示着，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之中，理论和实践的内在联系已经被有意识地重建^⑤。

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问题的新的考察，看起来也将是这种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否定的判断从一开始就是清楚的。第二国际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哲学问题的极度轻视，仅仅是丧失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实践的、革命的特征的部分表现，这种丧失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生动原则在追随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中的同

④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以下。

⑤ 列宁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辩证的相互关系，最清楚地表明在他于1917年11月30日在彼得格勒写的《国家与革命》“初版跋”的几句话中：“本书的第二分册（关于《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也许要拖延很久才能写出，因为做出‘革命的经验’总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列宁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276页。）

时衰败上找到了它的一般表现。我们已经提到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自己总是否认科学社会主义还是哲学。但是，考虑到其根源，很容易无可辩驳地表明，对于革命的辩证法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哲学的对立面所意谓的东西，根本不同于后来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所意谓的东西。希法亭和第二国际的其他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不过是要求超出阶级差别，进行公平、纯粹的、理论的研究^⑬。正确地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与那些资产阶级社会的纯粹科学（经济学、历史学或社会学）之间，比之它与第三等级的革命运动曾经在其中找到了他们的最高的理论表现的哲学之间，有着更为巨大的差别^⑭。因此，最近的马克思主义者已被几个众所周知的马克思的词句和恩格斯后来的几个词句所迷惑，把马克思主义废除哲学解释为用抽象的和非辩证的实证科学的体系去取代这种哲学。人们只能对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洞察力之低感到惊奇。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全部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科学之间的真正矛盾，完全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革命过程的理论表现，这个过程将随着这些资产阶级哲学和科学的全部废除，以及在它们之中找到了其意识形态表现的物质关系的废除而终结^⑮。

⑬ 这里参看一下马克思在他的《哲学的贫困》中的评论，他认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作为无产阶级的理论家与作为资产阶级的科学代表的经济学家的不同流派是相关联的，正如科学社会主义的特征与教条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对立一样：“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了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57—158页。）

⑭ 参见我的《基础》，第77页以下诸页。

⑮ 下面将证明，这才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实证科学”这一表达方式所意谓的东西。同时，那些持有上述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可以通过读一下一位资产阶级学者关于马克思的论著而看到，他们已经犯了灾难性的错误。瑞典著作家斯文·赫兰德的《马克思和黑格尔》（耶拿，1922年）是一部极其肤浅和充满了根本错误的著作；但是，比之其他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批评家，或者标准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它更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它称之为社会一

为了恢复被其追随者败坏和庸俗化了的马克思理论的正确和充分的意义,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再考察,甚至在理论水平上也是必需的。然而,正如马克思主义和国家的问题一样,这个理论任务也真正产生于革命实践的需要和压力。在夺取了政权以后的革命转变时期,无产阶级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完成一定的革命任务,不亚于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完成的任务——这些任务永远是相互作用着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必须再次成为《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所描述的东西——不是作为一个简单的回复,而是作为一个辩证的发展:一种关于包括整个社会一切领域的社会革命的理论。因此,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式必须解决的不仅是“国家对于社会革命和社会革命对于国家的关系问题”(列宁语),而且还有“意识形态对于社会革命和社会革命对于意识形态的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前的时期里回避这些问题,会导致机会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内部造成危机,正像第二国际回避国家与革命的问题导致了机会主义并的确在马克思主义的阵营内引起了危机一样。在这些转变时期的意识形态问题上没有明确的立场,在无产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后的时期里,可能会有灾难性的政治后果。因为理论上的庸俗和混乱严重地妨碍迅速而有力地解决当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对意识形态的关系的主要问题,同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的政治问题一样,被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所忽视。因此,在这个新的革命斗争时期,它必须被重新提出,并

民主的世界观)。这本书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第25页以下)表明,人们只有在黑格尔“批判社会批评家并劝告他们去研究科学和学会理解国家的必然性和正当性(因为这可以使他们避免苛刻的吹毛求疵的毛病)”这样的意义上,才能谈及“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段是赫兰德书中典型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他没有指出黑格尔这些论述的出处;事实上它们出自《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但是黑格尔在这里所讲的不是科学,而是哲学。对马克思来说,科学是重要的,不是出于黑格尔的理由,对黑格尔来说哲学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使人与现实和谐,而是因为它颠覆这种现实。(参见前引《哲学的贫困》的论述,注⑬。)

且必须恢复正确的——辩证的和革命的——原初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个任务只有通过首先考察引导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意识形态问题的这样一个问题来解决：哲学是如何关联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如何关联于哲学的？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并且可以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中推演出来。它将引导我们到一个更大的问题上：一般地说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如何关联于意识形态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对哲学的关系是什么？“毫无关系”，庸俗马克思主义回答说。在这个意义上，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和科学的观点驳斥和取代了旧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所有的哲学观念和思辨，因此被证明是不真实的——空洞的、仍然作为一种迷信纠缠着少数人头脑的幻想；保持这样的幻想对统治阶级有着具体的实在利益。一旦资本主义被推翻，这些幻想的残余也将即刻随着消失。

一个人只须思考一下这种哲学方法的全部肤浅性，像我们已经试图做的那样，立刻就会明白，这样一种对哲学问题的解决办法，与马克思的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精神毫无共同之处。它属于那样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资产阶级蠢才中的天才”边沁在他的《百科全书》中用“参看迷信的见解”这样的按语去解释“宗教”一词^④。这就是17和18世纪所创造的气氛的一部分，这种气氛鼓舞欧根·杜林写道，在根据他的计划来构造的未来社会中，将不存在宗教崇拜；因为正确理解的社会共同体将禁止宗教魔术的一切道具，同时也将除去这些迷信的一切基本组成部分^⑤。现代的或辩证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新的唯一

^④ 见马克思关于边沁的评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69页—670页。

^⑤ 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这个论题的辛辣的妙语。

科学的世界观——看待这些问题时，完全不同于那种对于诸如宗教和哲学这类意识形态现象的肤浅的、唯理主义的否定方式。为了直接表明这种比较，可以这样说，对现代辩证唯物主义来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要把哲学和其它意识形态体系当作现实来把握，并且在实践上这样对待它们。在他们的早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由反对哲学的现实性开始了他们的全部革命活动；我们将表明，尽管后来他们的确从根本上转变了他们关于在整个意识形态内哲学的意识形态是如何相关于其它形式的观点，但是，他们总是把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当作具体的现实而不是空洞的幻想来对待的。

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了他们的革命斗争——最初在理论的和哲学的水平上，为的是那个处在不是同整个现存社会的“后果发生片面矛盾、而是同它的前提发生矛盾”的阶级的解放^{④8}。他们确信，他们正在攻击现存社会秩序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在1842年写的《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一文中，马克思已经表述过“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存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④9}他后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重复了这一点：“现存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是观念的补充”^{⑤0}。15年之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马克思说，在那本著作里，他最终完成了向他后来的唯物主义立场的转变。恰恰当辩证法家马克思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之时，他明确了这一点：当时德国这个丢弃了哲学的实践派，犯了一个像不谴责哲学的理论派一样的大错误。后者相信，它能够从纯粹哲学的观点，即依靠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从哲学派生出来的命题（更像拉萨尔后来求助于

④8 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14页。

④9 见《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20页。

⑤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8页。

费希特所做的那样),来同德国社会的现实进行斗争。它忘记了这个哲学观点本身是这个占统治地位的德国社会的组成部分。但是,实践派也基本上受到了同样的限制,因为它相信,“只要扭过头去,背朝着它,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它也不认为“哲学是德国现实的组成部分”。理论派错误地相信,“不消灭哲学本身,就可以使哲学变成现实”。实践派犯了一个类似的错误,它企图不在理论中实现哲学,换言之,“不把哲学作为现实来把握,就企图在实践中消灭它。”^⑤

在什么意义上马克思(还有恩格斯,他在同一时期经历了同样的发展——就像他和马克思后来经常说明的那样)^⑥已经真正地超越了他在学生年代的纯粹哲学的观点,这是很清楚的;但是,人们也能够看到这个过程本身仍然如何具有哲学的特征。我们之所以可以谈论超越哲学观点,理由有三条。首先,马克思在这里的理论观点,不是部分地反对全部现存德国哲学的结论,而是完全反对它的前提(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来说,这种哲学总是最充分地代表黑格尔所代表的)。其次,马克思反对的恰恰不是仅仅作为现存世界的头脑或者观念上的补充的哲学,而是整个现存世界。再次,最重要的,这个反对不仅是在理论上的,而且也是实践上和行动上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最后一条就是这样宣告的。然而,这个对纯粹哲学观点的一般超越,自然混合着哲学的特征。一旦人们意识到这种新的无产阶级科学在其理论特征上与先前的哲学的区别如何之小(即使马克思用它作为一个在其方向和目标上有根本区别的体系来取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哲学),这一点就很清楚了。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7—8页。

^⑥ 参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评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83—84页。

德国唯心主义，甚至在理论水平上，也总想成为一种不只是理论或哲学的东西。从它同资产阶级革命的关系（前面讨论过）来看，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我们将在以后的著作中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这种倾向在黑格尔的先驱者们——康德，谢林，尤其是费希特身上是典型的。虽然黑格尔自己显然已颠倒了它，但他在事实上也分派给哲学一个超出理论领域之外、并在一定意义上是实践的任务。这个任务当然并不要去改变世界，像马克思所主张的那样，而毋宁说是要借助概念和理解力，使作为自我意识的精神之理性与作为实际现实之理性得到和解^⑤。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当它肯定了这个普遍的作用（这个无论如何被通俗地认为是任何哲学的实质的东西）时，它没有不再是哲学。与此相类似，仅仅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具有不只是理论的，而且也是实践的和革命的目的，就说它不再是哲学，这是不正确的。相反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按其基本性质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哲学，就像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11条中和在其他出版过和没出版过的那个时期的著作中系统地阐述的那样^⑥。它是一种革命的哲学，

⑤ 《法哲学原理》序言第13页。

⑥ 除了经常提到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外，这还包括对鲍威尔的批判的《论犹太人问题》（1843—1844年）、《神圣家族》和最为重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进行了他们对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大清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最后这部著作对于现在进行的讨论的重要性，已由《神圣家族》的序言中的评论所指出。在那里，作者指出，他们以后的著作将提供他们自己关于“最近的哲学学说和社会学说”的肯定的观点以及他们同这些学说的肯定的联系。这篇文章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问题的全面的深刻研究，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它还没有完全发表。然而，甚至这些已出版的部分（尤其是《圣麦克斯》和《莱比锡宗教会议》），以及古斯塔夫·迈耶在他的恩格斯传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文版第239—260页）中对那份手稿的未出版部分的极其令人感兴趣的评论，使人们能够看到，正是在这里，人们能够发现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全面说明。《共产党宣言》或《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不是全面说明，这两本书主要从一个方面阐明了唯物主义的原则，要么强调它的实践的 and 革命的方面，要么强调它的理论的、经济的和历史的方面，但不能说是综合性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些关于唯物史观的著名句子，只是倾向于给读者提供一个

它的任务是以一个特殊的领域——哲学——里的战斗来参加在社会的一切领域里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最后，它目的在于把消灭哲学作为消灭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一个部分，哲学是这个现实的概念上的构成部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因此，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前进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十分清楚，哲学的消灭对他们来说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抛弃哲学。甚至在考虑到他们后来的立场时，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成为唯物主义者之前是辩证法家这一点作为稳固的起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人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从一开始就是辩证的唯物主义，那么，他们的唯物主义的意义就以一种灾难性的和无可挽回的方式被歪曲了。与费尔巴哈的抽象—科学的唯物主义和所有其他抽象的唯物主义——无论是早期的还是晚期的，也不管是资产阶级的还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相对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首先是历史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换言之，它是这样一种唯物主义，它的理论认识了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而它的实践则颠覆了这个整体。因此，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在他们的唯物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哲学成为社会—历史过程的一个较之开始时不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可能的，而且在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但是，真正的

“社会研究的指导线索”，这个线索马克思已经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使用了。因此，马克思并不打算在这段话里充分地表达他的整个辩证唯物主义的新原理。尽管从这些评论的内容和从它们的语气来看，这是完全清楚的，但它们还是经常被人们忽略。例如，马克思说明，在社会革命时期，人们逐渐意识到了已经爆发了的斗争并参与其中；人类仅仅在一定的条件下接受一定的任务；并且革命的时期本身有着一种特殊的意识。这就表明，带着或正确或错误的意识实现了真正的社会发展的历史主体的问题，在这里绝对没有讨论过。假如是这样的话，人们若要理解整个辩证唯物主义原则，那就必须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尤其是已经提到过的第一个时期的那些著作（还有《资本论》和后期较短的历史著作中）发现的东西来补充对唯物主义观的这种描述。在我于去年（1922年）出版的小册子《唯物史观的基础》中，做了这种初步的尝试。

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肯定地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不可能不认为哲学意识形态,或者一般的意识形态是一般的社会—历史现实的一个实在的组成部分——即,一个必须在唯物主义理论中把握住并由唯物主义实践消灭的现实部分。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马克思不仅把他的新唯物主义与哲学唯心主义进行了对比,而且同样有说服力地与每种现存的唯物主义进行了对比。与此类似,在所有他们的后期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了在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与通常的、抽象的和非辩证的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别。他们特别意识到,对于理论上解释所谓的精神或者意识形态现实及其实践作法来说,这种区别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讨论一般精神表象和特别是具体的和批判的宗教史所必需的方法时,马克思指出:“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想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王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⑤ 那种满足于以十足的费尔巴哈式的方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10页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四条。二者在严格的意义上说是同一回事。容易理解,马克思在这里称为唯物主义的并且因而是科学的方法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一种与抽象的唯物主义的不适当性相反的方法。参见恩格斯1893年7月14日给梅林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500页以下),在那里,恩格斯讨论了梅林在他的《莱辛传奇》中对唯物主义方法的使用中所忽略的东西。他说:“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后面将会表明,恩格斯对他和马克思的著作所做的这种自我批判,仅仅稍微适用于他和马克思事实上使用的方法,他所批评的那种特征,在马克思身上比在恩格斯身上更少得多;但是,在恩格斯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也并不像人们从他对自己有份量的批评中所能想象的那样多。恩格斯害怕他对这个形式方面未给予足够的注意,这一点导致他在后期犯了有时以一种不正确的和非辩证的方式来对待它的错误。这适用于在《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尤其是在恩格斯晚年的书信(这些书信由伯恩斯坦收集在《社会主义

法把全部意识形态表象归结为它们的物质的和世俗的核心的理论方法,是抽象的和非辩证法的。那种只限于反对宗教现象的世俗核心,并不参与消灭和取代这些意识形态本身的革命实践,同样是抽象的非辩证法的。当庸俗马克思主义采取这种抽象的和消极的态度对待意识形态的现实时,它像那些过去和现在使用马克思的关于经济决定法律关系、国家形式和政治行动的命题去证明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应当把它自身仅仅限制在直接的经济范围之内的无产阶级理论家们一样,犯了完全同样的错误^⑤。众所周知,马克思在他的反对蒲鲁东和其他一些人的辩论中,有力地抨击了这种倾向;在他的生活的不同阶段,无论在什么地方遇到这种——仍然存在于现代工团主义之中——观点,马克思都强调指出,这种对国家和政治行动的“先验的蔑视”,完全是非唯物主义的。因此,它在理论上是不适当的,在实践上是危险的^⑥。

这种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的辩证观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的文献> I 之中)中所有关系到“历史的唯物主义观能够有效地应用的领域”的章节。在这些章节中,恩格斯趋于犯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全书》第156节中描述为“真正缺乏思想的程序”那种错误(参见《小逻辑》中文版第320—322页)。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他从概念的高度退却到了它的开端,即退却到了作用和相互作用的范畴,等等。

⑤ 这种过时了的观点的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可以在蒲鲁东1846年5月的著名信件中找到。在那里,他对马克思解释了他在当时如何看出了这个问题:“依靠一种经济的组合把原先靠另一种经济组合取之于社会的财富归还给社会;换言之,把所有制的理论变成政治经济学,以便转而反对所有制,并因此而实现你们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称之为福利共产主义的东西。”然而,马克思虽然肯定还是没有达到他的成熟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但已经开始相当清楚地看到在理论和实践的政治水平上提出和解决经济问题所必须凭借的辩证关系。参见马克思1843年9月给卢格的信,在那里他谈到了那些“道地的社会主义者”,这些人认为政治问题就像在等级制度和代议制制度之间的差别一样“不值得注意”。马克思以辩证的考虑回答了“表现在政治形式中的人的统治和私有财产的统治之间的差别这个问题”(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7页)。

⑥ 特别参见《哲学的贫困》最后几页。

一个不可更改的组成部分，以致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们，至少在理论上也不能够否认革命转变问题的存在，尽管他们在实践中忽视这个问题。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甚至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原则上宣称，在理论和实践上与政治的关联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不是必要的。只有工团主义者才会这么认为。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求助于马克思，却没有一个自认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许多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了一种与工团主义相一致的关于意识形态现实的理论和实践的见解。这些唯物主义者们在马克思一起谴责工团主义者对政治行动的拒绝，并宣布社会运动必须包括政治运动。他们经常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说法，认为甚至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尽管有资产阶级国家经历的一切变化，政治也将长久地是一种现实。然而，正是这些人，当他们得知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斗争不能仅仅由无产阶级的社会运动，或者由它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联合运动所代替或所取消时，便直接地陷入了无政府工团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先验的蔑视”。甚至在今天，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当他们应当用由马克思和恩格斯铸成的唯物主义的和科学的方法去分析这一社会现实的领域时，却仍然在一种纯粹否定的、抽象的和非辩证的意义上想象所谓精神现象的效力。精神生活应当与社会的政治的生活相结合来看待；同时，社会的存在和社会的发展（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作为经济、政治或法律）应当与作为一般历史过程的一个真实的然而也是观念的（或“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并有着许多不同表现形式的社会意识相结合来研究。否则，全部意识现象被全然以抽象的和基本上是形而上学的二元论方式来对待，并被认为是一个真正具体和实在的发展过程的反映，完全依赖于这个过程（即使是相对独立的，最终仍然是依赖的）^⑤。

^⑤ 参看本书注^④关于恩格斯后来终于对此作了一定让步的说明。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恢复马克思认为是唯一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关于意识形态现实的观点和作法的理论企图,将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比恢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企图甚至更大的理论障碍。追随者们在国家和政治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歪曲,仅仅在于第二国际最杰出的理论家从未充分具体地对待最为致命的革命转变的政治问题。然而,他们至少抽象地同意,并在他们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的长期斗争中有力地强调,对于唯物主义来说,不仅作为所有其他社会—历史现象的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而且法律和国家这些政治和法的上层建筑,都是现实。因此,不能以一种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方式忽视和打消它们;它们必须由政治革命在现实中所消灭。尽管这样,许多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到今天甚至还没有在理论上承认精神生活和社会意识的形式是类似的现实。他们引证某些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的论述,就简单地把社会的精神的(意识形态的)结构当成一个仅仅存在于空想家头脑里的伪现实——当成缺乏真实对象的错误、想象和幻象,而消除了^⑤。至少对于全部所谓“更高的”意识形态来说,这可能是真实的。对于这种想法来说,政治的和法律的表象可能有一个观念的和不真实的特征,但它们至少是与某些真实的东西——构成这里所说的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法律和国家的设施——相关联的。另一方面,“更高的意识形态表象”(人们的宗教、审美的和哲学的观念)并不对应于真实的对象。这一点可以用稍微有点漫画的手法指出以下情况而得到简单的说明:对于庸俗马克思主义来说,现实有三个等级:(1)经济,在最终意义上讲是唯一客观的和非观念性的现实;(2)

^⑤ 在晚年,恩格斯的确有一次令人遗憾地说到了像哲学的宗教“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它们包含着“原始谬论”的史前内容(1890年10月27日给施米特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4页)。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也特别以类似的、带着相当明显否定的语气谈到了哲学。

法和国家,已经由于带有观念形态的特征而稍微较不现实一些;(3)纯粹意识形态,全然是非客观和不现实的(“纯粹的无用之物”)。

要恢复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精神现实的概念,首先必须弄清楚几个基本术语的用法。在这里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一般地如何对待意识同它的对象的关系。从术语上看,应该说把社会意识和精神生活仅仅描述为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做过的。意识形态仅仅是一种虚伪的意识,尤其是一种错误地把自主的特征赋予部分社会生活现象的意识。设想法律和国家是独立地存在于社会之上的力量的法的和政治的表象,便是恰当的例子^⑩。在马克思最精确地使用他的术语的那段话中^⑪,他明确地说,在黑格尔称为市民社会的现实关系的复合体内,社会的生产关系——社会的经济结构——形成了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于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互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特别是,这些社会意识的形式——其真实性不亚于法律与国家——包括商品拜物教、价值观念和其他从它们派生出来的经济学表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分析了这些观念。他们的处理方式的引人注目的特征,是他们从来没有把资产阶级社会的这种基本的经济学观念看作意识形态。在他们的术语里,只有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美学的或哲学的意识形式才是意识形态的。甚至这些形式也不一定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意识形态,而只是在已经说

^⑩ 特别参见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对于国家的评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页。

^⑪ 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5页)。人们仍能够在—位资产阶级学者关于马克思的著作——哈梅彻尔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体系》(1909年,第190—226页)——中发现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哲学的和方法论的材料细致集成。哈梅彻尔用这样一个事实把他自己与其他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批评家们区别开了:在企图解决这个问题时,他至少利用了全部原文资料,而其他入,如庸尼斯和巴尔特则把他们的解释建立在马克思的孤立的片断和章节上。

明过的特殊条件下才成为意识形态。这种分派给经济学意识形态的特殊地位，标志着那个把后期的充分成熟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其早期不发展的类型区别开来的新的哲学概念。对哲学的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批判从此以后在对社会的批判中被降级到第二、第三、第四，甚至倒数第二的地位。在《德法年鉴》中被马克思看作为他的基本任务^②的“批判的哲学”，成了一个更彻底的社会批判，这个批判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达到了社会的根源^③。马克思曾经说过，“批评家可以把任何一种形式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作为出发点，并且从现存的现实本身的形式中引出作为它的应有的和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④。但是后来他意识到，法律关系、制度结构或者社会意识的诸形式，都不能从它们自身或者根据黑格尔和的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因为它们是根植于构成作为整个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和骨骼”的生活的物质条件之中的^⑤。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彻底批判，不再像马克思直到1843年所认为的那样，可以把“任何”一种理论的或者实践的意识作为出发点^⑥。它必

② 马克思1843年9月致卢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8页。

③ 马克思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宗教）中对“彻底的”（radical）一词就是这样定义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7页。

⑤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⑥ 这不是对马克思甚至在1843年的真正见解的一个完全准确的说明。原文中的这些话来自1843年9月马克思致卢格的信，但在几行之后他说，社会主义原则的代表们非常关注的问题关系到真正人类本性的现实。然而，他们也需要这个本性的其他方面——人在宗教、科学等等形式之中的理论存在。马克思的发展可以被总结如下：首先，他在哲学中批判了宗教；然后，他在政治上批判了宗教和哲学；最后，他在经济学上批判了宗教、哲学、政治和所有其他意识形态。这条道路上的里程碑是：（1）在他的哲学论文（对宗教的哲学批判）的序言中的论述；（2）在1843年3月13日致卢格的信中对费尔巴哈的评论：“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在我们上

须从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中已经找到了其科学表现的意识的特定形式开始。因此，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首位的。然而，即使这一更为深刻、更为彻底的马克思的革命的社会批判，也不再是对资产阶级社会整体的批判和对它的全部意识形态的批判。看起来好像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对哲学的批判仅仅是以一种偶然的、临时的方式进行的。事实上，他们远非忽视了这一问题，他们实际上在更深刻、更彻底的方向上发展了他们的哲学批判。要证明这一点，只需要与某些关于这个问题现在很流行的错误观念相对立，恢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充分的革命意义就够了。这也可以用于澄清在整个马克思的社会批判体系中它的地位和它同像哲学这样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关系。

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最重要的理论的和实践的组成部分——不仅包括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物质生产关系的批判，而且还包括对它的社会意识的特殊形式的批判，这一点一般已经为人们所接受。甚至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纯粹的和不能不倚的“科学的科学”也承认了这一点。希法亭承认，关于社会的经济规律的科学知识，只要表明了“在这个社会里规定着阶级意志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一种“科学的政治学”。然而，尽管在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全然抽象的和非辩证的观念中有着这种经济学对于政治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仍然只具有“科学”的纯粹理论上的作用。它的功能只在于批判古典的或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错

面提及的1843年9月致卢格的信中，也有一些著名的论述。在那里他说，现在哲学已经变成了“世俗的东西”，因此，“哲学的意识自身不仅外表上而且在骨子里已经被拖进了斗争的苦恼之中。”(3)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论述：“工业以至于整个经济界和政治界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已经由“现代社会—政治现实本身所提出，但是它处在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现状、甚至它的‘最后的、最丰富的和最前后一致的’黑格尔式的现状之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页。)

误。对比之下，无产阶级政党则为了它的实践目标——最终地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经济结构和它的生产关系——而应用这一批判的和科学的考察的结果。（偶尔，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也能被像西姆克霍维奇或保罗·伦斯这样的人用来反对无产阶级政党自身。）

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庸俗社会主义的主要缺陷在于它相当“不科学地”坚持着一种朴素的现实主义——在这种现实主义中，所谓的常识（即“最坏的形而上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标准的实证主义科学二者，都在意识和它的对象之间划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两者都没有意识到，即使是对于批判哲学的先验观点来说，这种区别也已经不再是完全有效的了^④，并且在辩证法的哲学中已经被完全取消了^⑤。充其量，他们想象这样一些东西可能对于

④ 拉斯克关于这个问题所作的评论是特别有教益的。（见他的作为“献给库诺·费舍的礼物”的《法哲学》第2卷第2节第28页及其后诸页。）

⑤ 这个问题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是冯·克劳塞维茨将军的《战争论》的第一卷第二篇第三章“军事科学或军事艺术”。这位作者是一位深受唯心主义哲学的精神和方法影响的军事哲学家。克劳塞维茨探询人们到底应该采用军事艺术这个术语还是应该采用军事科学这个术语，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使用军事艺术这个术语比使用军事科学这个术语更恰当些。”但是，这并没有使他感到满意。他继续说，经过更为细密的考察，“战争既不是真正的艺术，也不是真正的科学”，并且在它的现代形式上它也不是一种“手工艺”（像它曾经在14至16世纪雇佣兵时期所是的那样）。事实上，战争更多地是“人类交往的部分”。“因此我们说，战争不属于艺术或科学的领域，而属于社会生活的领域。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利害关系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用流血的方式来进行的，它与其他冲突的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战争与其说像某种艺术，还不如说像贸易，贸易也是人类利害关系的冲突。然而更接近战争的是政治，政治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大规模的贸易。不仅如此，政治还是孕育战争的母体，战争的轮廓在政治中就已隐隐形成，就好像生物的属性在胚胎中就已形成一样。”一些受固定的形而上学范畴影响的现代实证主义思想家们，可能要以克劳塞维茨混淆了军事科学的对象和这门科学本身而批评这个理论。事实上，克劳塞维茨完全知道“科学”一词在通常的和非辩证法的意义上意味着什么。他明确地说，不可能有一种把正常地被称为军事艺术或者军事科学的东西作为它的对象的“真正

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才是真实的。他们认为，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黑格尔的手中受到损害”的辩证法的神秘化。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这一神秘化必须完全地从辩证法的合理形式——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中清除掉。我们将证明，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决没有任何这样的关于意识与现实的二元论的形而上学观——无论在他们的第一(哲学的)时期，还是在第二(实证的科学的)时期。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们会被这样危险地误解。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们有时的确在他们的一些论述中为这些误解提供了重要的托词(尽管这些论述可以很容易地像其他许多论述一样数百次地被纠正过来)。因为意识和现实的一致，是每一种辩证法，包括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特征。它的推论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的物质关系，仅仅是它们与它们在那个时期的前科学的和资产阶级科学的意识中得以反映的形式相结合的东西；没有这些意识形式，它们在现实中无以生存。把任何哲学的考虑放在一边，就会明白，没有这种意识和现实的一致，政治经

意义上的”科学。这是因为战争“既不像机械技术(和科学)那样处理死的对象，也不像观念艺术(和科学)那样处理活着的但被动的任人摆布的对象，它处理的是‘活的有反应的’对象。像任何别的非超验的对象一样，战争这个对象‘也是能阐明的’，它的内在联系也是或多或少可以弄清楚的，而且只要做到这一点，理论就是名副其实的理论了。”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概念是如此地相似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概念，以致于不需要更多地谈论这一点。这不是全然令人惊奇的，因为两者有着共同的来源：黑格尔辩证的哲学和科学观。而且，克劳塞维茨的追随者关于他的老师的理论的这个方面的评论，在语气和内容上，是非常惊人地类似于一些现代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理论的相应评论。在施利芬编的克劳塞维茨的著作的编者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克劳塞维茨没有怀疑过一种正确的理论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但他的《战争论》这本书中渗透着这样一种企图，就是要使理论与实在世界和谐。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处理事情的哲学化方式占优势这一事实，但这种方式对现代读者并不总是有吸引力的。”人们可以看到，在19世纪后期被庸俗化了的决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

济学的批判根本不可能成为社会革命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而是必然得出相反的结论。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质上不再是社会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看不到对这种现实和意识相一致的辩证概念的需要：在他们看来，它必定在理论上是虚假的和非科学的^⑨。

在他们的革命活动的不同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或者在经济学的水平上，或者在更高的政治和法的水平上，或者在最高的艺术、宗教和哲学的水平上论及过意识对于现实的关系。探询这些评论(论述)的目的在于什么方面，总是必需的(尤其是在后期，他们几乎只是进行评论!)。这是因为，他们是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和思辨的方法，还是针对“普通的方法，尤其是沃尔夫的再次成为时髦的形而上学方法”，他们评论的含义是非常不同的。在费尔巴哈“清除了思辨的概念”之后，后者再次出现在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的新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之中，“甚至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也在它的鼓舞下“写下了一些缺乏联系的大部头著作”^⑩。从

⑨ 非革命的精神和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辩证方面的完全误解之间的这种关系，在爱德华·伯恩斯坦那里是特别显而易见的。他用一个与马克思理论的真正含义完全不同的评论总结了他对价值理论的不同方面的解释(《社会主义文献》1905年，第559页)：“今天我们〔原文如此——柯尔施〕以一种比穿过那个被称为‘价值’的形而上学对象的谜宫更为直接的方式，考察了价格形成的规律。”类似地，回到康德去的变种和其他倾向的社会主义的唯心主义者把价值与事实分离开来。参见赫兰德天真的批评(《马克思和黑格尔》第26页中)：“大多数人自然地倾向于以康德的术语思考，即承认‘是’和‘应该’之间的区别。”也参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8页)中关于洛克的评论，他说，这位敏锐的资产阶级博学家“在自己的一本著作中甚至证明资产阶级的理智是人类的正常理智”。

⑩ 关于整个方法论情况的最好论述，可以在恩格斯写的关于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两篇文章中的第二篇中发现。它们于1859年8月发表在伦敦出版的德文杂志《人民报》上。这里引证的这些话以及许多别的类似的话，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19—120页找到。(“于是，旧的形而上学及其固定不变的范畴似乎在科学中又重新开始了它的统治”，当“科

一开始,马克思必须弄清的只是他们的见解与前者,即黑格尔的方法的关系。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的方法是从那里产生出来的。他们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改变黑格尔的辩证法,使它从一个表面上是唯心主义的,但潜在地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转换成为一个明显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与社会观点的指导性原则^⑩。黑格尔已经告诫过人们,哲学—科学的方法不是一种可以任意地应用于任何内容的纯粹思想形式。它毋宁说是“以其纯粹本质表现的整体的结构”。马克思在他的一部早期著作中,主张同样的论点:“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⑪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逻辑的和方法的问题,就是说,“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⑫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着这样一种抽象的思辩形式,在这种形式中,黑格尔留下了他的

学的实证内容重新胜过了其形式方面”,随着自然科学的“时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直到沃尔弗式的极端浅薄的程度为止也就重新流行起来了”,这些完全是“康德以前的狭隘庸俗思维方式的极为浅薄的翻版”;“平庸的资产阶级理性这四匹马”,等等,等等。))

- ⑩ 这是由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之间的关系不同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方法之间的关系。参看上面所引用的恩格斯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
- ⑪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79页,《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这句出自黑格尔的话(出自《精神现象学》)在我的《基础》第38页以下作了更长的引证。是否具有理解形式和内容之间这种相一致的关系的能力,把先验论和辩证法的观点(不管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区别开了。前者认为内容是经验的和历史的,形式是普遍有效的和必然的;后者则认为形式还从属于经验和历史的短暂过程,因此从属于“斗争的突发”。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纯粹的民主与纯粹的先验哲学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 ⑫ 恩格斯补充说,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22页。)也可以参见在《资本论》二版跋中马克思自己的著名论述。

辩证方法，并且不同的黑格尔学派以甚至更为抽象和更为形式化的方式发展了这种形式。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作出了一些强有力的相反的论述，诸如：全部思想无非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甚至最一般的思想范畴也只是“既与的、具体的、生动的整体的抽象片面的关系”；思想理解为实在的对象“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⑭。然而，在他们的一生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反对那种把关于直接给予的现实的、思想、观察、感知和理解与这个现实对立起来，好像前者自身也是直接地被给予的独立本质的非辩证法的方法。这一点在恩格斯抨击杜林时所说的一句话得到了最好的说明。这句话是双倍确定的，因为人们广泛地相信，后期的恩格斯完全堕入了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之中，而不同于马克思——他的更富于哲学家气质的文友。正是在恩格斯最后一部著作中，在他把思想和意识描述为人脑的产物，把人类自身描述为自然的产物的同时，也毫不含糊地反对那种把意识和思想“当作某种现成的东西，当作一开始就和存在、自然界相对立的东西看待”的完全“自然主义的”世界观^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方法不是抽象的唯物主义的方法，而是辩证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前科学的、超科学的和科学的意识^⑯，不再超越于

^⑭ 全部这些表述都引自在马克思去世后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文，这是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的方法论见解的最丰富的源泉。

^⑮ 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页）。对恩格斯在他的后期著作中的这些论述作更为完整的分析，表明他只是强调了在马克思那里已经存在的一种倾向。恩格斯接受了全部社会历史现象（包括意识的社会历史形式）最终由经济所决定这一论点，并补充了另一点，即甚至更为决定性地“由自然所决定”。恩格斯这个最后的转折和发展支持了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像正文中的引文相当清楚地表明的那样，它决没有改变意识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辩证观。

^⑯ 术语“前科学的概念化”为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所创造。这个观念自然会出现在先验的辩证的方法被应用于社会科学（例如在狄尔泰那里）的地方。马克思在“以思维着的头脑对世界的理智的掌握”和“以艺术、宗教和实践—精神对

和对立于自然的和(首先是)社会历史的世界而存在。如果它们也是作为世界的一个“观念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它们就作为世界的真实的和客观的组成部分而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这就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之间的第一个明显区别。黑格尔说,个人的理论意识不能“跳过”他自己的时代、他那时的世界。然而,他不是把哲学嵌入世界之中,更多地是把世界嵌入哲学之中。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之间的这第一个区别,是密切地相关于第二个区别的。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在《神圣家族》中写道:“共产主义的工人们很好地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远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这段具有充分的唯物主义明晰性的话说明,如果在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全部真实的现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它的诸意识形式就不能仅仅通过思想而被消灭。这些形式只有在迄今通过这些形式被理解的物质生产关系自身在客观-实践上被推翻的同时,才能够在思想和意识上被消灭。这对于诸如宗教这样最高的社会意识形式、对于诸如家庭这样中等水平的社会存在和意识也是适用的^①。这个新唯物主义的结论蕴含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中,并在马克思1845年为了澄清他自己的思想而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得到了明确和广泛的发展。“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

世界的掌握之间作了严格的和明确的区分。”(见《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关于新唯物主义对于宗教和家庭的观点的结论,请参阅《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四条,在那里它们被第一次提出;并参阅《资本论》各部分。

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认为这意味着实践上的批判完全可以取代理论上的批判，是一个危险的误解。这种观念只是用相反的反哲学抽象的纯粹的实践来取代纯粹理论的哲学抽象。不只是在“人类实践”中，而且是在“人类实践和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马克思作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才找到了对“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的合理解决。辩证法从它的被黑格尔神秘化了的形式向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合理形式”的转化，实质上意味着它已经成了唯一的理论—实践的和批判—革命的活动的指导原则。它就是那种“按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①⑥}。甚至在黑格尔那里，“理论的东西本质上包含于实践的东西之中。”“我们不能这样设想，人一方面是思维，另一方面是意志，他一个口袋装着思维，另一个口袋装着意志，因为这是一种不实在的想法。”对于黑格尔来说，概念在它的“思维活动”里（换句话说，在哲学里）的实践任务不在于普通的“实践的人和感性活动”（马克思）的领域之中。而宁可说是“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①⑦}。相反，马克思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澄清了他自己的辩证方法：“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并不像那些追随者们想象的那样，意味着全部哲学被证明只是幻想。它只是表达了对于所有那些不同时是实践——现实的、世俗的、内在的、人类的和感性的实践——和基本上只理解它自身的哲学观念的思辨活动的（不论是哲学的还是科学的）理论上的明确拒斥。理论上的批判和实践上的推翻在这里是不可分离

^{①⑥} 参照经常引证的《资本论》第二版跋末尾的几句话。

^{①⑦} 参照《法哲学原理》第四节的补充段落和“序言”的最末几段。

的活动,这不是在任何抽象的意义上说的,而是具体地和现实地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和现实的世界。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原则的最精确的表达。

我们现在已经指明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和现实的关系的概念来说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真正的结论。同时,我们也指明了,在各种各样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在他们对待所谓精神现实的理论和实践的态度中发现的所有抽象的和非辩证概念的错误。马克思的名言不仅在狭窄的意义上对于经济的意识形态是正确的,而且对于所有的社会意识形态都是正确的:它们不是纯粹的幻想,而是“非常客观的和非常实际的”社会现实,因此,“必须以实践的和客观的方式来消灭”。正统的资产阶级常识的天真的形而上学观点认为思维独立于存在,并且把真理定义为思想同外在于它并由它“镜子式地反映”的对象相符合。这种观点仅仅确认,所有经济的意识形态(前科学的、非科学的和科学的经济学自身的经济观念)有一种客观的意义,因为它们符合于现实(它们所理解的物质的生产关系)——而所有更高的表现形式则只是缺乏客观性的幻想,在推翻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和废除了它的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之后,将会自动地消融于它们必然的虚无之中。就像一种影像与它所反映的对象相关联一样,经济观念自身只像是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相关联着的。事实上,它们之间是以整体的一个特定的部分与这一整体的其他部分相关联这种方式而相关联的。和物质的生产关系一样,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是归属于资产阶级社会这个整体的。这个整体也包含政治的和法律的表象以及它们的显而易见的对象;这些东西,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法学家们——“私有财产的理论家们”(马克思语)——以一种观念上颠倒的方式把它们当作独立自在的本质。最后,它也包括资产阶级社会的艺术、宗教和哲学这些更高的意识形态。如果看上去不存在

这些表象能正确地反映的对象,那么,这是因为经济的、政治的和法律的表象没有特别的、脱离资产阶级社会的其他现象而孤立存在的对象。把这些对象与这些表象对立起来,是资产阶级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传统做法。它们只是以特殊的方式表现了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正像艺术、宗教和哲学所做的那样。它们的总体形成了适应于其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结构,正如它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适应于这个基础一样。把握了社会现实总体的科学社会主义应该对所有这些形式进行革命的社会批判。这些形式必须连同经济的、法律的和政治的社会结构一起并同时像这些东西一样在理论上被批判,在实践中被消灭^①。正如革命阶级的经济上的行动没有使得政治行动变得不必要一样,政治或者经济行动也没有使精神上的行动变得不必要。相反地,它必须作为在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之前的革命的科学的批判和鼓动工作,作为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的科学组织和意识形态的专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被贯彻到底。如果这对于反对一般地决定资产阶级社会的诸意识的精神行动是有效的话,那么,它对于哲学的行动来说就尤其是正确的。资产阶级意识必然地把自身看作像纯粹的批判哲学和不偏不倚的科学一样离开世界并独立于世界的东西,正像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法律好像是超出社会之上似的一样。应当由作为工人阶级的哲学的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去同这种意识进行斗争。只有当整个现存社会和它的经济基础在实践上完全被推翻、这种意识在理论上全部被取消和被废除的时候,这一斗争才会结束。“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

^① 特别参见列宁在他的《论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的论述,《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603—612页。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问题的现状

——一个反批判

(1930)年

—

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1923年，一本关于“理论上和实践上最重要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关系”的书出版了。它具有严密的科学性，但并不否认所讨论的问题实际上关系到我们那个时代汹涌澎湃的斗争。它准备接受来自它实际上已抨击的派别的片面的和否定性的理论反响。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期望从它的理论上和以理论为工具来代表其实际倾向的派别那里得到公正的、甚至友好的反响。对立面出现了。资产阶级哲学和科学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的评价，回避了它的实际前提和结论，用片面

的态度解释它的理论命题。所以资产阶级哲学与科学的代表人物能够采取一种肯定的态度对待已经被他们歪曲了的一本书的理论内容。他们不对这本书的全部分析所帮助建立和发展的现实理论和实际结论作出具体陈述和批判。相反，他们从资产阶级观点出发，片面选择被认为是这本书的“好”的方面——对精神现实的承认。他们忽略了对资产阶级确实是“坏”的方面——即主张全面摧毁和废除这些精神现实及其物质基础：这些目标将通过革命阶级参加物质的和精神的、实践的和理论的活动而实现。因此，资产阶级的批评家能把此书的孤立的结论欢呼为科学上的进步^①。另外，当代官方“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占统治地位的倾向的权威人物凭着准确的直觉立刻意识到，这本不起眼的小书包含了对某些教条的深恶痛绝的抵制。不管老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正统的教派表面上有多么不同，他们还是共同坚持这些教条。他们因此不谋而合地尖锐谴责这本书，因为它的那些观点背离了公认的学说^②。

在1924年的两个党代会上，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威都把《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谴责为异端邪说。最能立刻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这一谴责所根据的批评性论点，其内容是完全一致的——由于这两个派别的理论和实践在所有其他方面都存在着分歧，人们完全想

① 参见《德国高校政治文献》第1卷第2篇：“尤其注意的是，出现了那种与认为精神的（意识形态的）社会结构是一种虚幻现实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相反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很清楚的，它认为这一结构对现实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或参见拉兹洛·拉德万伊在《社会科学文献》L I, 2, 第527页及以下各页上完整而透彻的回顾：“甚至有些并不信任作者的人也一定能从这本书中懂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泛经济主义。它不认为经济结构是充分现实的唯一领域。它认为精神的领域是完全现实的，并且是社会生活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同上，第535页）。

② 比较1924年召开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党的主席威尔斯的开幕词（发表于1924年6月12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刊物《前进报》上）和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同时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会议》，英国共产党出版，第17页）。

不到会发生这种情况。社会民主党人威尔斯谴责“柯尔施教授”的观点是一种“共产主义的”异端邪说，共产主义者季诺维也夫谴责这些观点是一种“修正主义的”异端。然而，他们的谴责只有术语上的区别。事实上，在巴美尔、卢波尔、布哈林、德波林、贝拉·库恩、鲁达斯、塔尔海姆、邓克尔，或其他属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批评家们直接或间接地展开的反对我的见解的议论中，没有什么新东西。(他们的攻击与我将在后面讨论的最近对乔治·卢卡奇的迫害有关。)他们只是复述和展开了作为另一阵营的官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卡尔·考茨基的陈旧论点罢了。考茨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上，对我的书写了一篇详尽的评论^③。他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在攻击我的著作时，他是在攻击“一切共产主义理论家”。然而，在这场辩论中真正的分界线是完全不同的。一场有关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状况的基本争论现在已经开始，而且有许多迹象表明，在一切主要的和决定性的问题上的真正分界线是存在于下列双方之间，即：以考茨基的旧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和新的俄国“列宁主义”正统派之间的联盟为一方(尽管它们之间有次要的、暂时的或琐碎的冲突)，而以当代无产阶级运动中所有批判的进步的理论趋向为另一方。

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一般状况说明了，为什么我的批评家中的绝大多数毫不关心由“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这个主题所规定的较为有限的那些问题，反而去关心书中没有充分论述、而只是接触到了的另外两个问题。一个是在我的书全部论述中份量很轻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概念问题。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

^③ 见1924年6月3日出版的《社会》1,3,第306页以下。同样陈腐的论点出现在所有共产党的批评家中间,在编辑G·巴美尔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俄文本所作批判性序言里,可以发现所有这些论点。本书俄文本1924年由莫斯科的“伟大的十月”出版社出版发行。(另一个没有任何评论的译本在1924年略早于上书由“科尼加”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发行)。

形态概念或有关意识和存在的关系的更一般的问题。这样一来，有关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的关系的特定问题最终反倒丢掉了。关于后面这一点，我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提出的论点在许多方面与卢卡奇在更广泛的哲学基础上所确立的命题相一致；这些命题是他在辩证法研究中发现的，并写进大约与我的书同时出版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当中。在我那本书的《附记》中，我说明我基本上同意卢卡奇的观点，并暂不讨论我们之间依然存在的有关方法和内容的特殊的分歧。这在当时错误地被——特别是被那些共产主义的批评家们——当作我们之间完全一致的一种招供。事实上，我自己当时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卢卡奇和我分歧的程度，尽管我们在理论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实际上我们的分歧不只是少数“琐碎的”论点。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我不答应我的共产主义的攻击者们坚持要求澄清我的观点同卢卡奇观点的区别的一个理由——还有其他一些理由，此处不做讨论。我宁愿让这些批评家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同等对待卢卡奇和我本人，说我们“背离了”作为唯一救世良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今天，在这个未经改动的第二版中，我不能再像我曾做过的那样，说我从根本上同意卢卡奇的观点。早先使我不把我们的分歧加以充分说明的另外一些理由也早已不适用了。不过，我今天还是相信，在对待旧的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和新的共产主义正统派的批判的态度上，卢卡奇和我客观上是站在一起的。这毕竟是核心问题。

二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提出一种马克思主义观，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完全非教条和反教条的、历史的和批判的，因而是最严格意

义上的唯物主义。这一观点包括把唯物史观应用于唯物史观本身。而旧的和新的两个派别的正统批评家们反对这样做。但他们的第一次教条主义的反击却伪装成是极端“历史的”和表面上相当“非教条主义的”谴责。他们指责我的著作表示了对“原初的”形式的毫无道理的偏爱，在那种形式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发现了他们新的唯物辩证法：一种与革命实践直接联系的革命理论。他们说，我忽略了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的建设性发展，也完全无视这一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在一些重要方面修改了他们最初的理论，以致于只是在较晚的形式中它才得以完全历史的详尽阐述。

显然，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说，这就提出了一个真正具有重大价值的问题。它涉及到几个相继的发展阶段，通过这些阶段马克思主义从它的最初的观点转变成了被区分为不同历史版本的现今状态。它还包括这些不同阶段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现在工人阶级运动中理论的一般历史发展的意义。

十分明显的是，每个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派别都以大不相同的方式评价这些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些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在今天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相互竞赛，甚至在理论水平上，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最尖锐的冲突。19世纪70年代第一国际的解体预示了第二国际1914年前的关于世界大战爆发的看法的破产，因为两者不是产生一个而是产生若干个不同的派别，它们都援引马克思，相互间为了“真品”——宣称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的权利——而斗争。最好简单地斩断这些教条主义争辩的难解之结，把自身置于辩证分析的领域。这可以象征性地说成是真品被丢了。换言之，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种版本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纯粹未经伪造的”理论的某些抽象原则的教条主义分析，都应当

抛弃。恰恰相反，必须从历史的、唯物辩证法的视角，把所有这些较早和较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看成是历史演变的产物。确定这一演变的不同阶段、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方法，将依赖于人们开始这一分析时所采取的角度。在我的书中，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为了这一目的，我划分了三个主要的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起依次经历这些时期，在每一个时期它与哲学的关系都以特定的方式发生变化^④。这种特殊的处理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历史来说是唯一正确的。对于我所划分的第二时期来说这尤其正确，对于别的目的，这也一样。我确定这第二个时期开始于1848年6月起义和19世纪50年代随后的几年，看到了资本主义一种史无前例的新高涨和早先曾经兴起的所有无产阶级组织和梦想的破灭。在我看来，这一时期一直延续到这个世纪末。

很可能会有人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这样拴在一起的分析方法太抽象。因为它把一段极长的时期当作一个单独的整体，忽视了其中对于工人运动整个历史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变化。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上没有发生决定性的变化，这正如哲学在中世纪没有变化一样，是确凿无疑的。因为在那时，哲学终结了，这影响到整个德国资产阶级，同样也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无产阶级。然而，对于185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哲学的关系的整个历史，如果不满足于只是追寻这一

^④ 考茨基(见前引书，第312页)认为我和所有其他共产主义理论家凭臆测所唯一承认的“原初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他们30岁以前的著作”中的理论所构成的。但是，追随考茨基的巴美尔在所有其他方面(见前引书，第13页以下)都很盲目地毫不相干地把他的博学用来攻击我的无知，因为我“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写作马克思的思想传记”。关于这两点还应当指出，我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历这些时期是在它最初形成之后，并且我认为这些时期的最初的表现不是“早期著作”，而是那些写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的著作。

过程的非常一般的轮廓的话，自然不得不弄清楚这一时期其他一些主要区别。在这方面，我的著作的确遗留了大量的问题。不过就我所知，还没有任何人提出这些问题。例如，恩格斯1888年在他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结尾著名的一节中谈到，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当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又一次积极地开始相互作用时，这可能未被视为接近第三时期的第一个标志。因为恩格斯本人在他的导言中就提到，“德国古典哲学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各国，甚至在德国的一种复活”——虽然这首先只涉及到修正主义的康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资产阶级的“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理论描述成一种“反哲学”，尽管它实质上仍是属于哲学的。有必要对1850年到1890年这40年做一个回顾性的分析，看看这种“反哲学”后来怎样朝着两个独立的方向发展。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科学”成了“实证的”，并且逐渐地完全脱离哲学。另一方面，一种哲学的发展在与前者的表面冲突中出现了，但实际上它是对前者的补充。这最先见于19世纪50年代后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里，然后是更晚些时候在他们的最好的门徒——意大利的拉布里奥拉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它的理论特征或许可以规定为一种向黑格尔哲学的复归，而不只是向19世纪40年代狂飙与突进运动时期黑格尔左派的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反哲学”的复归^⑤。

^⑤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50年代末之后对黑格尔的这“第二次”回归，见梁赞诺夫《马克思恩格斯文库》Ⅰ，第122页以下的一些有趣的观点。拉布里奥拉和普列汉诺夫发展了这种黑格尔哲学倾向，在他们的著作的每一行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普列汉诺夫的哲学弟子列宁也以一定的形式坚持这一点，这将在后面加以讨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期理论的这种哲学倾向不止在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一书对哲学改变了的态度中看得出来，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中也有一定的暗示：这方面的明显迹象已经表现在马克思 1859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恩格斯的自然科学专题甚至有更明显的结论：这可以从他的《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看到。既然如此，人们就只能承认，随着第二国际的诞生，就“德国的工人运动”“吸取”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包括它的哲学方面而言，它的确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但是，这些并不是那些批判我所勾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的三个时期的人们提出的问题。他们还没有试图表明，这种时期的划分甚至对我的研究的特殊目的也是无用的。他们宁愿指责我以一种否定的眼光倾向于把 1850 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历史描述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的革命理论所遭受的一种单一的、线性的、只有一种意义的衰败过程——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相互关系的领域，而且在每一个领域^⑥。他们就爱攻击这种主张，虽然我还没有采纳它。他们竞相指出由他们自己发明并归咎于我的一种观点的荒谬性，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自己的理论的退化负有责任。他们不知疲倦地证明从《共产党宣言》最初的革命共产主义到“第一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然后到《资本论》和马克思与恩格斯晚期著作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过程的无可怀疑的实证性质。在首

^⑥ 为了证明这种指责，考茨基断章取义地在脚注^⑩和^⑪中摘引了两段，他省略了我在其中就这个问题非常清楚而毫不含糊地表明我的主张的那个句子，而这个句子是同我的论证的总的上下文相联系的（第 30 页以下）。我明确地把后来“1867 年——1894 年的《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晚期著作的科学社会主义”表述为“马克思的一般理论的更发达形式”，以相对于先前历史时代的“直接的革命的共产主义”。我对他们的晚期和更发达形式的理论极为肯定的态度的更进一步例证，可以从我所写的马克思 1875 年《哥达纲领批判》的导言和我在《国际》1924 年版第 573 页以下所发表的《第一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这篇文章中看到。

先论证了晚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点无人否认——之后，他们就匆忙地宣布这样的结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越来越明显，正是在这些攻击背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种教条主义的偏见，尽管他们都自称关心我就185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发展所作的论述的历史精确性。这里面实际所包含的是直接教条主义地捍卫传统的和正统的论点，即第二国际的理论始终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在考茨基看来），或者（如那些共产主义者所说）无论如何直到1914年8月4日的“原罪”为止一直是如此。

关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历史发展怀有的偏见，考茨基是最明显的例子。对他来说，不仅第二国际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理论变态，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4年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以及恩格斯在1895年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新版所写序言中所从事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扩展”，都把马克思主义从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扩展”成一种“不仅对革命时期而且对非革命时期也有效的理论”。在这里，考茨基只是剥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上的革命的特征；但是，他还假装承认它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理论”。后来他走得更远。他的最新的主要著作《唯物主义历史观》，排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任何基本的联系。他针对我的所谓马克思和恩格斯使马克思主义枯竭化和平庸化的“指责”的整个抗议，无非是要掩盖他故弄玄虚和教条主义地使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立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权威”之上罢了。他和其他人一度伪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早已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不再承认它，现在已经抛弃了它的最后一点残余。

然而，恰恰是在这里，新的共产主义者们与老的社会民主党的

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在理论上团结一致起来。像巴美尔这样的共产主义批评家们争辩说,在我的著作中“像‘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概念由于极度抽象和程式化的框架而模糊不清”。这一指责隐藏着教条主义地维护“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企图,虽然列宁和他的战友在激战中说过某些东西,但是他们从来也没有抛弃“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遗产。正如共产主义的“理论家们”在这种情况下要做的那样,巴美尔避免自己涉及试图挽回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面子之嫌,他反倒躲进列宁的宽敞的庇护所中。他试图向读者解释他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赖以模糊“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抽象的和程式化的”方法意味着什么,便以标准的经院主义的方式,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列宁曾经在那句话中承认,对于现代工人运动的进展,“第二国际具有历史性功绩”^⑦。列宁是一位伟大的策略家,当正好谈到第二国际的实际贡献而不是理论贡献时,他以一种高度复杂的策略做出了这种评论。但是巴美尔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把列宁对社会民主党实践上好的方面的赞扬扩展到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他不是直接得出这种清楚的结论,而是为了达到这种效果而以“一种极端抽象的和

⑦ 这段话来自列宁写于1919年7月伯尔尼国际卢塞恩代表大会之前的一篇文章(《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50页以下,《论第三国际的任务》)。它是就“第三国际”问题对当时还被认为是左派社会主义者的英国工党领导人拉姆塞·麦克唐纳所写的一篇文章的回答——第三国际那时刚刚发表它的成立宣言,出现在无产阶级面前。麦克唐纳的文章发表在德国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上(第4、5期合刊,第52页以下),这一杂志当时由共产国际西欧书记处发行。巴美尔引用这段“话”去证明完全不同的主张,因为在那特定的上下文中列宁根本没有提到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列宁所列举的“具有觉悟的工人永远不会抛弃的”第二国际的“历史性功绩”和“不朽的成果”的全部内容都完全是实践的东西,诸如“合作社的、工会的和政治的组织”的产生,“利用了资产阶级议会制以及所有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机构等等。”(同上,第461页。)

模糊的方式”这样咕哝说，“也许不难表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很可能说出同样的话”。

自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世以来，我已经在别处写了一篇关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历史性质的论文。在19世纪最后30年间，由于历史条件的改变，碰巧社会主义运动重新觉醒和成长壮大了；但是与想象的相反，它从来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总的体系来采纳^⑧。根据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具有同样教条主义基础的对手的意识形态，据说整个马克思主义都被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所采纳。实际上，他们在理论上采纳的全部内容不过是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中吸取了一些互不相干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理论”。它们的一般意思因而被改变了；它们的特定内容往往被删节和窜改。运动纲领和理论具有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性质这样的没完没了的声明，在新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实践最大限度地接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和阶级斗争性的那个时期并没有提出过。在这个较早的时期，“伦敦的两位老人”，以及1883年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自己，都直接卷入了这场运动。完全矛盾的是，这些声明开始于一个较晚的时期，那时某些其他流派在工会和政治实践中获得了基础，并最终在“修正主义”之中找到了它们的意识形态的表现。事实上，正当运动的实践是最革命的时候，它的理论却（在拉萨尔和杜林的影响下）基本上是民粹派的和民主主义的，只有只言片语是“马克思主义的”^⑨。这就是19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和萧条时期的冲击的

⑧ 见我的由本书出版者发行的书，《唯物主义历史观：同卡尔·考茨基的争论》（以下简称《同考茨基的争论》），特别是最后一节“考茨基主义的历史意义”（这一节没有收入格律恩堡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库》XIV的缩写本中，第197页以下）。

⑨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一时期的通信，刊印于我所编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

结果,随之而来的是 1871 年巴黎公社的失败、德国的反社会党人法、1884 年奥地利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以及 1886 年美国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遭到残酷镇压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的反动时期。然而,在 19 世纪 90 年代的欧洲,特别是德国,新兴工业迅猛发展,与此同时,在欧洲大陆出现了“更民主地”使用国家权力的最初迹象。这一过程包括 1880 年法国对巴黎公社社员的大赦,以及 1890 年德国反社会党人法的废除。在这种新的实际背景下,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正式声明就表现为一种理论的辩护和形而上学的安慰。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实际上可以颠倒一下公认的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之间的关系,把考茨基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定义为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理论翻版和对称物^⑩。

根据这种实际历史情况,反对我的著作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的控告不仅是无理的,而且是徒劳的和无效的。他们说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的最初历史版本的“原始的”形式有一种偏爱,并且无视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以及 19 世纪下半叶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对它的积极发展。他们声称“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基于最初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进展。但实际上,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理论的一种新的历史形式,是在新的历史时代,从改变了的阶级斗争实际背景中产生出来的。它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

判》一书,以及我的导言中的相应评论。澄清这种关系的更进一步的重要材料包含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1 年——1895 年《致伯恩斯坦的信》中,这些信后来公开发表了(柏林,1925 年)。

^⑩ 参见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在他们各自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方面以及他们相互间的理论关系方面就这个时期发生的变化所提供的相对应的论述。这完全纠正了原先那种传说,即社会民主党理论在伯恩斯坦“修正它”以前曾经具有明确的和显著的“马克思主义的”特征。见梅纳尔的《国民经济理论自我叙述》,莱比锡,1924 年版,第 12 页以下(伯恩斯坦)和第 134 页以下(考茨基)。

或晚期理论的关系完全不同——实际上更复杂——于那些谈论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中马克思理论的积极发展或者相反地形态上的停滞或退化和衰败的人所提供的情况。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已为目前工人运动的世界观所取代了的社会主义理论，如同考茨基所主张的那样(在形式上他只是指它的早期形式，即“《共产党宣言》原初的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他却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整个晚期理论也包括了进去)。马克思主义既不是1900年前第三个时期开始之际由正统的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倾向的代表们所宣称的东西，也不是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种东西。它不是一种能够神话般地预见将来一个长时期里工人运动的未来发展的理论。因而不能说随后的无产阶级的实际进步，实际上落在了它自己的理论后面，或者它只能逐渐充实由理论给它规定的构架^①。当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的时候

① 尽管马克思说过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样著名的话，他本人还是没有完全摆脱对待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后来工人阶级运动的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的一些教条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看法。例见他在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中对与早先所获得的那种较高的理解相比纲领草案令人愤慨的理论退步和纲领作者对“在党员群众中广泛传播的见解的惊人侵犯”的再三指控。后来，修正主义和中间派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激进的左派对手把这种态度变为了一种体系。然后，他们宣布马克思主义“停滞了”，并且用这一体系去解释其原因。例如，罗莎·卢森堡在1903年3月14日《前进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极为严肃地说，现在可以在运动中觉察出来的“理论停滞”，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实际斗争超越了马克思主义，而正好相反，是因为马克思的理论成就超越了我们这个实践的富于战斗性的党。不是因为马克思不再适合我们的需要，而是因为我们的需要还不适应马克思的思想优势”。博学的马克思主义者梁赞诺夫1928年在德国出版的一本选集上重新发表了罗莎·卢森堡的这篇文章(英文版见《卡尔·马克思——人、思想家、革命家》，伦敦，1927年版，第105页以下)。虽然罗莎·卢森堡的文章写于大约30年前，但梁赞诺夫只是从今天的优越地位对它作了如下补充：“俄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表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发展的每一个新阶段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无穷无尽的宝库中发现了适用于斗争新阶段的新式武器”(同上，第11—12页)。罗莎·卢森堡头足倒置地改变了理论对实践的关系；这一直言肯定还未复归于以脚立地的状态。

(这是一个伴随着 1891 年由考茨基和伯恩斯坦起草的爱尔福特纲领而完成的过程),它的高度明确表达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同远远落后于这种革命理论的实践之间出现了日渐扩大的裂隙;在某些方面两者发生了直接的抵触。这道裂隙实际上是显而易见的,它后来越来越被党内的根本势力(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敏锐地感觉到,只有中派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才否认它的存在。这一裂隙很容易为下述事实所说明,即在这个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当它被工人运动所正式接受的时候——在“不是别的,而是现实历史运动的一般表述”(马克思)的意义上,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真正的理论。相反,它一直是“从外部”以预先设立的形式被灌输的意识形态。

在这种情况下,考茨基和列宁这样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便从临时的需要中得出了永久的美德。他们不遗余力地捍卫这样一种观点,即社会主义只能由与工人运动密切相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给工人^①。这也同样适用于像罗莎·卢森堡

^① 参见考茨基在《新时代》第 20 卷 I,第 68 页以下对提交给 1901 年维也纳党代表大会的新版海恩菲尔德纲领草案的驳斥。这个草案的一段话声明,无产阶级将意识到通过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起的斗争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考茨基很好地概括了这里的意思;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意识就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必然的直接的结果”。他接着说:“但是,这种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当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也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是根源于现代经济关系的,也同这种阶级斗争一样,是从反对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群众的贫穷和困苦的斗争中产生的,但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是并列地产生的,而不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它们是在不同的前提下产生的。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的确,现代的经济科学也像现代的技术(举例来说)一样,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先决条件,而无产阶级不管自己多么愿意,终究既不能创造出现代的经济科学,也不能创造出现代的技术;这两种东西都是从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总之,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现代的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给了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

这样的左派激进分子，她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并且通过把马克思同无产阶级相对照来说明这一点：马克思由于用资产阶级教育的全部财富武装自己而具有了创造力，而无产阶级则仍然依赖于“我们的社会中现存的社会条件”，这些条件在整个资本主义时代里将保持不变^⑬。其实，历史事实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国际中理论和实践之间显而易见的矛盾提供了一个唯物主义的说明，对那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直想解释的全部秘密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答。这就是事实。那时的工人运动正式采用“马克思主义”，当作它的意识形态；虽然它的有力的实践比以前具有更广泛的基础，但它还是根本没有达到早先由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

去。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部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旧加因斐诺说得非常正确：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识无产阶级地位及其任务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假使这种意识会自然而然地从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那就用不着这样做了”(同上，第79页以下)。一年以后，1902年，列宁在他的著名纲领《怎么办》中发展了考茨基论证的关键的观点。他重新发表了“考茨基的十分正确而重要的话”，并且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的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56页)。在这本书的其他许多部分都可以看到同样的观点，例如在《列宁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47页上就有下面相当明确的论述：“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理论中成长起来的。”

^⑬ 梁赞诺夫，见上面引证的他的那本书，第113页。利昂·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该书1923年底出版于俄国，一年以后在德国出版(由文学与政治出版社出版，维也纳，1924年)，书中包含了对这种卢森堡主义的观点的难以理解的重复和发展：工人阶级“只有从他们现存的社会地位中获得完全的解放之后，才能创造他们自己的科学和艺术”，而且尤其是，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才会成为无产阶级的完整的财富——但无产阶级无论如何也将不再存在。”(《文学与革命》，安·阿尔伯，1960年版，第146—147页，184页以下，特别是196页以下。)

的阶级斗争在更狭窄的基础上所获得的一般理论成就的高度。这个高度是在1850年结束的资本主义第一个大周期的最后阶段达到的。当时,工人运动达到了一个发展的高峰。从那以后,由于条件的变化,工人运动出现了暂时然而完全的中断,只有缓慢的复苏。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设想了他们的革命理论同实际的革命运动的直接关系,但当这种衰落发生时,他们只能继续他们的理论工作。诚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后来的发展的确不是“纯理论”研究的产物;它一直是对最近以各种方式复兴的阶级斗争实践经验的理论反思。然而明显的是,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不再直接涉及工人运动的实践,但他们的理论还是不断进展到从未有过的理论上尽善尽美的较高水平。这两个过程彼此间相对独立地一起展开。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以前的历史时代所产生的旧理论在新的条件下获得发展。而另一方面则是工人运动的新的实践。正是这一点,解释了下述现象:这一时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某些门徒的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般地和在哲学方面达到并超越了字面上“与时代不合”的高度。这也就是在这样的高度上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全然不可能实在地而非形式地为无产阶级的运动——它的实践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得到复苏——所吸收的原因^④。

三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无论是社会民主党人还是共产主义者,还提出了一个次要的批评。这涉及我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④ 在我的《同考茨基的争论》一书第119页以下对此有更详细的讨论。

中的一个观点,即,对从这个世纪末开始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第三阶段中马克思主义同哲学的关系需要有一个新的评价。在此之前的那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各个派别忽略并且极度轻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革命的哲学内容——这种忽略采取了各种形式但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对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目的在于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哲学的方面。这样一来,它就与所有那些早先自觉地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康德主义的、马赫主义的或其他的哲学上的“修正主义者”的德国和国际马克思主义内的集团站在了对立面。其中最突出的派别是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内部占统治地位的核心集团中发展起来的,它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采取一种反哲学的、科学实证主义的观点。甚至像弗兰茨·梅林这样正统的革命家,也由于赞同这种观点对所有哲学“幻想”的蔑视而称赞这种观点。然而,读者很快就会弄清楚,我对今天哲学革命任务的看法甚至可能同第三个派别具有更强烈的对抗性。这个派别主要是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派别中产生的,现在主要以新的布尔什维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家们为代表。

乔治·卢卡奇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和我自己的著作的第一版都出版于1923年。一旦这两本书为外界所知,它们就遭到俄国和其他每一个地方党的报刊带有超乎寻常的敌意的攻击。这主要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俄国党的领导在“宣传列宁主义”的口号下,在那时开始了一场使共产国际中所有非俄国党的意识形态“布尔什维克化”的运动^⑮。这与为了列宁主义的遗产而在列宁的继承者中间开展的尖锐的斗争是一致的(这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开始了),

^⑮ 参见我就当时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所写的纲领性文章《列宁和共产国际》,发表于德国共产党的理论杂志《国际》(1924年,第320页以下)。

也与德国 1923 年 10 月和 11 月的事件相一致,这些事件是西方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实践的主要挫折。这种“布尔什维克化的”意识形态的中心环节是一种宣称恢复了真正未经窜改的马克思哲学的完全哲学的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它企图反对工人运动内部一切其他的哲学派别。

当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传到西方的时候,它就反对卢卡奇、我和其他“西方的”共产主义者的著作,我们这些西方共产主义者形成了共产国际自身内部一个敌对的哲学流派。于是,这在战前社会民主党国际内部发展起来的两个革命派别之间导致了第一次真正直接的哲学讨论。这两个派别在共产国际内只在表面上是统一的,虽然迄今为止它们的分歧一直限于政治和策略问题^⑯。由于下面将要提到的某种历史原因,这一哲学讨论不过是双方几年前激烈进行过的政治和策略争论的一个微弱的回响。从 1925 年开始,在苏联党内,然后在所有其他共产党内越来越靠斗争方式加以解决的这场派别争论很快使这场讨论变得模糊了。尽管如此,这场争论是全面发展中的一次的确有一定的意义的机会。因为这是突破俄国评论家所谓迄今盛行于俄国与西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立场之间的“互不了解性”的第一次尝试,而这些俄国评论家对两方面的理论状况都是非常清楚的^⑰。

^⑯ 这里人们可以回顾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对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和策略的强烈批评,这些政治和策略从俄国革命之后一开始以及共产国际正式建立以前就实行了;也可以回忆一下在荷兰共产党人潘涅库克和高尔特领导的激进的左派和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之间于 1920 年到 1921 年间达到的势不两立的分歧。

^⑰ 参见马克斯·维纳(阿·施弗林)在《社会》Ⅳ,7,第 42 页以下,特别是第 60 页以下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是一项内容全面的研究,由于它利用了俄国独有的文件,它对俄国以外的读者尤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必须记住,尽管对俄国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批评性对照来自今日俄国执政党的一个政治反对派,然而它的作者是一个正统的普列汉诺夫的信徒,一

让我们用意识形态的形式总结一下1924年的这场哲学争论，这种意识形态的形式深深植根在参与这场争论的那些人的头脑当中。这场争论以列宁主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解释为一方^⑮（在俄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早已被宣布为正牌的圣经），以那种据说是唯心主义地背离这一正牌圣经的康德的批判先验主义和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观点为一方。这些就是乔治·卢卡奇以及德国和匈牙利共产党内其他一些理论家们的观点，德国和匈牙利的这两个党由于具有不同程度的正义感而被看作卢卡奇的支持者^⑯。

个在哲学上站在俄国马克思主义一边的人。因而，他的批评根本不是旨在反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历史结构，而是只反对它的最近的滑稽形式，这些滑稽形式使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显得不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一种“发展和继续”，而是一种“败坏和歪曲”。（“不言而喻，普列汉诺夫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不负任何责任。”）施弗林对于为什么“西欧共产主义者——更一般地说——所有欧洲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所有在罗莎·卢森堡和弗兰茨·梅林的理 论传统中培养起来的人，要进入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潮流是这样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只有一种很肤浅的意识形态的理解。一方面，他以一种纯粹意识形态的方式把这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西方激进的左派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留下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传统”。另一方面，他把它的起源肤浅地置于这样一个事实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直很明确地被构造成一种国家的意识形态”，并且“适应苏维埃国家的非常专门的任务”。在第63页以下，他借助某些历史的阶级的因素来解释西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理论之间的冲突。但是他不知道，这些因素也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和西欧马克思主义之间在理论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的现实的并且更深刻的原因。

- ⑮ 参见A·德波林1924年出版的两本小书，《列宁，战斗的唯物主义者》和《列宁致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信》，也可以参看列宁的纲领性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的德译本，它延迟三年于1927年出版（中文版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12页）。J·卢波尔的《列宁和哲学：关于哲学同（俄国）革命的关系问题》是对这一文献的一个迟到的贡献——一本可怜的小册子。
- ⑯ 例见德波林在哲学上对卢卡奇当时出版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所表述观点的反批判（定期的《工人参考》第10期第615页以下《卢卡奇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一文，由文学与政治出版社出版，维也纳，1924年），以及在那里

就《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来说，这种“唯心主义的背叛”的指责是不公平的，它把作者在他的著作中从未表达过的观点归之于他了。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作者已明确驳斥了这些观点，例如他的据说对“自然辩证法”的否认^②。然而，攻击也对准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确有的观点，尤其反对它不断重复的对“幼稚的现实主义”的辩证否定。“幼稚的现实主义”既包括“所谓十足的常识，最坏的形而上学家”，又包括资产阶级社会的标准的“实证科学”；它也包括今天实证主义的坏的继承者，即缺乏任何哲学洞察力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因为所有这些东西都“在意识和它的对象之间划了一条严格的分界线”，并且“把意识当做某种现成的东西，当做一开始就和存在、自然界相对立的东西看待”（正如恩格斯早在1878

（第618页）对哲学上的“列宁主义”的主要代表当时看问题的方式的表述：“卢卡奇已经有他的信徒，在某种意义上，他是这一整个运动的领袖人物，这个运动中的其他一些人包括：柯尔施同志（见他的书《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福格拉塞、雷维和其他人。既然如此，就不能忽视这些人。至少，我们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这个‘新派别’的基本原则受到批评。”亦见1924年7月25日《真理报》上内容相同的论述：“卢卡奇的书肯定引起了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们的注意，因为在卢卡奇之后，出现了一个完整的共产主义者集团：卡尔·柯尔施、雷维、福格拉塞和其他人”——甚至：“卡尔·柯尔施属于德国共产主义同道者集团，他们就是季诺维也夫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顺便提到的在哲学上背离正统马克思主义路线的理论家”。在其他许多理论家那里也可以发现大量相同的论述，这些理论家那时在所有共产主义杂志和报纸上都参加了已经开展的反对这一新“背叛”的战役。

- ② 这实际上是在已经提到的1924年7月25日《真理报》上由其他共产党评论家所写的文章中讲的。参看《马克思主义和逻辑》所阐述的相反的观点（第30页以下），它所讲的与人们所说的我的主张正好相反。这同样适用于在我就这一点提出的恩格斯的观点和马克思的观点之间的基本区别这一段话上，共产党批评家的老一套的和周而复始的指责。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在这个特殊问题上大体上避免了卢卡奇和雷维对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的那种片面性，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仿佛是完全不同的。这本书还从根本上避免了教条主义的因而非科学的“正统派”的传统做法，他们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成了完全自明的不可动摇的信条，由这两位教父产生的“学说”是绝对始终如一的。

年反对杜林时就曾指出的那样)。

因为我那时相信,这个观点对于辩证唯物论者或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与其说是详细说明了而不如说是假定了对于意识和存在的关系上粗糙的、前辩证的(Pre-dialectical)、甚至是前先验的(pre-transcendental)观念的这种批判。但是,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无意中触及了那时有计划地从莫斯科分发到整个西方共产主义世界的“哲学”世界观的要害。它的确构成了新的正统理论,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新的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职业阐述者那时通过不断重复他们早已背下来的“唯物主义”字母表的ABC来回答这种假定的“唯心主义的”攻击^①。他们天真地这样做,对于腐败的“西方人”来说,显得只是一种“哲学上的无知状态”。

尽管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具有荒唐的不一致和引人注目的矛盾,列宁的追随者仍在细节上都遵循着它,而我认为,同列宁的唯

^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ABC就是,把真理定义为表象同外在于它的对象相一致。柯尔施把这叫做‘十足资产阶级常识的天真的形而上学观点’。他不理解,或者不想理解,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柯尔施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的——一种唯心主义的同一性哲学和马赫主义哲学的混合物”(《真理报》1924年7月25日)。《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俄译本编辑和批判的注释者巴美尔表达了同样的论点。在他的序言中(第19页),他逐字逐句地引用了对于所谓“更严肃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和实际主张来说我有关“十足资产阶级常识的天真的形而上学观点”的结论的陈述(第69页之前)。然后,他就把这一整段和随后的见解描写为“完全不可理解的”,并且提出了下列非难性的问题:“如果柯尔施同志认为把真理定义为表象同外在于它并由它‘反映’的对象相一致是‘资产阶级常识的天真的形而上学观点’,那么他还能算作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吗?难道没有必要指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对唯心主义感觉论的一种投降吗?”然而,我很容易通过提一个相反的问题来回答这个毁灭性的提问:“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这样一本可怕的唯心主义的书首先出版了?”这样,深刻的批评家突然想起,他的职责是一名编辑,他以情有可原的条件为借口说:“问题的要点是,柯尔施同志不了解知识论问题,而知识论影响着他所感兴趣的问题。”

物主义哲学的明确论战本身是次要的。这是因为，当列宁在世的时候，他本人没有把这种哲学建立在基本的理论公式基础上。相反，他在实践的和政治的基础上把这种哲学说成是“有利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唯一的哲学。他把这种哲学同来自康德主义、马赫主义以及其他唯心主义哲学的“有害的”体系相对照。这种态度清楚地表现在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后的那几年里他就“哲学”问题同马克西姆·高尔基的私人通信。虽然他们是私人朋友，但他们在哲学上还是不能取得一致，列宁一次又一次地试图说服高尔基，“一个党员一旦认识到某种学说是极端错误和有害时，就必须起来反对这种学说”，就这一“绝对不可避免的斗争”来说，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力争使党实际上所需要的工作不受损害”^②。同样，列宁的主要哲学著作的真正重要性并不在于他反对

② 这句话引自列宁1908年3月24日的信，着重号是列宁加的。从这封信以及他的后来的通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作为“党的人”是怎样毫无保留地服从于党所关心的一切理论问题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395页）。然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德译本的俄国编辑A·德波林，当他试图表明那时列宁就这些哲学问题所采取的公开的策略主张和像卡尔·考茨基这样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所持的观点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时，他就重写了历史。甚至刚才提到德波林（在上书第XIX页上）据以确立自己的意见的列宁致高尔基的信，也没有包含一份公开的宣战书，而是包含了对“有条件的中立”的一种策略性的建议；所谓“有条件的”，是因为“这个问题基本脱离了党内的争论”。

此外，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一版的第六个注释中，我已经重复了俄国《无产者报》编辑部（即列宁）这时发表于考茨基所编《新时代》（1908年3月10日）XXVI, I, 第898页上的特殊的反证。这涉及到在以前围绕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哲学分歧问题曾经发表过的批评性的看法。列宁那时以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的名义发表了下述正式声明（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24页）：“这种哲学上的争论（即列宁在声明中已经提到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认识上是赞同斯宾诺莎和霍尔巴赫的学说呢，还是赞同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说’）实际上并不是派别的争论，而且编辑部认为，这也不应当成为派别的争论；一切想把这种分歧当作派别分歧的企图，都是根本错误的。无论在这种或

和驳斥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各种唯心主义派别的哲学论点；这些派别中的康德主义已影响了当时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修正主义派别，而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影响了中派。列宁著作的真正重要性在于他力图在实践中反对和粉碎这些当代哲学倾向时所具有的那种极端严厉性。他把这些哲学倾向看做从党的工作的角度来看来完全错误的意识形态。

这里必须提出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②③}。这位据说是恢复了马克思的真正唯物主义哲学的作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 19 世纪 40 年代一劳永逸地结束了黑格尔和黑格尔派哲学之后所进行的那种理论工作十分清楚^{②④}：“他们在认识论领域中只限于改正费尔巴哈

那种派别里，都有两种哲学流派的拥护者。”

这个声明形式上赞同了发表于 1908 年 2 月 14 日《新时代》上的批评性看法，它也把这种哲学争论描写成一种不必那么尖锐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极端严重的策略分歧”。一年以后，考茨基在 1909 年 3 月 26 日致俄国流亡者贝恩第阿尼策的信中，建议在党内宣布马赫主义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德波林激烈地抨击这个提议“对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是荒谬的”。然而，所有客观的历史学家都必定指出，列宁在已经提到的前一年的两个声明中“宣布”，不仅在党内，而且在每一个派别内部“马赫主义都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而且在一年以后，在“《无产者报》扩大的编辑委员会”（当时相当于党的领导机关）的巴黎会议上，一次并非与这些哲学问题全然无关的分裂发生了。这次分裂不是发生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而是在布尔什维克派自身内部。就在这时，列宁对波格丹诺夫的一项决裂的声明做出正式回答，他认为波格丹诺夫是从布尔什维克派内而不是从党内分裂出去的：“派别并不等于政党。政党可以包括许许多多不同色彩的派别，其中极端派相互之间甚至会有尖锐的矛盾。”（《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400 页）因此，实际上列宁和考茨基在这个问题上都正式持同样的观点，只是后来他们的一般观点的尖锐分歧扩大了，并且越来越明显。

②③ 参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244 页以下）中以“对杜林的两种批判”为题与此有关的那部分，本段引文皆出于此。着重号是列宁加的。

②④ 在这一点上，列宁并没有像他的著作打算做的那样，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展划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他只是一般地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和狄慈根出现于

的错误,讥笑唯物主义者杜林的庸俗,批判毕希纳的错误,强调这些在工人中间影响广名声大的著作家所特别缺少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和狄慈根并没有去关心叫卖者在几十种出版物中所叫卖的那些唯物主义的初步真理,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不让这些初步真理庸俗化、过于简单化,不使思想僵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上半截是唯心主义’),不使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个唯心主义体系的宝贵成果被遗忘,而毕希纳之流和杜林之流(以及莱克列尔、马赫、阿芬那留斯等等)一群雄鸡就是不能够从绝对唯心主义的粪堆中啄出这颗珍珠。”简言之:现存历史条件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研究方式的一个结果便是,“他们反对使唯物主义的初步真理庸俗化,甚于拥护这些真理”。同样,在他们的政治活动中,他们“反对使政治民主的基本要求庸俗化,也甚于拥护这些要求”。然而列宁论证说,在这方面,目前的历史条件是完全不同的。他和所有其他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现在都必须把拥护“哲学唯物主义的初步真理”而不是拥护基本的民主政治要求,反对他们的资产阶级阵营中的现代对手及其在无产阶级的阵营自身内部的代理人当作第一位的优先任务。必须审慎地把这些真理同17和18世纪革命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联系起来,广泛地传播到俄国、亚洲和全世界的千百万农民和其他落后群众当中去^②。

显然,列宁起初并不关心他提出的唯物主义哲学是否正确这

哲学舞台上”的那个时期(《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248页),尽管很明显,他提到了他们19世纪50年代以后的立场。对于判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同主张来说,比这种按时间顺序的划分更重要的划分是按照他们讲话的对象来划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对这后一种划分做了具体的讨论。

② 关于列宁的唯物主义宣传的这个肯定性方面,尤其见列宁在1922年3月发表于俄国杂志《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3期的文章。德译文见《共产国际》杂志第21号,后来又重新发表于1925年3月德文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年刊1,第1卷。这篇文章对于正确评价列宁的唯物主义的真正历史意义尤有帮助。(《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603—612页,《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个理论问题。他关心的是这种唯物主义哲学应用于无产阶级或者——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应用于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实践问题。因而，列宁的“哲学”立场就表现为一种特定的立场，虽然这立场是经过伪装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一版已经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对这个立场进行了讨论。当马克思年轻时写下“德国的实践派要求(在实践上)否定哲学而没有(在理论上)实现它”的时候，他曾强烈地批判过这一立场。列宁只是根据非哲学的考虑和结果来决定哲学问题。他并不是根据这些哲学问题的理论内容和哲学内容来判断它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他犯了马克思所说“德国的实践派”所犯的那样的错误。后者相信，它正在实现“否定全部哲学”的正义目标(在列宁那里则是否定全部唯心主义哲学)，因为它只要“扭过头去，背朝着它，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②⑥}

讨论列宁关于哲学和意识形态的主张，必定要提出一个初步的问题，必须根据这个问题来判断列宁特定的“唯物主义哲学”。根据列宁本人制定的原则，这个问题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列宁论证说，整个思想气候发生了变化，这使得在研究辩证唯物主义时必须强调唯物主义以反对资产阶级哲学的某些流行倾向，而不是强调

^{②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7页。这里不能更详细地说明列宁反对唯心主义的论证为什么属于马克思在这里所批评的这种情况。我们只引用一个论点来说明这一点。列宁求助于在主观“反映”存在以前地球在白热状态来“反驳”关于经验中的主客体关系的先验主义哲学理论。列宁在他的著作中特别是涉及这个问题的地方，用各种形式一次又一次地采用这种相当离奇的哲学论证(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70页以下“在人类出现以前自然界是否存在?”)。然而，不仅列宁使用这种论证，而且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前辈普列汉诺夫也这样做。普列汉诺夫不是求助于“白热的地球”，而是谈论与“关于鱼龙的主观范畴”一起开始的“第二纪”。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第二部分反对“康德不可知论的自在之物”而提出的著名的“茜素论证”的片面解释也属于这样一种论证。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78、84页，列宁引用的普列汉诺夫和恩格斯的话。

辩证法以反对资产阶级科学的庸俗的、前辩证法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非辩证的和反辩证的唯物主义的方面。问题在于是否存在着这样一种变化。我在别的地方写过的文章表明，我认为实际上不存在这种情况。当代资产阶级哲学和科学有一些现象与此相矛盾。当然也有一些倾向确实是如此。然而，当代资产阶级哲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占统治地位的基本倾向与六七十年前是一样的。这种基本倾向不是由唯心主义世界观造成的，而是由带有自然科学色彩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造成的^②。列宁反对这种看法的主张与他关于“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有密切的意识形态关系。两者都在俄国特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在看来短期内实际上必须完成俄国革命的特定实践和理论的政治任务中，有其物质的基础。这意味着“列宁主义”学说在理论上不能适应当前这个时期国际阶级斗争的实际需要。因而，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它构成了这一理论的意识形态基础——不能成为适应今天需要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哲学。

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论特征也是和这种历史的和实际的情况相照应的。像他的哲学导师普列汉诺夫以及普列汉诺夫的另一哲学学生L·阿克雪里罗得—奥尔托多克斯一样，列宁很严肃地想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保留黑格尔的哲学。他因

② 参见我在《同考茨基的争论》（第29页以下）和格律恩堡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库》第14卷，第205页以下所作的更详细的分析。应当补充的是：当列宁继续声称早期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已经变成了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时候，他求助于恩格斯1895年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所写的导言。然而，这篇杰出的文章（它发表于德国的《新时代》XI, I，现在又在恩格斯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新版本上重新发表，柏林和维也纳，1927年）并不认为新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是革命工人运动所面临的主要理论危险。恩格斯相当直率地把资产阶级的这种理论称作“可怜的唯物主义”，他无情地嘲弄那种把资产阶级归入这种唯心主义壁垒的企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379页以下，特别是第382—383页及该页注①。）

此轻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革命发展开始时发现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按其本性不可避免是“哲学的”，但它却表示了对哲学的完全否定；它在哲学领域留下了一项唯一的革命任务，即通过进行更高水平的详细阐释来发展这种世界观。列宁把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仅仅看作这样一种转变：由不再是“唯心主义的”而是“唯物主义的”新的哲学世界观取代植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他看来并没有意识到，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这种“唯物主义的颠倒”至多只涉及到一种术语上的变化，用所谓“物质”的绝对存在取代所谓“精神”的绝对存在。然而，列宁的唯物主义甚至有一个更严重的缺点。因为他不仅取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的颠倒；而且他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全部争论拖回到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已经超越了的历史阶段。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形而上学体系的瓦解开始于康德的先验论哲学，结束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此后，“绝对”被明确地排斥在“精神”和“物质”的存在之外，并变成了“观念”的辩证的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只不过在于把这种辩证法从它的最后的神秘外壳中解放出来。在“观念”辩证的“自我运动”下面发现了历史的现实的运动，并把这一历史的革命运动宣布为唯一“绝对的”存在^②。然而，列宁回到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绝对对立，而这种对

^② 参见1873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那段著名的话，亦见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开头那段对他认为是黑格尔哲学中“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顶峰”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的正确评价：“这种看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如果不是列宁和像他一样的那些人又一次突然非常乏味地以一种全然无聊的方式谈到绝对的存在和绝对的真理的话，就没有必要强调，恩格斯的著作和我的书中“绝对”这个词只具有一种比喻的意义。

立曾经构成了划分 17 世纪和 18 世纪启蒙运动两大流派的那种哲学争论甚至某种宗教争论的基础^②。当然，黑格尔已经辩证地超越了这些流派。

这种唯物主义来源于一种绝对的和既定的形而上学的存在观；尽管它的全部声明都宣称自己不是形而上学，但它不再是完整意义的辩证法，更不用说辩证唯物主义了。列宁和他的追随者片面地把辩证法变成了客体、自然和历史，他们把认识仅仅描绘成主观意识对这种客观存在的被动的镜子式的反映。这样一来，他们既破坏了存在和意识的辩证的相互关系，而且作为一个必然的结果，又破坏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的相互关系。因此，他们竟会不自觉地赞美他们多次抨击的“康德主义”。还不止此，他们还放弃了历史存在的整体和所有在历史上流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首先提出来的，然后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了更明白易懂的详尽阐述。列宁和像他一样的那些人以一种倒退的形式通过把这个问题变成主体和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更狭义的认识论或“知识论的”问题

② 参见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 17 和 18 世纪启蒙哲学内部这两个流派的尽管是注定神秘化了的历史性批判（中文版见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下卷，第 109 页）：“一派的启蒙，把当初以之为出发点的、处于现实意识的彼岸、而存在于思维之中的那个无宾词的绝对，称之为绝对本质；——而另一派，则称之为物质。假如它们被区别成为自然和精神或上帝，那么自然，作为在自己本身中进行无意识的编织，就会缺少发挥展开的丰富生活，而精神或上帝，就会缺少对其自身进行区别的意识。两者，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完全是同一个概念；它们的区别并不在于事情本身，而纯粹只在于，两派思想形成的出发点不同，并且两派在思维运动中各自停留于自己的一个定点上原地不动。假如它们超出它们的定点，它们就会走到一起，并且认识到，那在一派看来据说是一种可恶的而在另一派看来是一种愚蠢的东西者，乃是同一个东西。”参见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就此所进行的唯物主义的批判。这个批判不是针对黑格尔把唯物主义和有神论说成是“同一基本原则的两个方面”，而是针对布鲁诺·鲍威尔从其中吸取的那种淡化了的实体。

而修正了它。这还不算，他们还把认识说成是一种根本协调的进化过程，一种趋向绝对真理的无限上升。他们对革命运动内部理论和实践的一般关系和特殊关系的论述完全抛弃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退回到发现真理的纯理论与把这些吃力发现的真理运用于现实的纯实践的完全抽象的对立。“理论和实践的真正统一是通过实际地改变现实，通过基于理论所发现的客观发展规律的革命运动而获得的”——这些是列宁哲学的解释者之一的話，他丝毫也没有违背他的老师的教诲。有了这些话，马克思的革命实践严整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就衰变为一种可与最典型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相比的二元论^{②0}。

这种从辩证法到唯物主义的着重点转移还有另外一个必然结果。它使唯物主义哲学无法促进经验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在辩证法中，方法和内容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在一个著名的段落中，马克思认为“当形式不是它的内容的形式时，形式就是毫无价值的”^{②1}。因而上述着重点转移的结果完全违反了辩证法尤其是唯物辩证法的精神，它使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同把这一方法运用于哲学和科学所获得的主观结果对立起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这已经成了很时髦的做法。然而，在这种过头的

^{②0} 参见马克思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A·德波林在他的《卢卡奇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的批判性文章中关于“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的论述（《工人参考》第640页）。这里不需要提供列宁赖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为非辩证概念的全部方式的专门例证，因为他的观点在他的哲学著作的每一页都有清楚的表述。需要提到的只是，列宁在将近400页的研究存在和意识的关系的著作中，从头至尾都始终以一种抽象的认识论的观点出发去论述这种关系。他从未在把认识摆到意识的其他社会—历史形式那样的层次上，从未把认识当作一种历史现象，当作在既定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82页）或者只当作“现存的阶级斗争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64页）来加以考察。

^{②1} 转见梅林的《遗作汇编》I，第319页。

言词背后,还有一种正确的深刻见解——即,辩证唯物主义首先由于其方法,影响了19世纪下半叶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经验研究的进步^②。

当革命运动及其实践在19世纪50年代暂时原地踏步的时候,在哲学的进展和实证科学的进展之间、在理论的进展和实践的进展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日益扩大的裂隙:这在《马克思

^② 这一点有时为列宁的哲学导师、俄国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所承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他是东西方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所承认的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哲学问题上唯一的权威。例如,在1913年出版的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德文版中,就有下面一段论述,在那里他从对唯物主义哲学的解释进而讨论辩证唯物主义及其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上的应用:“唯物史观首先[原文如此]具有一种方法论的意义。”列宁同普列汉诺夫的哲学关系是这样的:学生在盲目地接受老师的全部基本教诲之后,接着便继续毫不犹豫地利用它们得出逻辑的结论。后来,普列汉诺夫连同他的学生阿克雪里罗得一起,“在有点接近康德哲学的意义上”对他的哲学观点做了一次正统的“修正”。但是,把这种进展说成是政治上“转向社会沙文主义”的结果,不仅对布尔什维克而且对像施弗林这样的左派孟什维克来说都是历史的错误。在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译者)期间,布尔什维克和左派孟什维克都犯了“转向社会沙文主义”的错误。(见上述关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研究,第141页和注①⑦。)事实的真相是,在更早些时候,尤其是在普列汉诺夫所译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第一版(1902年)和第二版(1905年)时,普列汉诺夫比列宁远为接近某些现代自然科学家所主张的染上了康德主义色彩的认识论理论。关于这一点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注②中所引用的普列汉诺夫“符号论”的两本书(《列宁全集》俄文版第14卷,第378页;参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62页,亦见于237—244页)。这条注释的作者L·鲁达斯盲从地重复列宁早先出于策略性原因而采取的看法,把普列汉诺夫的第二本书的阐述说成是与第一本书的“错误”阐述相比还算“正确”的阐述。然而,对这两种系统阐述的科学比较表明,按“不可知论者”这个词的列宁主义的定义,普列汉诺夫在两个场合下都是“不可知论者”;在1903年,他宣称自在之物除了它们作用于我们以外,“没有别的形式”,1920年他把我们的感觉表征为“一种符号”,它不同于现象,但是它“完全正确地既再现现象自身,并且——最重要地——再现这些现象之间存在的联系”。后一本书超过前一本书的一个优点是,它“从未对它的哲学对手作出术语上的让步”,所以,这个新版本并非如此生硬地表示对植根于全部符号论中的认识论问题的完全曲解。我在《同考茨基的争论》第Ⅲ页以下更详细地讨论了这一点。

主义和哲学》中已经做了解释。结果是,在一个长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新的革命观主要是通过作为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而运用于经验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才得以生存和发展。就在这个时期,人们找到了各种说法,尤其是恩格斯的说法,正式宣布个别科学独立于“全部哲学”,宣称哲学被“从自然界和历史中驱逐”到留给它的唯一活动领域:“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实际上,这意味着恩格斯把所谓“哲学”从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一门科学归结为在其他科学之中的一门经验科学了^③。列宁后来的观点乍一看也许像恩格斯的观点,但它们实际上有天壤之别。恩格斯认为,唯物辩证法的决定性任务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④。列宁的做法正相反。对他来说,主要任务是坚持和拥护谁也没有严格地去质疑的唯物主义主张。恩格斯进而要求同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保持一致;他说,现代唯物主义不管应用于自然界还是应用于历史,“在两种情况下,……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然而,列宁却明显地对“哲学上的背叛”吹毛求疵,他不仅在政治上的朋友和敌人或哲学理论家们中间看到了这种“哲学上的背叛”,而且甚至在大多数有创造性的自然科学家们中间也看到了这种“哲学上的背叛”^⑤。

^③ 尤其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最后一部分,在那里恩格斯清楚地表述了他和马克思的观点:在自然界和历史领域“一切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亦见《反杜林论》引论中的一般叙述,在那里他指出,对于“本质上辩证的”现代唯物主义——它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来说,“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

^④ 《反杜林论》1885年第2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51页。

^⑤ 作为许多例子中的一个,见列宁专门就赫尔姆霍茨的《生理学光学手册》发表的“哲学”评论,其中列举了赫尔姆霍茨在他的著作同一页上的话,先是说“我

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成了过去、现在或将来评价个别科学发现的至高无上的评判权威^{③⑥}。这种唯物主义“哲学的”统治，覆盖了全部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以及文学、戏剧、造型艺术等等中的其他一切文化发展；列宁的追随者们又把这种统治推向荒谬的极端。这导致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专政，这一专政可以是革命的进步也可以是最黑暗的反动。在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口号

曾把感觉叫作外部现象的符号，并且我否认感觉和它们所代表的物之间有任何的相似之处”，然后又说“我们的概念和表象是我们所看见或我们所想象的对象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和我们的意识所发生的作用”。关于第一个陈述，列宁说：“这是不可知论！”关于第二个陈述，列宁说：“这是唯物主义！”他不了解，赫尔姆霍茨的这两个陈述是不矛盾的，因为“作用”并不需要与其原因有任何的相似之处。这位自然科学家的表述中的所谓“前后不一致”是由哲学批判所输入的；列宁所要的不是科学，而只是关于这一种或那一种形而上学主张的“始终如一”的声明。（《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238页。）

- ③⑥ 列宁在运用他的评判方法时，对19世纪下半叶高度抽象的、没有丝毫辩证法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抱着一种非批判的态度；这种唯物主义甚至没有被公开发表过。把列宁的著作中论“恩斯特·海克尔和恩斯特·马赫”那节的最后一部分（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53—363页）同德国左翼激进分子弗兰茨·梅林对海克尔的《宇宙之谜》的批判性评价（《新时代》XVIII, I, 第417页以下）作一比较，就能发现列宁这种非批判态度以及他对唯物主义的狭义的“哲学”应用同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在这方面的巨大区别的一个例证。列宁的著作采取了一种完全不适当的唯物主义立场，这一点被列宁自己引用的梅林的话鲜明地标示出来了（《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63页）：“海克尔的著作无论就其缺点或优点来讲，对于帮助澄清我们党内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和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两方面存在的多少有些混乱的观点，都是有价值的。”还有一段有同样效力的话：“谁要想亲身体会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无能为力，谁要想深刻地懂得，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必须在扩展为历史唯物主义后才能成为人类伟大解放斗争中的真正战无不胜的武器，那就请他读一读海克尔的这本书吧！”在这方面，人们可以把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对海克尔这位唯物主义科学家的有力批判同梅林和列宁用实证主义观点对他的看法做一个比较（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中文版，第152—156页）。同“享有盛名的哲学家马赫”（加了引号）比较起来，列宁相对地肯定著名的自然科学家海克尔（没有引号），肯定海克尔的“强有力的唯物主义”。（原文如此，据查《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56页上的这段话中，“享有盛名的哲学家马赫”也未加引号——中译者。）

下,这一专政在今天的俄国,不仅运用于执政党,而且运用于一般工人阶级的全部精神生活。现在,出现了把这一专政从俄国扩展到西方以及世界其他地方所有共产党的种种企图。然而这些企图恰恰表明,把这种意识形态的专政人为地扩展到苏联以外的国际区域受到了不可避免的限制,在那些地方它不再得到国家直接的强力支持。1924年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号召进行一场“反对唯心主义哲学、反对除辩证唯物主义之外的一切哲学的严厉斗争”,而四年后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其纲领却最终采取了更广泛的说法,提出开展反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各种表现”的斗争。它不再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描述为一种唯物主义哲学,而只说成是一种“以革命性地推翻现实为目的来理解现实的革命方法(1)”^⑦。

四

只是在最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俄国之外才提出了这些主张,而我上面提到的共产国际政策的变化可以表明这些主张正在被抛弃。然而,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更深刻的问题尚未解决。《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问题,连同意识形态与革命工人运动的实践之间的关系这个更广泛的问题一起,都必须重新进行讨论。这提出了一个与共产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关联的具体任务。对于第二国际“考茨基的”正统马

^⑦ 关于纲领的不同版本,见《国际通讯》(德国)1924年,第136号,第1796页;《国际通讯》俄文版1928年,第92号,第1750页;亦见于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五次和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纲领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英国共产党出版,第131页以下,以及《国际通讯》俄文版1928年,第59号,第1034页。

克思主义的特征,我们已经做了唯物主义的,亦即历史的、批判的、非教条的分析。现在必须毫不迟疑地把这种分析进一步扩展到第三国际的“列宁主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必须把这种分析运用于俄国马克思主义及其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全部历史。因为今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过是这一历史的最后一个分支。在这里不可能提供更具体的阐述。对于俄国和其他地方的马克思主义的真实历史所作的唯物主义说明,我们只能简略地勾画一个十分笼统的轮廓。虽然如此,也还是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可能比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更“正统”——究其全部历史,具有一种甚至更意识形态的特征;它同它作为意识形态所从属的那个具体的历史运动,可能会发生甚至更大的冲突。

1908年托洛茨基富有洞察力的批判性分析表明,这符合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第一阶段。俄国知识分子早先在巴枯宁主义的“简单抛弃资本主义文化的风气”中受到培养,马克思主义则被当成意识形态的工具来使用,以使他们安于资本主义的发展^⑧。这对于第二阶段也是正确的,这个阶段在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达到其顶点。当时,俄国所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仅是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宣布自己是国际社会主义的“血肉”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这就意味着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且,卡尔·考茨基和他的《新时代》在所有理论问题上都完全赞同正统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诚然,就其理论所涉及的哲学基础来说,德国正统马克思主义受到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比它受自身的影响更多

^⑧ 见托洛茨基关于《新时代》25周年纪念的文章,《新时代》XXVI,I,第7页以下。在施弗林《论俄国经济学中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的起源》(《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文库》第55卷,第720页以下)和编辑库尔特·曼德尔鲍姆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尼古拉的信》德文版所写的著名序言(莱比锡,1929年)第V—XXXIV页中可以找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俄国现实运动在两者早期和随后的发展阶段中相互矛盾的进展的更为引人注目的证据。

些,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德国人是受俄国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支配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的这样大的一条国际统一战线能够不费力气地支撑自身,因为在历史上,它认为唯一必要的是存在于意识形态的领域,并且只作为意识形态而存在。这在西方和俄国都是真切的,在俄国甚至比在中欧和西欧更真切。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处于它的第三阶段,它仍然表现出同样的意识形态特征,同样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自嘲的“正统”理论和运动的真实历史特征之间的矛盾。它在列宁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他的完全非正统的实践中找到了它的最鲜明的表现^②,现在,在当代“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中,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突出矛盾则给它以讽刺。

俄国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一般特征没有根本改变,一直延续到今天“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当中。前面提到的施弗林——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政治上的对手——关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哲学原理的主张,无意中对此提供了证据。在《社会》(IV, 7)的一篇文章中,他看上去好像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但从哲学的观点来看,这实际上掩盖了他对它的维护。他宣称,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想做出一种真诚的尝试,以最始终如一和正统的形式加强马克思主义”,反对堕落的“主观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倾向(即“忽略导师的最重要的论述”),这说明它正面临着不可克服的困难。施弗林的这种偏见在他于1929年8月在《社会》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更为明显。在这篇文章中,施弗林讨论了德国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代表卡尔·考茨基的最新著作。虽然他对考茨基个人的大部分观点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但他还是热烈欢迎考茨基的书,将其称为“真正复活马克思主义”的开端。他赋予考茨基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使命”,即克服最近在西方以及在“苏维埃化了

^② 参见上面提到的我的文章《列宁和共产国际》注⑮。

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蜕变”，克服整个马克思主义所遇到的“意识形态的危机”^④。迄今为止，这篇文章是整个正统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哲学一致性的特别明显的证据。在他对当代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的批评中，在他对待当代“考茨基主义”的态度中，施弗林完全看不到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形式都来自早期俄国和国际马克思主义。如今，它们只代表在工人运动先前阶段就存在的暂时的历史形式。在这个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特征的评价中，可以看到在当代正统马克思主义旧的和新的流派——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世界观的完全而根本的统一。也可以看出共产主义理论家们是怎样通过维护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积极的进步的特征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现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期刊上，可以看到一位孟什维克理论家列入了为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普遍有效”和“使人非信不可”的哲学特征辩护的名单。

现在可以结束我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问题——一个从1923年起就以许多方式被新的理论发展和实际发展所改变了的问题——的现状的说明。既然我的进展的一般轮廓是足够清晰的，因而我拒绝根据现在的观点修改当时所说的一切细节。只有一点必须作为例外。《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曾经论证说，在社会革命期间，“专政”不仅在政治领域是必要的，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是必要的。这造成了许多误解，特别是在考茨基那里。在他对我的书的评价中，他既曲解了我的观点，又对俄国的主要状况抱有某种幻想。这样，直到1924年，他还说“任何人，甚至连季诺维也夫和捷尔任斯基都没有想到过”“观念领域的专政”。我现在认为，在我的书

^④ 《施弗林选集》第149页以下。

中对这一主张的抽象阐述确实容易使人误解,我必须强调,《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所谓“意识形态专政”所追求的革命斗争在三个方面不同于今日俄国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建立起来的精神压迫体系。首先,它是一种无产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的专政。其次,它是一种阶级专政,而不是一个党或党的领袖的专政。第三,最重要的是,作为一种革命的专政,它不过是通过镇压阶级和抑制阶级矛盾来为“国家的消亡”、因而为结束所有意识形态束缚创造先决条件的社会变革过程的一个环节。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专政”的根本目的是要消除意识形态自身的物质的和观念的原因,从而使它自身既没必要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从第一天起,这种真正无产阶级的专政就不仅为“所有的”工人、而且为“每一个别的”工人创造思想自由的条件,从而与对这一专政各种各样的虚假模仿相区别。尽管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有所谓的“民主”和“思想自由”,但肉体和精神上受压迫的雇佣劳动者还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享受到这种自由。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具体规定。随着这个专政一起,对“意识形态专政”的需求与共产主义方法和世界观本质上批判的和革命的性质之间明显的矛盾将会消失。社会主义,无论从其目的还是从其手段上说,都是一场实现自由的斗争。

《哥达纲领批判》导言

1922年

一、有关哥达纲领的信件的历史背景

继1847年—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和1857年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作的“总导言”之后，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全部较短著作中最完整、最透彻、最有说服力地表述了他的经济和社会理论的基础和结论的著作^①。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如同前两部著作一样，《哥达纲领批判》并不在导师最容易理解的著作之列。这方面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就是，它不是作为一个统一的表述而写的，而是由松散地堆集在一起的、对一个缺少严格逻辑结构的纲领

^① 马克思在通过这个纲领草案的哥达会议举行之前就写出了对纲领草案的批判。它是写给他的德国朋友（白拉克、盖布、奥艾尔、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的，直到1891年才公开发表，当时应恩格斯的请求，作为围绕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所举行的讨论的一个发言而在《新时代》上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1—4页。《哥达纲领批判》全文见该书第5页以下。

草案个别段落的“旁注”^②组成的。如果读者具备充分掌握这部著作丰富而深刻的内容的能力,他要理解那些特殊部分的内容,也必须预先知道某些事情。他必须知道一些历史事实及其一般背景,也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体系内部某些概念的理论意义。此外,也要了解马克思1875年最初写信给他们的那些人会想些什么。他们完全不理解马克思的批判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因此他们不能据之对纲领草案施以任何根本的改动。结果,纲领的最后一稿于同月,1875年5月在哥达党代会上获得通过,对马克思所批判的草案修改如此之小,以至于他的批判根本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收到马克思这封信的那些人甚至不理解他提出的较次要的观点。例如,对于“调整监狱劳动”这一条,尽管马克思在他的著作结尾批评说:“在一个一般的工人纲领里面,这是一种微不足道的要求”。他们还是没有把它改掉。他们甚至没有按照马克思建议的方式来稍加改进。毕竟,正如马克思公正地指出的那样,这是“应当期望于社会主义者的最低限度的东西”。这一要求作为统一的德国工人阶级的“八点”直接要求之一保留在纲领里面,就好像一个新建的革命政党号召“废除养犬税”一样。马克思的信件在德国马克思主义几乎最好的代表中也没有被真正理解,要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只需读一读奥古斯特·倍倍尔在他的回忆录^③中对围绕哥达纲领发生的事件的长篇说明就行了。倍倍尔自己满意的结论是:“人们可以看到,同在伦敦的两位老人[指马克思和恩格斯——柯尔施注]取得一致是不容易的事情。对我们的党来说是明智的算计和机敏的策略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是软弱和不负责任的自满。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实现了:联合。这在逻辑上本身就包含着它本身的进一

② 最初的德文标题是《德国工人党纲领的旁注》。——英译者注

③ 奥古斯特·倍倍尔,《我的一生》(伦敦,1912年)第287页。

步发展。在这之前和之后，我们的那些朋友和我们的敌人，都证明了这一点。”关于这位年迈的党的领导人的这些令人鼓舞的反思，唯一正确的东西是最后的结论；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从前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正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尽力去弥补社会主义的朋友们缺乏原则所造成的空档。最终，这种历史的补偿甚至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某种程度上同意了那个“杂乱无章的、毫无联系的、不合逻辑的和丢丑的纲领”。这一点在恩格斯于1875年10月12日以他和马克思的名义写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最后一封“关于纲领的信件”中有清楚的表述^④。在这封信中，恩格斯一开始就重申他和马克思曾经表达过的理论谴责。“要是资产阶级新闻界中有一个有批判头脑的人”能够指出这个纲领所包含的“矛盾和经济学上的错误”的话，这个纲领无疑会使党显得“非常可笑”。恩格斯继续说：“资产阶级新闻界的蠢驴们没有这样做，反而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个纲领，领会出其中所没有的东西，并做了共产主义的解释。工人们似乎也是这样做的。仅仅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我才没有公开声明不同意这个纲领。当我们的敌人和工人都把我们的见解掺到这个纲领中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对这个纲领保持沉默。”

马克思对哥达纲领草案的批判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成了对哥达大会通过的纲领的批判。因此，为理解马克思的注解而想对马克思的批判对象有一般了解的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这个纲领的最后通过的本子，也可以通过阅读马克思本人所批判的纲领的初步草案而达到目的。两个本子恰恰具有实质性相同的内容，凡是涉及到草案上原话的地方，马克思本人在《批判》中都引用了这些话。

^④ 恩格斯1875年3月18日—28日给倍倍尔写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26—33页）比马克思两个月后所写的《批判》更容易理解地表达了两位“老人”对纲领草案的最重要的批判性意见。

二、工人运动的复兴：1849年—1875年

19世纪60年代，在1848—1849年间工人解放运动遭到血腥镇压并暂时平息下来以后很久，终于有了“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高涨”的迹象。其结果，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卡尔·马克思是一位最主要的参加者，这个协会一直存在到1874年—1876年。在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成立所准备的《宣言》中，既简洁又丰富地描绘了1848年与第一国际成立之间这个“革命之后”的时期的一般特征。

“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大陆上工人阶级所有的党组织和党的机关报刊都被暴力的铁腕所摧毁，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子弟在绝望中逃亡到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去，短促的解放梦已随着工业狂热发展、道德败坏和政治反动的时代的到来而破灭了。大陆上的工人阶级的失败，部分是由无论当时或现在都和圣彼得堡的内阁结成兄弟同盟的英国政府的外交所促成，这一失败很快也把自己的传染作用扩展到了海峡的这一边。大陆上的阶级弟兄的失败，把英国工人阶级弄得垂头丧气，挫伤了它对自己事业的信心，同时却使土地巨头和金融巨头恢复了他们已经多少动摇了的自信。他们蛮横地收回了已经宣布过的让步。新的金矿产地的发现，引起了大量的向外移民，结果在不列颠无产阶级队伍中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缺陷。工人阶级中另一部分先前积极的分子，受了暂时增加工作和工资的诱惑而变成了‘政治工贼’。维持或革新宪章运动的一切尝试都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工人阶级的机关报刊由于群众的漠不关心而相继停刊；的确，英国工人阶级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苟安于政治上的毫无作为。如果说过去在英国工人阶级和大陆

上的工人阶级之间没有过行动上的一致，那么现在至少是有失败上的一致了。”*

在这一失败的时期之后，当又一次升起最初的希望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急切地抓住这最初的机会，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内部又一次更大规模地“从事意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工作”。然而，他们很清楚，在这个阶段还不可能使用1847年—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使用过的“旧的大胆的语言”。他们的任务是，在原则问题上要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实质性的，而不是妥协的立场，但又要使它广泛而又谨慎地具有政治上的有效性，同时不排除任何抱有同情心的合作者。根据这个想法，马克思撰写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这个章程后来只经过极小的修改便在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⑤。读者将看到，除了马克思在客观需要的压力下，只是勉强增加的空洞的最后部分之外，这个原则宣言本质上像文字上更昂扬激烈的《共产党宣言》一样精确地表述了基本的观点和共产主义的结论。

至于从1864年到1874年这十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欧洲的工人群众更善于“了解工人解放的真实条件”。恩格斯在1890年为《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中对这一时期的意义作了如下描述：

“当欧洲工人阶级又强大到足以重新对统治阶级政权发动进攻的时候，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它的目的是要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因此，它不能从《宣言》中所述的那些原则出发。它应该有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拒之门外的纲领。这样一个纲领即国际章程绪论部分，是马克思起草的，其行文之巧妙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31页。——中译者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36—139页。

是连巴枯宁和无政府派也不能不承认的。至于说到《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的最终胜利，马克思在这里是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要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的发展。反资本主义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而且失败比胜利更甚，——不能不使进行斗争的人们明白自己一向所崇奉的那些万应灵丹毫不中用，并使他们的头脑更善于透彻了解工人解放的真实条件。马克思是正确的。1874年，当国际解散的时候，工人阶级已经全然不是1864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罗曼语各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特有的拉萨尔主义已经奄奄一息，甚至当时极端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展，以至它们1887年举行的斯温西代表大会的主席能够用它们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而在1887年，大陆社会主义已经差不多完全是《宣言》中所宣布的那个理论了。”^⑥

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对于发达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来说，那时比十年前更可能通过发表一个“原则性纲领”，而回到1847年—1848年《宣言》的那种“旧的大胆”。总之，他们认为运动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任何放弃1864年所讲的话的作法都一定表现为一种对工人运动的未来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过。这样，马克思本人就在附于他的《哥达纲领批判》的信件^⑦中讲到：在条件不允许时，不需要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而当条件从1864年以来有这么大的进展的时候，如果由于一个肤浅的无原则的纲领而使党“堕落”，那也是完全不允许的。

这说明了马克思写作《哥达纲领批判》时的某些先入之见。他要求最进步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性纲领”最低限度也要达到他本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43页。

^⑦ 《给白拉克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3页。

人在十年前制定的另外一个原则性纲领中的主要具体要求的同一水平。而后者是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起草、并作为欧美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派别的共同纲领而设计的。哥达纲领在任何地方都不符合这种最低限度的条件，马克思认为，它堕落到了运动已经达到的水平线之下。因此，即使它表现出适应德国党的状况，它也一定会危害未来运动的历史发展。

三、马克思和拉萨尔

通过考察马克思和拉萨尔这两个世界历史人物之间在历史上和思想上的关系与冲突，人们可以对《批判》的基本观点有更深刻的理解。读者必须学会通过了解在拉萨尔和马克思之间，即在已经发展了的、哲学上是唯心主义的德国社会主义和更大规模上还处于发展的最初过程的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大争论，来看马克思的信件。哥达合并大会的客观环境是一个外部原因，使马克思认为在这时有必要进行这样一场争论。我们知道，在哥达大会上，从前的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和以前的爱森纳赫派（社会民主工党）合并成了统一的社会民主工党。直到那时，由于历史的和某种程度上个人的偶然的因素，——人们可以在梅林所写的马克思传或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中看到这些因素——爱森纳赫派看来是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尽管如此，相当令人吃惊的是，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偏袒地把统一的德国纲领中所有的缺点和错误都归罪于“拉萨尔派”。如果人们回忆起他对由他组建并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完全背离共产主义原则的许多条款的宽大和容忍，这种情况就尤其令人吃惊。何况，拉萨尔已经死了十多年。甚

至国际工人协会1864年成立时他已不在人世。此外,梅林保持中立的说明特别清楚地披露,有证据表明,无论是从理论著作来看,还是根据在许多问题上的实际主张判断,拉萨尔主义者与爱森纳赫分子相比在许多方面都是更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些原则性的阐述上,1869年的爱森纳赫纲领在形式上是沿循国际的章程的,但在其他一些阐述上它像哥达纲领一样遵循了“拉萨尔的”原则。看来马克思对纲领草案中拉萨尔主义腐朽堕落的影响的批判走得太远了。要充分理解这里面的真实意义和理论合理性及历史合理性,就必须更深入一步了解马克思是一位思想家和政治家,他高度意识到他的历史责任,他是在“为人类而工作”。在处置纲领草案时,他不是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森纳赫派”,去反对“拉萨尔派”。相反,他试图反对并摧毁拉萨尔的精神,这种精神无论在爱森纳赫派还是拉萨尔派中都比马克思主义精神有大得多的影响。卡尔·马克思这封信的很大一部分是用来反对“活生生的拉萨尔”的。他试图追溯性地和决定性地摧毁拉萨尔的社会观,这种社会观是建立在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以及“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的。他的目的是从理论和实践上,用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来取代它。这就是30多年来他一直为之奋斗和工作而又很少为人所真正理解的世界观。可以说从1843年(当时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表述了他的决定性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以来,马克思的全部著作和活动就基本上致力于这个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发展,致力于反对资产阶级营垒内外不断增长的对手的实践。今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这场斗争在今天像在50年或80年前一样必不可少。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德国人数最多的社会主义派别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1921年9月23日通过的新的格尔利茨纲领中,恰恰正式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它的旗帜上又一次写上了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试图消灭的拉萨

尔口号。当然，它们重复的一切，只是拉萨尔的词句，因为1921年时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待拉萨尔的精神也像对待马克思的精神一样地苛薄。在拉萨尔1862年论目前历史时期同工人阶级的观念的特殊关系的美妙演讲（它被称为“工人的纲领”）中，有许多论述与1921年的格尔利茨纲领相冲突。在这些论述中，他清楚地说，“从1848年春天开始的这个历史时期不会产生一个体现或维护第三等级政治统治的国家，无论是君主制的还是共和制的。”尽管如此，格尔利茨纲领的拥护者还是提到了拉萨尔，这仍具有一定的意义。假如我们说这是1862年，不是1923年，我们可以把这个“工人党”的纲领看作是拉萨尔学说的产物。它同样把解放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描绘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性”，一种“道德的要求”；它宣称它的目的是为“把公众的意志组织在一个”支配经济和社会的“自由的人民国家里”而斗争。这样的纲领只能被恰当地称之为拉萨尔的纲领，尽管可以“私下”说它有某种很不相同的东西。因为拉萨尔就“普选权”以及有关问题曾经写过和说过的一切，都由于他有一次以真正的资产阶级方式对一个封闭圈子里的密友们所说的话而有了完全不同的解释。“无论什么时候我说到‘普选权’，你们都必须把我的意思理解为‘革命’，只是‘革命’。”无论这可能多么地真确，但不幸的是我们没有“活的拉萨尔”去同“死去的”布劳恩、库诺、卡姆迈耶尔和他们的同道对证。拉萨尔1862年的革命口号已经被无耻地用来证明和修饰一个完全不革命和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和毫无希望的乌托邦改革纲领。拉萨尔只残存于铅印的文字上和文件里，但他无法反对这些歪曲，在反对歪曲者这一点上，他远比不上另一位残存于同样的形式中的更强有力的对手：卡尔·马克思。

四、唯物主义历史观和 意识形态的历史观

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全部批判的核心目标是拉萨尔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彻头彻尾意识形态的国家观和社会观。尽管如此,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当时仍坚持这种国家观和社会观,哥达纲领草案中也清楚地表述了这种国家观和社会观。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来说,这是命运攸关的时期。迄今为止举世瞩目的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党都在那时产生。对马克思来说,又一次有必要——像他一直做的那样,明确有力地——反对一个纲领草案的机会主义,这个纲领草案包含了在科学上早已过时,只是现在又热起来的拉萨尔社会主义所特有的意识形态的错误。在这样做的时候,马克思不得不在下面这段意味深长的话中证实他在过去几十年总结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严格的有效性和丰富成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④与马克思的这种唯物主义的和经济学的观点完全相反,哥达纲领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接受了拉萨尔的完全意识形态的主张,据此要求劳动所得按照“平等的权利”的观念归属于社会的一切成员。根据这个玄虚的原则,纲领在第二部分继续始终如一地要求有一个“自由国家”,在这个国家中,“一切社会的和政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82页。

治的不平等”都被克服和消灭,办法是提出唯一的一个社会经济要求——“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草案(以及纲领的正式文本)对此增加了整整七项纯粹政治的和资产阶级民主的要求。恩格斯认为,这七项要求的每一项都是“逐字逐句同人民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纲领相符合的”^⑨“国际主义”的一个例子,是对“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般的联合”(在最后文本中改变为“人类兄弟般的联合”)这个观点抽象的、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的表白。

卡尔·马克思毕生致力于把一种理论上是意识形态、实践上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一种现实的和本质上是科学和实践的社会主义。像哥达纲领这样的纲领使他深深地感到失望和沮丧,这是不奇怪的。正因为这一点,关于这个纲领的整个信件成了一篇措词强烈的起诉书,直截了当地指责它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唯物主义的。纲领草案是拉萨尔主义的——即,是意识形态的和空想的。即使人们能够并且愿意无视这一点,这个纲领本身也是“毫无价值的”。因而马克思认为,“决不以一种外交上的沉默来接受”这样一个理论上和实践上无原则的纲领,这是他的“责任”。他以最大的彻底性“评论”它,“批判”它。

五、辩证法

马克思实施他批判这个纲领的决心的形式,在他的思想形成中,是极富启发性的。它特别清楚地表明“唯物主义”方法的巨大优越性。马克思也把这种方法运用于理论观点的生产,并且它经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27页。

常被称作“辩证的”方法——一种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拥有的系统阐述方式^⑩。根据马克思基本的唯物主义观点，精神生产像任何其他生产一样，需要把一定的具体的原材料转化为思想。单靠产生“一般的”抽象思想的思维是毫无结果的。甚至在思维中，生产一件真正“有形的”精神产品的唯一途径，也要把思维力运用于可以为这种思维力所影响的思维材料。这意味着，马克思并不是通过一般地揭露哥达纲领的错误、揭露显然藏在其全部意见和要求背后的肤浅的一般原则，然后简单地把它同马克思自己的更正确更深刻的唯物主义原则对立起来，来对哥达纲领进行批判。相反，他极其详尽地对纲领的每一个段落都进行了批判。这是一项高度熟练的精神生产的工作。他的个别主张乍一看有时像是任意或过于琐细无益的分析；但更仔细地考察就会发现，这些主张总被证明是整个论证过程中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环节。马克思从草案中抽出初看起来完全无害的段落，从中提取出根本模糊的思想，缺乏自信心的优柔寡断的东西，其中包含的冗长而无价值的东西和毫无意义的东西。这就最鲜明地，然而间接地，揭示出所有这些段落背后那个基本原则的完全虚假性。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同拉萨尔的意识形态历史观之间的根本冲突，在信里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泛泛叙述，尽管这种冲突从一开始就支配了信中的全部论述。这种冲突像一条红线贯穿于全部具体的“旁注”之中，并把这些旁注连结成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对于那些熟知这种冲突的人来说，这在纲领的字里行间是显而易见的。卡尔·马克思是一位建设性的辩证法家和革命家，他的思想的杰出特征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他的《批判》中：他从来不允许他的批判局限于在他的信件中仅仅否定错误并且作一些表面性的分析。他总是继续扩展或

^⑩ 这一点在我即将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英译者注：即《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作了更详细的讨论。

者简要地指出积极·的·正·确·的·概·念·，用以取代他所批判的错误的和虚幻的东西。他不满足于批判和反驳源于错误肤浅的原则的那个纲领的各个部分。这种反驳总是积极发展了从他在相应的地方提出的更深刻更正确的唯物主义主张中得出的结论。通过这种积极的发展，批判的过程才以一种“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家”感到满意的形式结束。

六、从马克思到列宁

当然，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来说，这些积极的发展是《批判》的最重要最富于实际意义的部分。因为《批判》不止包含了极其简明地集中在一起的一系列发现和令人十分感兴趣的、而且在其他地方也同样有效的理论准则。我们还发现，马克思在这里运用他的基本的唯物主义原则去解决一系列主要的社会问题，关于这些问题，他在其他地方还从来没有如此透彻、如此长篇大论地谈到过。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在这里从根本上阐明了与拉萨尔的法权观和国家观相对立的，现代的和未来的“社会”同（现代的和未来的）“国家”之间的真正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无需指出，哥达纲领如今在这方面是何等重要。读者可以以纯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本论述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理论和实践的经典著作的第五章，发现对《哥达纲领批判》全部有关章节的批判性评价和详尽阐述。在高度集中的20页里，列宁讨论了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有关问题，民主和专政的不同形式，以及通过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逐渐形成而对旧的民主和专政的抛弃。这个共产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来的，并且在一个长时期内将受到后者的传统和形式的制

约,它的“自由的发展”也将受到资产阶级社会的传统和形式的阻碍。列宁在这方面所说的一切都相当明确地显示出对马克思1875年在关于哥达纲领的信件中就这些问题第一次展开的基本见解的连贯发展。马克思在他影响力最大的时候,写下了与拉萨尔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识形态的和乌托邦的国家观尖锐对立的著作,而那种国家观到今天在欧美工人运动中已经占居了统治地位。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实际政治活动只不过是用的方法继续他的科学理论工作和宣传活动^①。这样,在一定的意义上,1917年以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个伟大的世界历史事件就只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的唯物主义原则在现实实践中的一种继续。它是马克思在他的全部著作——但最决定性地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为之战斗和工作的这个原则在理论上的实现。

七、信件的结构

与所批判的纲领草案几个部分相一致(这个草案与最后文本只在一个新的细节上有所不同),马克思的批判也分为四部分,或者,如果人们把关于“自由国家”观的第四部分的最初论述当作一个独立部分的话,那就是五个部分^②。第四部分的B节由草案的直接的政治要求和文化要求所组成。马克思对这些要求的批判是极其清楚和彻底的;因为读者可以立刻理解这一点,所以无需在这里详加阐述。要进一步研究对社会民主党纲领的马克思主义—共产

① 要着重地理解这一点,应该读一下列宁1917年11月30日在彼得格勒为《国家与革命》所写的著名的12行跋,这个跋以这样的句子作为结束:“做出‘革命的经验’总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参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276页。)

② 这里列举的数字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19—25页。

主义的批判的这个部分,就应该首先研究恩格斯“1891年关于社会民主党纲领(爱尔福特纲领)”的信件,在一定意义上,这封信继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对哥达纲领草案的批判^⑬。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921年的格尔利茨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会说些什么,可以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研究恩格斯的这封信则可以给读者一些提示。想获得更精确的指南的人,可以去阅读罗莎·卢森堡、列宁、托洛茨基和拉狄克的有关著作。

相对于所有其他部分而言,这封信(即《哥达纲领批判》——中译者)最基本的部分,是内容最丰富的第一部分。第1条和第2条,以及简短的第二部分,高度集中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第3条和第三部分为第四部分关于现在和未来社会和国家的的重要论述做好了准备。在我们这个时代,列宁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发展了这些观点。最后,第4条和第5条,其中有一些今天看来尤其肯的很重要的论述,它们论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的历史关系;论述了工人运动必然具有的国际内容,尤其是论述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职责。这些就构成对《共产党宣言》中的观点的一个发展。

《批判》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为阐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命题做出了虽然简明但很重要的贡献,在本篇短文中自然不可能也不必要再一次讨论它们。读者阅读这些部分时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参考我最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在那里,读者会发现极为简短而精确地表述出来的37个问题及其答案,它们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全部基本概念和理论,也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的最基本的命题。这样做了之后,他就可以理解《批判》中那些由于缺少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及其在整个马克

^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490——492页。

思主义经济学说和社会学说中的地位某些知识而难以理解的部分。直到今天,甚至马克思的虔诚信徒还灾难性地误解这些部分。

八、两个难题：铁的工资规律和 依靠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

在《批判》中容易被误解的全部难题中,只有两个需要作进一步的讨论,因为我认为它们对于初学者来说是最困难的两个问题。这就是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论述的所谓“铁的工资规律”和“依靠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正是在这几点上,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强有力的批判时常遭到很大的误解,存在着一种只在其中看到马克思对待拉萨尔特别带有个人仇恨的“过分的”表述的倾向。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时在抨击拉萨尔时带有个人怨恨的语气,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是他们的表述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具体的必然性的结果。因为正是在这些地方,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和要求与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的拉萨尔主义的阐述和要求表面上是如此密切,而内在的矛盾又是如此巨大。要维护和发展马克思最终达到的科学洞见,忽视这个矛盾是很危险的。

我们先研究工资规律。首先,我们先来看马克思在他的信中批判地谈到的这样一个观点:“‘劳动所得’是拉萨尔为了代替明确的经济概念而提出的一个模糊的(即不确切的——柯尔施)概念”。马克思这里谈到的“明确的经济概念”显然是指他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的那些概念,特别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来说是基本的科学发现,但是,这项科学发现今天已被马克思的所有对手、甚至被他的某些追随者看作是“毫无意义的”。这项发现就是,工资并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

力的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劳动力作为商品在被资本家的企业
在生产上(作为劳动)使用之前在劳动市场上被出卖。我已在其他
地方，即在我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中解释了这些概念和用语
的理论基础。但是，在那里只在理论上讨论的这些观点，可以以
极其重要而实际的方式运用于《批判》本身之中。卡尔·马克思把
强调的重点放在他的剩余价值学说的这些关键方面，无情地抨击
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这个口号，这既不是毫无道理的，也不是
出于对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盲目的敌意。乍一看来，在马克思所
说的和拉萨尔所说的之间好像没有真正的矛盾。甚至《共产党宣
言》也的确表述过资本家花在工人身上的“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
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那种“价格”^⑭。这显然就
是指的由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最初表述，后来称
之为“铁的工资规律”的那种东西。因此，《哥达纲领批判》强有力
地抨击拉萨尔“铁的工资规律”的理由，就在于更深刻地理解资本
主义社会的整个结构，理解科学马克思主义从“剩余价值”这个关
键概念派生出来的历史发展规律。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劳
动的价值这个观点，并不是(像某些人理解的)只想使马克思主义
的经济学说和科学能够具有更清晰更简明的概念结构。相反，这
项发现包含了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阶级矛盾真正本质的核心。
它系统地说明了这些阶级矛盾产生以及它们不顾社会劳动生产
力的继续上升而发展和尖锐化的物质原因。它也说明了为什么生
产率的这种不断增长最终会在共产主义社会创造出完全消除阶级
矛盾的“物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对比之下，“铁的工资规律”
是部分建立在自然科学、部分建立在法哲学基础上的。它既不能
说明阶级矛盾的真正社会根源，也不能——除非在道德的和唯心主

^⑭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358页。

义的基础上——证明真正“废除”这一规律连同它强加给工人阶级的“祸害”的必然性。(这就是现在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所采纳的拉萨尔的教条为什么对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来说是这样一种危险的原因。)一旦了解了这种重要的关系，第二部分* 结尾所作的惊人比喻的极端重要性也就立刻成为可以理解的了。在那里马克思说，把工人解放运动置于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之上就好像把奴隶的解放置于奴隶制中固有的营养不良基础上一样。

同样复杂而且乍一看难以理解的动机，存在于马克思在第三部分对哥达纲领提出的一种社会经济要求——“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求——的猛烈而无情的抨击背后。如同对铁的工资规律的批判一样，在这里，马克思的猛烈抨击实际上不是反对建立生产合作社的号召，而只是反对这些生产合作社在拉萨尔体系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事实上，早在十年前，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的实际要求中实际上就包含了“建立生产协会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其他组织”的内容，在他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他高度赞扬合作运动以及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迄今为止“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的”最伟大的胜利。那时，他甚至断然要求，依靠“全国的财力”，使“合作劳动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在这里，表面上看来在马克思的主张和哥达纲领草案所提要求之间没有真正的冲突。然而事实上，马克思勃然大怒的这个例子鲜明地表现出在马克思的世界观和拉萨尔的世界观之间一种深刻的本质的区别。因为马克思太善于理解这个（归根结底由纲领的其他部分所充分说明的）方案了。19世纪60年代沿拉萨尔的路线（不管拉萨尔本人在最初提出这个要求时会有什么独到见

* 这里英文版用的是in Section III（第三部分）一词，据《哥达纲领批判》原文，显然是排印错误。这个比喻在《批判》的第二部分结尾，因此订正。——中译者

解)设想的关于合作社的计划,更多地依赖于国家的帮助而不是创造合作经济本身^⑮。它的真正目的是帮助生产者的联合体把“有限的资本主义国家”改变为“充满了自由的道德观念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在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相对于财产的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其他事物,它可以由生产合作来促进)的优越性中来寻找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的物质的先决条件。这是对国际工人协会原则性声明中主要原则的公然背叛,这个原则性声明指出,“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马克思在《批判》第三部分试图把“建立在国家贷款基础上的合作”这个关键概念作为一种向赤裸裸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错误的倒退来摧毁。(这种观点最近在许多德国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化”或“掌握真正价值”同样空洞的概念中找到它合适的继承者。)马克思重申了他反对这些认为“国家范围的生产合作社”这句话具有真正唯物主义的和革命的意义的人的错觉,他说:“如果工人们力求在社会的范围内,首先是在本民族的范围内建立集体生产的条件,这只是表明,他们在争取变革现在的生产条件,而这同靠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毫无共同之处。”

九、批判的核心

在这段话中,马克思仅就“依靠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问题

^⑮ 见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序言的脚注中的评论,在那里他谈到了拉萨尔派:“拉萨尔本人在和我们接触时总是自认为是马克思的‘学生’,而他作为马克思的‘学生’当然是站在《宣言》的立场上的。但是他的那些信徒却不是如此,他们始终没有超出他所主张的靠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求,并且把整个工人阶级划分为主张靠国家帮助的人和主张自我帮助的人。”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19页。——中译者

展示了他的直接唯物主义主张的含义。但其历史的意义并不限于此。相反,他的原则可以应用于工人解放斗争的最新成就,例如,可以应用于1918年—1920年的“社会化”,应用于1921年—1922年的“获得真正的价值”。因此,马克思确立的这个原则今天仍然可以用来作为区别在这些问题上所采取的不同主张的试金石。实际上,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它作为社会革命的主要策略问题,作为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一逐渐更加接近现实的漫长过渡时期的更伟大的实践任务,甚至是更重要的。这就是《批判》在今天最杰出的方面: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任何其他著作都更突出,它给了我们一把解决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可靠钥匙,工人阶级现在正就这些问题请教自己的导师。这同时又是它的历史发展的最困难和最敏锐的时期。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的伟大转变不再是只在想象中完成,而是在不容怀疑的生活现实中完成。甚至《共产党宣言》,这另一个除了纯粹经济学问题以外、在所有其他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主张最丰富的源泉,在这方面也有点不合适。其中列举了只在革命的最初时期要采取的著名的十点过渡措施,以及关于共产主义最终目标的很抽象的、哲学思辨的定义^⑩。除此之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73页:“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的自由概念的这个定义的确已经远远超出康德的绝对命令,但还只是对黑格尔的自由概念的简单颠倒,这个自由概念在黑格尔的下述相当复杂的一段话中作了最精确的阐述:“首先,出现的是不同于每个个体自由的、总体自由的一般概念的空洞抽象。另一方面,产生出同样完全孤立的个体自由。每一种为自身而呈现的自由都是一种非现实的抽象。但如果把这两者看作绝对的一,并且是根据这种内在的根本的一而产生的,那么它们就变成了与前面那些只有通过它们的非同一才有其意义的概念不相同的东西”(《自然法的科学探讨》拉松版第367页)。黑格尔把个体的自由同总体的自由联系起来,认为具有同等的价值。但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只根据总体的自由来承认个体的自由,通过总体的自由实现个体的自由。马克思则正好相反,他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仍未能用世俗的物质性的词汇来表述关于自由的这种抽象的和哲学的概念。

外，只是重申了在一切革命运动中共产主义者强调“所有权问题”是“根本的问题”（这自然也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对“所有权问题”的这种强调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把它看作财产分配的法律问题，可以在国家的形式之内通过一些变化加以解决，另一种是唯物主义地把它看作生产的社会问题，只能通过打碎社会的经济结构来解决。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恰当地通过对这两种解释的透彻阐述，表明了拉萨尔意识形态的国家社会主义同马克思自己的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完全对立。正如他不厌其烦地所说的那样，拉萨尔派没有把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的，而只是当作一种沉闷的中间状态。诚然，这种中间状态将克服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以及与之相关的财产分配上的“不平等”和“不公平”。但是在所有其他方面——经济、道德、精神方面——它还都带有今天这个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法律和资产阶级国家将不会像早被遗忘了的关于野蛮的史前史观念一样被全然抛弃。当然，马克思本人充分意识到这个事实：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废除，本身还不足以创造出能够依靠其内在规律“自由地”发展到难以想象的高度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确，他在关于哥达纲领的信中有意识地证明了这种“唯物主义的洞见”。因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创造的公共的社会经济制度将是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在那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它仍然要受资本主义社会固有规律的支配，这些规律同它的新特征是不相容的、正相反对的，它们限制和阻碍了它的自由发展。

对于“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

较高视角来看，拉萨尔的源于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社会主义——以及实际上出自拉萨尔主义的今天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国家社会主义连同它的格尔利茨纲领——可以被判断为愚蠢的犯罪。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过渡时期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拉萨尔的社会主义却把它看作是理想的终极状态。其原因是明显的——它不能超越资产阶级关于法律、道德、国家的观念的“狭隘眼界”。它以意识形态的和乌托邦的形式胡诌什么“自由国家”的“公平分配”和完全的“社会平等和政治平等”的理想。本质上由法律和国家来保证的这种原始的自由观念被共产主义这个宏伟的最终目标明确地消除，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十分明显的了。它将被“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新生活”中未来的意识形式所取代。我们这些还生活在人类社会史前史中的人，难以勾画出将来这些意识形式的真实景象。

马克思和列宁坚决主张，这些远大目标不能在一种虚无飘渺的梦幻般的精神世界里通过纯思维或者通过某种自我满足的想象力而实现。它们只能在人世间世俗的具体社会生活的现实中，在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人世间世俗的活动而实现。由于这个原因，人们称马克思和列宁为“唯物主义者”，并相信他们针对这些情况所说的话。资产阶级的作法有一些物质的理由，但这些理由不是靠理论的非物质的手段获取的。工人的情况很不相同。他们既忍受着当前“物质的”条件，又忍受着这些条件造成的“精神的”结果。他们只有通过彻底粉碎这些条件才能“在思想上”和“物质上”获得帮助。除了他们自身以外，任何人都不能或者不会向他们提供这种“物质性的”帮助。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每一个工人最终都必须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

第一国际的马克思主义

(1924年)

1864年9月18日，在伦敦召开的一个国际工人会议决定，建立国际工人协会。1867年7月25日，卡尔·马克思写出《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在19世纪60年代这个独一无二的历史时期里，马克思主义在两个方面获得了充分的实现：在无产阶级的新的自发运动在历史中获得它的实践形式的同时，工人阶级的自发科学也在文献中获得它的发达的理论形式。在圣马丁堂的讲坛上把德国工人埃卡留斯介绍给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大会的那个“沉默寡言的人”也为早期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提供了“现实力量”以及他经过巨大的精神劳动形成的对这些现实力量的理论表述。

促成工人阶级运动理论和实践的这个新阶段的划时代事件就是1861年—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在1848年的革命失败之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经历了空前的经济繁荣，这种繁荣使反动势力掀起了一阵反革命狂欢的疯狂浪潮。1857年的巨大经济危机到这时已经结束，(正如马克思所说)它表明，反动派在这一时期的表面

胜利不过是“为1848年的观念条件提供1857年的物质条件”的一种手段。1859年7月21日到1860年2月6日伦敦建筑工人大罢工和不久之后1861年的春季大罢工一起,把哪怕最微小的自觉的阶级联合注入到“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斗争中去。当时,雇主威胁要在这些斗争期间用欧洲大陆的廉价劳动力来竞争,而且事实上已经有迹象表明在某些英国工业中存在着来自德国工人的日益加剧的竞争。对于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国际工会运动的英国工人来说,这是一个实际的课题。欧洲工人阶级也受到法国波拿巴主义的社会帝国主义内外政策、受到意大利解放运动、受到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的强烈影响。但是,美国北方各州与南方蓄奴州之间的四年内战,才是伟大的历史事件,才能导致欧洲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国际组织由以产生的无产阶级意识的巨大高涨。正是美国南北战争把“为奴隶的解放而进行的高尚斗争”的巨大政治意义同关于英法工人阶级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深刻的经济成果结合起来。只是在表面上,可以把波兰1863年起义看作1864年建立国际的原因。欧洲无产阶级更多地受到美国南北战争的实际经济状况的影响,例如,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果使英国的棉花进口从1860年的114 060万磅*下降到1862年的30 930万磅。这意味着,到1862年10月,英国纺织工业60.3%的纺锭和58%的织机闲置起来,英国和法国的纺织工人大量失业,饥寒交迫,困苦不堪。在此期间,英国工人阶级在这些经济发展的沉重压迫下,也开展了一场有力地反对英国政府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倾向于支持蓄奴州一方的英勇斗争。工人阶级自身的状况和行动中的这些实际矛盾使他们懂得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这门科学在国际的建立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找到了它

* 1磅(英制)=0.454千克。——责任编辑

的组织形式和理论表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指出了美国南北战争在推动横扫整个欧洲的真正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上的决定性意义。马克思提醒欧洲大陆上的那些可能在《资本论》中只看到一个特定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和理论的读者：“决不要在这上面欺骗自己。正像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

1861年—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是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的“警钟”！在这个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复活了的19世纪60年代的革命激情。最终，在士气消沉和缺少群众参与的50年代之后，工人阶级的复兴突然在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变得十分明显。这在1864年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个宣言是马克思为这个新的国际阶级组织写下的纲领，国际总委员会以极大的热情一致通过。在说明夺取政权是工人阶级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新成立的欧洲无产阶级的国际阶级组织的目标的那段话里，这种革命激情达到了顶点。这个命题具体地发展成为下列要求：各国工人阶级必须通过阻止像帕尔莫斯顿对美国南北战争和波兰起义的政策、波拿巴主义的法国和沙皇俄国的政策这样的“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而证明工人阶级的兄弟般的合作。为了这个目的，工人阶级应该“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一切能用的办法反抗它”。

对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考茨基、希法亭和他们的伙伴这些人来说，要做的事情是把第一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和理论的这些明确的阐述说成是假的，并且证明卡尔·马克思这位1848年的革命者，在随后的50年中成熟起来了，他“皈依

了”基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改良的政治上的“相互依存论”。在此基础上,他们使“也可以应用于非革命时期”的19世纪60年代的“完善的和发达的”马克思主义与他们“早期著作中的原初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和恩格斯从20岁左右到1848年革命以及1849—1850年的革命再生期间所产生的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考茨基语)形成对立。希法亭补充了一个发现:现任英国首相麦克唐纳一直要求根据他的旨在“联合主要的国家”的“可尊敬的和平政策”,按照为国际工人阶级所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来执行”外交政策。

资本主义战争和战后政策的这些社会民主主义的代理人可耻地抛弃了卡尔·马克思和第一国际的真正的理论和实践。正视这一点,第三国际便面临着一个由列宁所制定的实现马克思的遗愿并把它变为生活的任务。第三国际在俄国革命之后,在一种重演着像1861—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这样的事件对欧洲工人阶级的全部政治和经济的影响的形势下,承担起了这一历史任务。现在,欧洲、美洲、亚洲和全世界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人民都在更大得多的规模上无比强烈地感觉到这些影响。世界革命的警钟正在苏维埃俄国敲响。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第一批书目

1. 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
 〔美〕悉尼·胡克 著
 徐崇温 译
2. 历史和阶级意识
 〔匈〕卢卡奇 著
 张西平 译
3. 交往与社会进化
 〔德〕哈贝马斯 著
 张博树 译
4.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美〕威廉姆·肖 著
 阮仁慧 钟石韦 冯瑞荃 译
5. 处在21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
 〔南〕尼科利奇 编
 赵培杰 冯瑞梅 孙春晨 译
6. 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
 和毛泽东
 〔法〕列菲弗尔 著
 李青宜等 译
7. 单向度的人
 〔美〕马尔库塞 著
 张 峰 译
8. 批判理论
 〔德〕麦克斯·霍尔海默 著
 李小兵等 译
9.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德〕卡尔·柯尔施 著
 王南湜 荣新海译张 峰 校
10.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英〕G. A. 科亨 著
 岳长龄 译
11.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
 徐崇温 著